

“半殖民地半封建”与毛泽东思想的建构

康桂英, 吴卫红, 卢光山

(安徽理工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安徽 淮南 232001)

摘要:“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总概括。“半殖民地半封建”对毛泽东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而毛泽东也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积极开展“半殖民地半封建”与毛泽东思想的建构研究,既可以深切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也可以为今天第二个百年梦想的实现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半殖民地半封建”;毛泽东思想;建构;学术影响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2-0001-04

“Semi - colonialism and semi - feudal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O Zedong’ s thoughts KANG Gui - ying, WU Wei - hong, LU Guang - shan

(Department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Semi - colonialism and semi - feudalism” is the total generalization of the nature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and defin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d by Mao Zedong. As “semi - colonialism and semi - feudalism” had made important academic influence on Mao Zedong’ s thoughts, Mao Zedong’ s thoughts also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formation of “semi - colonialism and semi - feudalism”. The activ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semi - colonialism and semi - feudalism” and Mao Zedong’ s thoughts not only deepens our grasp of the connotations of Mao Zedong’ s thoughts, but provides historical lessons to realization of the second hundredth dream.

Key words: “semi - colonialism and semi - feudalism”; Mao Zedong’ s thoughts; construction; academic influence

毛泽东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故“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1]633}。“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总体概括,也是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立论基础。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来描述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并不是从建党一开始就出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概念形成的过程,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探究“半殖民地半封

建”与毛泽东思想的建构,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切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的内涵。

一、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

“半殖民地”与“半封建”原本是两个不太相关的词语,在今天,却联结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深刻地表达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它的出现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奋斗历程。

文献表明,革命导师列宁最先使用“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这两个词语描述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但列宁但并不是将这两个词语“联结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来使用”^[2]的,而是用“半殖

收稿日期:2013-09-02

基金项目:2013年安徽理工大学引进人才基金;何干之史学研究;安徽理工大学思政研究会2013~2014年度资助课题:“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对毛泽东思想的学术影响研究

作者简介:康桂英(1975-),女,山西大同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史学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民地”指代中国的国家政治地位,用“半封建”指代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现状,且列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也并非专门特指中国,而是将中国与波斯、土耳其等国放在一起说明,认为这些国家都是落后的“半封建”国家,因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成为“半独立国”,故处于“半殖民地地位”。列宁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描述虽然“只是从理论原则上”指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3]3},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社会性质的本质,为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和把握提供了基础和方向。

1924年,列宁去世后,苏联政界俨然出现了以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为首的两大派,他们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分歧,甚至是严重的分歧,在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认识上也是如此,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和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争论异常激烈,直到1929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才宣告结束,但对中国的影响却仍在继续。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以党的文件的形式确认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以陈独秀为首的托派分子却提出了中国的封建势力在“大革命的扫荡中已经“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4]79}的观点。为了驳斥陈独秀的错误言论,正本清源,1929年12月,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李立三撰写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系统地批判了陈独秀的观点,充分肯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与半封建性特征。

与此同时,国民党学者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上陆续发表了《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中国之商人地主》等一系列文章探讨中国社会的性质,认为中国封建制度崩坏于春秋战国时期,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派别也都提出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不同认识。几派观点争执不下,逐渐引发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在“论战”中,他们各执一词,唇枪舌剑,令人莫衷一是。最终,经过近十年的论争,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获得了胜利。参与“论战”的何干之曾总结说,等到1937年“论战”接近尾声的时候,“试任意执住一些肯和实际问题接近的青年,问他们中国是一个什么社会,我想除了极少数头脑已经僵化的不算以外,一定会回答是: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会”^{[5]183}。这也意味着这场“论战”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由两个不同的词语而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相关的词语,在一定程度上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形成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由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对于半殖民地

半封建中国社会的许多特点以及各阶级的相互关系,也未作全面的考察、分析和论述”^{[3]104},也未能“全面系统阐明中国的国情,并与党在革命斗争中一系列的战略精神和策略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完整地形成关于中国科学的科学理论”^{[3]105},故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探讨仍在继续。

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认识传播到了延安。毛泽东充分吸收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积极成果,在已有认识和思考的基础上将之融会贯通,强调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的斗争策略、党的建设、文化工作等内容,赋予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更为深刻的内涵,使这两个词语联结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到1939年,“半殖民地半封建”已成为延安学术界描述中国社会性质的普遍用语而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总概括,它作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立论基础,为成功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毛泽东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思考

当列宁对中国社会性质作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括后,毛泽东就循着这样的思路开始了自己的思考。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思考过程伴随他对中国革命的把握同步进行,并逐步赋予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以深刻的理论内涵,成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总概括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立论基础。

以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为分界点,在此之前,是毛泽东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初步认识和思考时期,侧重于从“半殖民地”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着重强调了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入侵中国后造成中国国家主权不能自主的现状,阐述了反帝的革命任务。而在此之后,则是毛泽东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认识的深化时期,着重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中国社会,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具体的革命策略,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最终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在前一时期,毛泽东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认识和思考主要基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对中国国情作出的判断。毛泽东认为,“大革命”后,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更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仍然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以此为前提,他逐一分析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形势下社会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可以依靠的力量。他还以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6]98}为基点,分析了红色政权能够继续存在的

理由以及革命形势低潮下中国革命斗争应采取的策略,鼓舞广大革命战士的革命信心。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中日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形势,毛泽东又以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6]143}为国情,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抗日态度,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提出了“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6]151},积极开展抗日斗争的要求。这些体现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文的认识和思考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内涵,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在后一时期,毛泽东着重以“半殖民地半封建”为理论起点,结合中国革命的形势,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更为全面地制定了中国革命的纲领和策略,并将“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成一个全党上下皆知的概念,成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总体把握。

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运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6]171}来描述中国社会的性质开始,“半殖民地”与“半封建”两个词语就成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性质的高度概括,并以此为基点,对中国革命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在1939年10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这样说,“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1]604}。在随后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的认识和思考更进了一步:“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1]626}。这一段文字表述,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最终形成的标志”^[7]。其后,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毛泽东完全沿用了这一说法,即“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

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1]664-665}。至此,“半殖民地半封建”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总体判断。

正是由于毛泽东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进行了如此深入的思考,结合革命形势逐步赋予其鲜活的内容,从而使“半殖民地半封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性质最精确的表达。直到今天,仍然闪烁着科学的光芒。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对毛泽东思想的学术影响

以上对毛泽东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认识思考过程的梳理,既为我们了解毛泽东丰富和发展“半殖民地半封建”作出的贡献提供了线索,又为我们探究“半殖民地半封建”对建构毛泽东思想所起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帮助。

简言之,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包含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军队和战略思想、思政政治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实现了第一个百年梦想。而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基础之上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更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内涵,而“半殖民地半封建”也对毛泽东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尤其是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探究从学理上夯实了毛泽东思想的学术基点,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提供了事实论证基础、科学内涵,并为促成“半殖民地”与“半封建”成为联结在一起的术语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何干之是参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重要代表之一,他对“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思考较为深入,曾对毛泽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①。1934年,何干之就在其《中国经济读本》一书中,明确表示要“以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这个主题为经,以真实的材料为纬,使理论与实际纵横交错,把中国经济的真相,和盘托出”^{[5]31},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采用了大量的调查资料和数据资料,深刻剖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现状,指出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以及民族经济无法发展的实际,得出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会”的结论,赋予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浓厚的学术色彩。他还用“半殖民地”与“半封建”来描述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有意识地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联结在一起。认为,“半封建性不过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半面,除了这半面以外,还有一个半面,就是半殖民地性”^{[5]214}。此外,何干之还解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半”字之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对其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挖掘。认为,“半殖民地”主要是指“中国中央政府的基础,不论如何脆弱,形式上,它总是一个半独立的政府,多少有半自主的权利,所以中国对经济的干涉和统制,也有半独立的可能性”^{[5]199},而“半封建”则是“一种过渡形式,融合着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应死的不能立刻死去,应长的不能自由生长起来”,而且“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这两种性质互为因果,“因为中国处在半殖民地的地位,所以中国停留于半封建的阶段,同时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又促着中国向全殖民地化的途径迈进”^{[5]200}。

以上何干之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思考由表及里,从表面深入到了其内部,从而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内涵和外延更为广阔,这就预示着“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描述中国社会性质的词语“在一切革命的(或进步的)人们头脑中愈来愈明确起来,认为这是科学地论证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唯一正确的概念”^{[3]102}。1937年抗战爆发后,参加论战的何干之到达了延安,他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析论证也传递到了延安的学术界,加深了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如前所述,虽然之前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性质早有思考,但真正的成熟“至少在1938年3月”,“这年3月20日,毛泽东对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

大队毕业生学员做过一个简单演讲,专门论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是他这方面思想已经成熟的标志”^{[8]83}。此后,毛泽东以“半殖民地半封建”为起点,以反帝反封建为革命目标,陆续在《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中,对中国革命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科学而认真地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有的放矢地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策略,最终系统地建构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而“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描述中国社会性质的术语就成为了中国社会性质的总概括,用科学的理论夯实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根基,并随同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一起成为照耀时代的光辉亮点。

时光荏苒,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提出距今已有几十年的时间,而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也已经完成了六十多年了。但我们永远不会忘却“半殖民地半封建”从其“出生”到“成长”所经历的一切,更忘不了毛泽东为丰富和发展其内涵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科学的革命理论,它的理论立足点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正因为这个理论立足点科学而符合中国的国情,所以它成功地建构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石。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陈金龙. “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过程探析[J]. 近代史研究,1996(4):65-69.
- [3] 周子东,杨雪芳. 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M]. 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
- [4] 高军.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5] 刘炼. 何干之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7] 任俊伟. 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认识与思考[J]. 理论学刊,2007(6):58-62.
- [8] 李红岩. 中国近代史学史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范 君】

① 有关这个观点,很多学者撰文纷纷予以表达。主要有:刘炼:《何干之的革命一生和思想》,《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洪认清:《何干之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探讨》,《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李红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北京日报》2004年3月8日;王思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由来和历史命运——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三次思想交锋》,《炎黄春秋》2004年第12期;王志刚:《何干之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理论的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文化认同的几点看法

李后梅

(安徽理工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安徽 淮南 232001)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复杂交织过程,既包含着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文化,也存在着以中国文化“化”马克思主义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应关注“文化认同”,更应关注“文化差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文化认同”不仅在于“形似”,更在于“神似”,即在于两者某种程度上都注重实践性;此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要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文化;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2-0005-05

Several views o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i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LI Hou - mei

(Department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s a dynamic and complex process, which includes the conversion of Marxism into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onvers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to Marxism on the basis of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hould pay closer attention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tha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lies more in the “spirit” than in “form”, both of which focus on the practicality to some extent. Moreover, concrete circumstances o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hall be analyzed concretely.

Key word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必将掀起新一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热潮。已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主要为党史、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而从思想文化角度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从深层次把握这一进程,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内在蕴含着一种文化认同的过程,关注其中的文化认同将有有助于更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与基本内容。

—

文化认同,即“cultural identification”,有不同

的涵义。“认同”概念最初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后被运用于研究文化心理。文化认同是指对文化的一种认知和归属心理,它发生在两种文化的相互接触和同化的过程中^{[1]160},它体现一种肯定的价值判断,一种认可态度与方式,即文化群体或成员承认内生新文化或外来异文化的价值效用符合传统文化价值标准^{[2]20}。根据以上解释,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问题,既是中国人接受融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创造中国文化的过程,也是两种不同境遇所形成的文化在的实践中接触、同化和升华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在特殊国情下的发展,也是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更新进步。一般文化认同理论认为,文化认同有顺

向认同和逆向认同这两种趋势;顺向认同指认同主体以原有文化为框架,用原有文化说明外来文化,逆向主体是指以外来文化为框架,用外来文化说明原有文化,这就涉及中国历史上曾出现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之争的问题,落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中国文化,还是以中国文化来说明马克思主义问题。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代表最先进的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理论,应该用马克思主义说明和改造中国现有文化,创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也有学者认为要“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价值观念出发去理解、消化马列主义”^[3],如有学者认为借鉴“儒学”的“人伦日用”的途径,让马克思主义不仅入党、入国还要入家,进而实现两者的结合^[4]。笔者认为顺向认同和逆向认同都是对文化认同的静态分析,实质是从抽象角度、纯理性分析,而现实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以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文化或者以中国文化说明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阶段都同时并存,相互作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能“马克思主义化”;另一方面,我们是在以中国文化理解、吸纳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思想领域是很难严格区分,因为当我们可以理解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我们所理解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已是中国文化特有方式解读下的马克思主义,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融合”物了,民族文化深层次的思想方式、价值倾向、行为模式早已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的言论、思维与行动,浸润、渗透甚至决定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和运用,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会在中国社会实践中不断契合、认同,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实上,近代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也存在着这种现象,以西方文化解读中国文化和以中国文化解读西方文化,以西方文化批判中国文化和认同中国文化并传播西方文化同时并存,这些矛盾在那些早期学贯中西,竭力宣传西学的知识分子身上也有所体现(如严复就是一边主张“西化”,希望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化,一边又在“化西”,以中方文化融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实质也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过程同样如此,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明白毛泽东延安时期所强调的文艺民族化问题。这样的理解也是诠释学所提倡的一种理念,即理解者是不能脱离自己所处历史语境理解,理解就是应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基于“认同”上相互作用,且两者“文化差异”部分还会直接影响到文化认同。没有对“文化差异”的充分关注,就不能很好的实现“文化认同”。长期以来,我们重视研究“文化认同”,较多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认同”方面,而没有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间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有着重大区别:马克思主义源于欧洲发达国家,它建立在批判欧洲资本主义基础之上,是对当时人类文明最新成果的继承和创新,是指导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解放的一门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必然进程,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而中国文化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注重经验积累,富含浓郁道德伦理特色,是维护中国农业宗法专制社会数千年的精神血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差异”总是在经意不经意间干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例如中国文化中的“经验主义倾向”“小农意识”等就曾以各种机会主义形式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一些学者已经看到这一点,如学者叶险明就认为,“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克服以小农经济的文化心态‘诠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这不仅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且也贯穿于我们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中”^[5]。而学者孙奎松也同样认为中国的农民意识一直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复杂的过程,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唯有清醒的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差异”才能避免革命和建设中的“左”倾或“右”倾。关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差异”与关注两者的“文化认同”,意义同等重要。

二

目前,学界已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有学者视文化认同为彼此的某些相似之处,如

关于美好的社会理想设计(如共产主义与大同社会),一些民本思想等等。笔者以为这些相似点只具形似,而非真正契合之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并不具有“一致性”,如果说“五四”时期借助“大同”理念马克思主义得以传播,倒不如说这反倒体现出早期传播的局限性^{[6]97}。又如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也是有很大差异的,中国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孔子提倡重民、富民、教民;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到贾谊的“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上》)、朱熹的“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宋史·朱熹传》)等等,这些民本思想的背后实质是要求或希望君主能“替民做主”,“为民做主”,而绝非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国度里的人人自由、平等,当家作主。再如,重视集体利益的价值诉求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大一统”、“家族群体”等理念相似,然而,马克思主义强调集体主义是建立在充分尊重个人合理利益之上的,完全不同于中国文化中建立在压抑个性、否定个体价值基础上的整体价值追求。当然,不能说这些形似不重要,对于一种外来思潮而言,形似至少让其能够立足,为进一步的被认可创造环境。纵观中西文化的交流史,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每一种外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被接受,都曾从形似开始,到被通俗化解读,再到最后慢慢与当时当地的主流文化融合,生成新的文化。如佛教最初来到中国,首先依附于汉代方术(又称“道术”),到魏晋又依附于魏晋玄学,其主要讲述的“因果报应”“灵魂不死”,这些思想为中国所固有的较形似,而后通过对中国的儒学、道学等的吸收,最后形成中国特色的禅宗。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形似,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而实现中国化创造了条件。但同时我们更应看到,两者的“貌似神异”也使国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出现偏差,甚至误解,如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们就分不清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如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人对科学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吸收。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和中国文化认同,关键在于两者某种程度上都以实践作为价值标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以实践作为检验、发展真理的科学,而中国文化恰恰也则具有实用理性倾向的特质,尽管这种特质具有

实用主义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说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坚持彻底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性。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就明确的表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重视实践,并以其来划分新哲学与旧唯物主义理论的差别,这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均有体现,学界也基本认为马克思主义通过实践解决了自柏拉图以来的物质意识二元思维模式的缺陷,因而就曾有学者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指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葛兰西甚至在《狱中札记》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实践哲学”,认为它是对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批判性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他的新哲学与旧哲学差异,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具体实践的分析,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更体现在它所构想的共产主义实现方式与途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自诞生开始就依靠实践、立足实践,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不断推进广大人民争取解放的实践道路上完善发展。在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了各国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这种立足理性分析、重事实实践的理论品格与中国文化的实践理性颇为神似,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文化历史久远。孔子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孔子阐述的与“仁”相关的学说构成儒家主流思想,影响至今海内外华人。虽然,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并非一贯坚持儒学,国家交往、朝代更替、异族间的战争也曾带来文化上的动荡变化,但都没有因此而导致中国文化的灭绝,这与以孔孟儒学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具有实践理性密切相关。所谓实践理性,“首先指的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7]28},以一种合理的、冷静的、现实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用理智来引导、满足和节制情欲,它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这种实践理性的倾向在孔子就有所体现,并随孔子的影响广为流传而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特征。孔子生活在早期宗法制度崩溃、氏族体系彻底瓦解的时代,面对“乐崩礼坏”的现实,孔子“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它确乎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7]30}。孔子的思想始终体

现着一种立足现实,理性看待事物的特点,如孔子在以“仁”释“礼”时,他关注到现实变化,将“礼”的血缘实质转化为“孝悌”进而落实到日常人伦,使“礼”由外在约束转化为人内心的需求,进而成为人的自觉追求,正是这种切合实际的诠释促进孔子思想的传播;再如对于脱离现实的所谓鬼神之说,孔子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来表达清醒的理性精神,诸如此类思想均体现一种实践理性的精神,即“不在理论上去探求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难题,并认为不必要去进行这种纯思辨的抽象。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妥善地处理它”^{[7]28-29},这种带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实践理性一直指导着国人对事物(包括思潮)的价值取舍。尽管儒学思想在后来曾经被不同的人、不同角度加以诠释和发挥过,但这种根据时代需要改造思想正是贯彻其实践理性的体现。近代马克思主义被国人从各种思潮中选中,是实践理性指导下的结果,因为它能解决中国近代最大的课题——救亡图存,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必然——“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8]210}。因而,注重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的深刻之处,正因为注重现实实践而不拘于书本的“条条框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有了创造性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问题,既需要一般意义上的关注“认同”、“差异”“神似”等问题,也需要具体研究特定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特定时期的中国“文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文化,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从思想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认同”始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共有四条路径:欧洲语境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日本语境的“学理马克思主义”、美国语境的“空想和基督教马克思主义”和苏俄语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同路径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与宣传的内容各有差异。在民族救亡胜于启蒙的时代背景下,最终无产阶级历史语境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各种思潮中

脱颖而出,得到受实践理性影响的国人认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来自苏维埃,实质主要是俄国语境下产生的列宁主义,它提出进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尤其重要的是,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宗主国家的革命与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相互支持,“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落后国家实行共产主义策略和政策,“那就是空想”^{[9]276}等观点,这些观点比较系统、完整,它为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道路,为近代以来数次救国失败的中国人提供了希望,同时它有十月革命这一现实成功版本,对中国而言更具现实意义。因而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指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时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就是来自苏联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中国文化也不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它正处在“转型期”^①。一些有识之士前赴后继从西方“取经”带来的各种思潮,已冲击改变了传统的中国文化,并形成三波思潮,“带着三种不同特色,彼此先后连续着、扬弃着迈上更高的台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扫清道路”^{[10]476},也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认同”创造条件。具体说来,从鸦片战争始,地主阶级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龚自珍等人开启了“看西方”、“学西方”和“改中国”的路径,耶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国内矛盾的尖锐,带来了冲击传统文化的第一波——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它穿着宗教外衣,掀起摧毁封建社会的暴力狂澜。太平天国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土地改革为核心,提出的一套相当完备的社会设想,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主义。接着资产阶级发起的维新思潮是冲击传统文化的第二波,以严复、梁启超等为代表。严复的“严译八大名著”囊括哲学、逻辑、政治学、社会学等多领域,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将西方近代学术文化介绍到中国,梁启超则在《新民丛报》上对大量西方思潮进行通俗化介绍,他们揭示了中学与西学差异、“封建专制、纲常名教与资产阶级平等、民主的对立”^{[6]397},阐明天赋人权、“物竞天择”、维新变法思想,极大地推进了西方学说在青年一代知识分

① 即一国文化的发展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一种主流文化的认可和阐释,对已有文化进行纵深解读和挖掘,同时对异己力量排斥、压制,以达到对主流文化的巩固和定型;第二阶段则是表现为对原有文化的“离异”,即对主流文化的怀疑和否定,进而批判和扬弃既成规范,形成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与颠覆,这就是“离异”期,也就是文化转型期。参考胡伟希《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子身上的传播。第三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以邹容、章太炎、孙中山等为代表。他们的思想都以进化论为基,高呼“革命”公理,以期通过彻底革命实现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平等。经过这三波思潮的冲击,当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时,中国的文化早已不是封建文化极大盛时不断巩固的第一阶段,而是不断在“离异”中变的虚弱的第二阶段,各种新思想在中国已得到不同层次的传播,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进化论思想。“新文化运动时期传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从激进主义的革命进化论传统中汲取了养分”,“生存竞争”、“最适者生存”“正与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贯穿人类历史之演变暗合”^[11]。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中刻有深浅不同的进化论痕迹,如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认为“世界进化,駸駸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者”^[12]¹³;李大钊也曾提出“天演之迹,进化之理,穷变通久之道,国于天地,莫或可逃,莫或能抗者”^[13]¹⁶²。正是前期外来思想的冲击与渗透改变了中国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条件,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必须看清这一点。

总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需要全面关注,具体而完整地分析。面对可能影响中国文化的世界各地文化,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我们需要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研究,以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才能继续枝繁叶茂,生机勃勃,中国社会主义文

化才能欣欣向荣,文化强国才能最终实现。

参考文献:

- [1] 顾明远. 教育大辞典(6) [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160.
- [2] 冯天瑜. 中华文化辞典[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20.
- [3] 李海荣. 从文化认同到实践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过程[J] 学术论坛,2002(3):1-4.
- [4] 黎学军. 论马克思主义的“人伦日用”化-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一种思考[J]. 社会科学研究,2010(5):119-124.
- [5] 叶险明.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逻辑研究中的两个问题[J]. 哲学研究,2001(2):3-10.
- [6] 朱义禄,张劲.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97.
- [7] 李泽厚. 新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5):28-30.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人民出版社,1995:210.
- [9] 列宁. 列宁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 [10] 李泽厚.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476页.
- [11] 曹东勃. 进化论创立以来的文化回响[J]. 云南社会科学,2011(5):39-43.
- [12] 陈独秀. 陈独秀选集[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13.
- [13] 李大钊. 李大钊文集(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62.

[责任编辑:范君]

“迈”不是速度单位

在日常生活以及某些出版物中,常把“迈”作为速度单位。《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迈”的释义为:“英里。用于机动车行车的时候,每小时行驶多少英里就叫多少迈,也有把每小时行驶多少千米(公里)叫多少迈的:以80~的车速行驶。[英 mile]。”在这个释义中,除“英里”和“[英 mile]”外,均是错误的。“迈”本来是长度的英制单位“mile”的音译,意为英里。行车速度应是行驶距离除以时间,如果以英里作为距离单位、小时作为时间单位,则车速单位应为“mile/h”,其中文字符号为“英里/时”。显然,将“mile/h”叫作“迈”,混淆了速度单位与长度单位,把长度单位张冠李戴成了速度单位。至于“把每小时行驶多少千米(公里)叫多少迈”,则更是错上加错,这里的“迈”又从“mile/h”变成了“km/h”。说“以80~的车速行驶”,请问用的是哪个“迈”?要知道,《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释义中的2个“迈”,量值相差很大:1mile/h=1.609344km/h。以mile/h(迈)计量的车速是以km/h(迈)计量的车速的1.6倍!因此,无论是出版物还是日常生活中,机动车车速都应使用法定计量单位“km/h”或“千米/时”,读作千米(公里)每小时。

(郝远)

包公也断“葫芦案”

——法治视野下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

李睿¹, 潘志勇²

(1. 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0084; 2. 桐乡市人民检察院, 浙江 桐乡 314500)

摘要: 作为中国古代清官形象代表, 包公是完美无缺的正义化身, 在中国司法文化中, 包公早已被神化。然而, 如果以元杂剧《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为样本, 在现代法治视野下评判包公, 我们会发现不仅《红楼梦》中的贾雨村这位葫芦僧会判葫芦案, 身为清官的包公也同样封建迷信十足, 他为了所谓的结果正义, 在断案中有罪推定, 并不惜刑讯逼供, 最终导演一场包庇凶犯、枉法裁判的葫芦案。中国司法文化中有根深蒂固的清官情节, 但司法公正并不仰仗清官, 其根植于法治而非人治。

关键词: 包公; 《蝴蝶梦》; 刑讯; 葫芦案

中图分类号: DF73; J80 - 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 (2014) 02-0010-03

Bao Zheng as the Confounded Judge in *A Dream of Butterfly*

LI Rui¹, PAN Zhi - yong²

(1.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310008, China; 2. Tongxiang People's Procuratorate, Tongxiang, Zhejiang, 3145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incorrupt judges in China, Bao Zheng is the symbol and even the god of justice in the eyes of ordinary Chinese people. However, as *A Dream of Butterfly* shows us, Bao Zheng is nothing but another confounded judge in the opinion of “rule of law” and he is just like Jia Yucun as a confounded monk who ends a confounded case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n *A Dream of Butterfly*, Bao Zheng also ends a confounded case which is full of inquisition by torture and presumption of guilt. The complex of “incorrupt judge” is deep rooted in Chinese legal culture; however, legal justice is rooted in “rule of law” rather than “incorrupt judges”.

Key words: Bao Zheng; *A Dream of Butterfly*; inquisition by torture; confounded case

《包待制三勘蝴蝶梦》是关汉卿公案戏代表作。此剧写宋朝某天, 王老汉在集市撞上权豪势要葛彪, 葛彪把王老汉就地打死, 王老汉的三个儿子与母亲随后又把葛彪打死, 三人后被移送到包公所在的开封府受审。庭审前, 包公做了个关于蝴蝶的梦。庭审中, 王母及三个儿子都说是自己把人打死的, 包公遂以“不老实”为由, 对三人一顿刑讯, 最后包公决定处死一人了结此案, 可王母在厅堂称宁愿割舍亲生的小儿子, 也不愿两位继子受死, 这义举打动了包公。包公经过审案, 认为王母是节妇, 三个儿子均是孝子, 再加上那个蝴蝶梦的启示, 最后以另案的偷马贼赵顽驴作替死鬼, 三兄弟被释放甚至封官。理清了剧本脉络, 我们就可以分析包公是如何判“葫芦案”的。

一、包公也迷信

清官是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期盼, 很容易被神化, 包拯就是其中典型。但在人们眼中, 包公与其他的神化人物不同, 他肩负着平反冤狱, 主持正义的使命, 他必须活在民众当中, 所以就不能像“老子”那样被完全神化, 不食五谷、羽化登仙。为了需要, 包公只能被浅层次地神化。一方面, 人们为了把“包青天”留在人间, 不能赋予他腾云驾雾、火眼金睛的技艺; 但另一方面, 为了让“包青天”明断是非、替天行道, 他又必须具有超乎常人的能力, 而以梦预见未来就是种相对正常的本领。

在古代, 梦具有神秘性。周公解梦也即古人意欲以梦预知未来。在《蝴蝶梦》中, 作者为了使包

公最后成功断案,让他先在闲暇时做了个“蝴蝶梦”:

我(包公)推开这门,我试看者,是一个好花园也。你看那百花烂熳,春景融和,兀那花丛里一个撮角亭子,亭子上结下个蜘蛛罗网。花间飞将一个蝴蝶儿来正打在网中。(诗云)包拯暗暗伤怀。蝴蝶曾打飞来。休道人无生死。草虫也有非灾。呀,蠢动含灵,皆有佛性,飞将一个大蝴蝶来,救出这蝴蝶去了。呀,又飞了一个小蝴蝶,打在网中。那大蝴蝶必定来救他。好奇怪也。那大蝴蝶两次三番只在花丛上飞。不救那小蝴蝶,佯常飞去了,圣人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你不救,等我救^{[1]33}。

包公所梦见的就是王氏三兄弟案件的“梦中版”。包公在梦中见蝴蝶舍生取义,便生恻隐之心,救出受困于蜘蛛网的小蝴蝶。其实,就本剧来看,包拯并没有其他证据去证明王氏三兄弟无罪,而最终作出无罪判决,很大程度上就依据他做的这个梦。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事先由作者准备的梦,可能包公就无法断定此案。从这方面看,包公可谓“封建迷信”十足,借此判断生杀大事,真“葫芦提”也!无独有偶,在昆曲《十五贯》中,况钟这位几乎与包公齐名的清官也“做梦”,所梦与其即将处理的案情一致,这为况钟平反冤狱提供了“依据”;在清人魏息园所著的《不用刑判决书》中有篇《投砒》,审案县令也在庭上说道:“死者夜来以梦告我矣”,随后用断案四字诀“察言观色”^[2]判决;而在《红楼梦》中,贾雨村为获取贾府的好感,更是将“迷信断案”发挥到了极致,竟然在审判中公然“扶鸾请仙,堂上设乩”,以如此荒唐之法了解“葫芦案”。

为何剧作者让清官托梦以断案?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古代中国科技水平低下,对梦知之甚少,而周公解梦更进一步夸大梦的作用,因此众多古代剧作者频繁把梦境写入司法故事。二是剧作家为了显示包公等清官具有超凡的断案本领,不得不借用梦的作用。清官虽然被人们一再神化,但清官也是人,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在面对复杂案件时,他们也会手足无措。但作为人们理想中的“正义偶像”,清官又必须“明察秋毫”,为了解决此矛盾,梦便不可或缺,以让清官预知未来,明断是非。然而,迷信断案消解了法律的理性,以梦断案消解了法律的现实性,故神秘主义与法治格格不入。司法不可借助梦境迷信之神秘,而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法律程序之正义通达结果之正义。

二、包公也刑讯

刑讯是中国古代官员常用且合法的审案方式,虽然统治者也认识到刑讯会导致冤假错案,但因古代侦查技术落后,故并不能取消刑讯,只能制定刑讯制度以规范刑讯。《宋刑统·断狱律》就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3]474},也就是说司法官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先反复审查案件,如果还无法决断,才可以刑讯。这

说明刑讯在古代中国是合法的。下面来看看包公是如何使用这合法手段的。首先,包公要求押上王氏三兄弟,叫左右“与我一步一棍打上厅来”,然后见三兄弟都说此案为自己所做与兄弟无关,包公先入为主地认为三人“不老实”,又喝左右“与我着实打者”。一旁的王母对刑讯控诉道:

公人如狼似虎。相公又生嗔发怒。休说麻槌脑箍。六问三推。不住勘问。有甚数目。打的浑身血污。大哥声冤叫屈。官府不由分诉。二哥活受地狱。疼痛如何担负。三哥打的更毒。老身牵肠割肚。这壁厢那壁厢由由怄怄。眼眼厮觑。来来去去。啼啼哭哭。则被你打杀人也待制龙图。可不道儿孙自有儿孙福。难吞吐。没气路。短叹长吁。愁肠似火。雨泪如珠^{[1]35-36}。

文中不仅描述了三兄弟被打的惨状,而且也借王母之口抨击了包公——“则被你打杀人也”。后来王母因恨生怨,直接责骂包公是“葫芦提”。

一般认为,刑讯逼供只是贪官污吏用来草菅人命的手段,但实际上,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接受,历史事实是:即使是清官,他们也离不开刑讯。皇权专制下,政府行为归根结底都用以维护皇权,而漠视人权。在儒家厌讼文化下,被带上公堂的百姓,在官员看来,大都属于“民风彪悍”之“刁民”。而对付“刁民”,最好的手段不是“胡萝卜”,而是“大棒”。他们坚信“人是贱虫,不打不招”^[4],即使在文官地位最高的宋代,也不例外。其次,古代中国法官定案主要依据被告的“口供”,由此形成了“无供不录案”的司法传统,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至今。为了获取口供,最快捷有效的方式就是刑讯。同样是包公戏,在小说《三侠五义》第十九回“狸猫换太子”一案中,包公就用公孙策设计的“杏花雨”^[5]酷刑,将郭槐刑讯致死。在百姓眼中,所谓清官似乎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不贪”,而对清官是否刑讯,是否逼供,是否属于酷吏,他们并不关心。综上,我们认为“包公也刑讯”是恰当的评价,并无哗众取宠、贬低历史人物之嫌。

另外,从本剧整个案件来看,包公从一开始就践行着“有罪推定”的原则。刚刚开庭,包公就道:

这三个小厮是打死人的。那婆子是甚么人。必定是证见人。若不是呵。敢与这小厮关亲。兀那婆子。这两个是你甚么人。……你个村妇教子。打死平人。你好好的从实招了者^{[1]34}。

从包公话中,可见他一开始就认为王氏三兄弟是杀人凶手,而王母“必定”就是证人。虽然此案确系三兄弟所为,但作为司法官员,包公尚未审理就先入为主,先行认定三人有罪,继而刑讯相加。可见,“有罪推定”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无论是在真实的法律文件中,还是在虚拟的戏剧传奇中,这个原则都被活灵活现地践行着。我们便可以理解何以当今中国“有罪推定”思维盛行,在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甚至审判机关的工作人员身上,都多少存在这种思维。历史难免精华糟粕并存,以史为鉴,革除“有罪推定”思维,任重道远,切不可做

了“葫芦僧”又判断了“葫芦案”。

三、包公也枉法

自然不能以现代眼光苛求古人,但如果我们以当时法律看本剧中的包公,那他是否也枉法呢?首先,王氏三兄弟毆死葛彪确系事实,只是葛彪事先打死三人的父亲在先。“杀人偿命”乃中华法谚,《大元通制条格》规定“诸人杀死其父,子毆之死者,不坐,仍于杀父者之家,征烧埋银五十两。”但紧接着又规定“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毆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6]此剧用“权豪势要”影射有特权的蒙古人^[7]。若此剧中“子毆之死者”不是“权豪势要”,王氏三兄弟所为完全合法。但死者葛彪却是“打死人不偿命”的“权豪势要”,故应追究三兄弟的责任。然而,包公认为王母是位贤母,而王氏兄弟杀人又事出有因,“蝴蝶梦”更引发了包公的“恻隐之心”,于是他“狸猫换太子”,让另案的偷马贼赵顽驴作替罪羊。包公最后判决:

你休慌莫怕。他是偷马的赵顽驴。替你偿葛彪之命。你一家儿都望阙跪者。听我下断。(词云)你本是龙袖娇民。堪可为报国贤臣。大儿去随朝勾当。第二的冠带荣身。石和做中牟县令。母亲封贤德夫人。国家重义夫节妇。更爱那孝子顺孙。今日的加官赐赏。一家门望阙霑恩^{[1]56}。

《宋刑统·贼盗律》规定:“起今后犯窃盗,赃满五贯文足陌,处死”,五贯文购买力约为现在1万3千元,而如今一匹马价格在2万元左右。如此看来,本剧中赵顽驴被处死罚当其罪,无论是作为偷马贼,还是替罪羊,赵顽驴都是死路一条。在此,包公似乎未必“枉法”。但《宋刑统·断狱》又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同时,疏义又规定:“犯罪之人,皆有条例,断狱之法,须凭正文”^{[3]484},从这条看,包公无疑又系“枉法裁判”,包公将小偷秘密地以“杀人罪”吊死,不符合法律正文,对死者裁判不公。然而,古代司法有“春秋决狱”之说,也就是“论心定罪”,主张“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就是说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罪主要根据动机,如果一个人动机是善的,即使其犯法也可以免于或减轻处罚,反之,即使一个人的行为客观上不违法,只要其动机是“恶”的,也要受处罚。这原则表明,在古代社会,法官的使命不是实现法的价值,而只是去发掘礼所内涵的“天道”,为了“天道”,时而牺牲“王法”。在本案中,包公之所以敢“知法犯法”,根本就在于他运用了这一司法原则。作者让包公具有守护“王法”和执行“天道”的双重使命。戏剧的高潮部分是包拯自身所激起的法与理的冲突:于法,三兄弟中一人必死;于理,三兄弟皆可被赦。这矛盾一时让包公困惑不已,诚如剧中包公自惭“这些公事断不开,怎坐南衙开封府”^{[1]39-40},但包公又“欲播清风千万古”,于是最后包公以情代法,置法

律明文于不顾,适用现代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了断命案。包公为实现“个别正义”,根据情况运用“自由裁量权”。那包公的“自由裁量权”到底有多大呢?我们认为,在奉行“春秋决狱”的古代社会,司法人员的政治功能是维护皇权体制,其自由裁量的底线是不妨碍皇权专制统治。假设偷马贼以及王氏兄弟两案最后被如实送报皇帝审核,估计皇帝作为帝国的最高法官,也会许可包公“枉法裁判”,因为这样既不会丝毫危害皇权,又可以体现其“爱民如子”的高大形象。结案后,剧中王氏三兄弟及王母对包公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10],其实不过是感谢皇恩而已。

综上,看包公处理此案是否“枉法”,要分不同角度。如果从包公所处的时代看,包公“春秋决狱”,不依据法律明文规定,但符合民众的预期,符合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如果从偷马贼的角度看,他没有义务为实现所谓的“天道”而背负杀人罪名;无论按宋律,还是按元律,王氏三兄弟中有一人必死;按中国现行法律,王氏三兄弟为父报仇,其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构成故意杀人罪。包公“狸猫换太子”似的断案无异于草菅人命,当属“枉法裁判”。

四、结论

戏剧并非正史,以戏剧为分析文本,乍看来不太严肃。但作为“效果历史”,戏剧反而比正史更能说明问题。这些公案戏之所以能流传千年,正因契合专制下民众对司法正义的理想,故公案戏是了解民众司法心理及中国司法文化的绝佳样本。清官当然优于贪官,但专制酱缸难容廉吏清流。专制之下清官罕见,故为民众推崇神化。分析《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发现身为清官的包公“也迷信”、“也刑讯”、“也枉法”,即也断“葫芦案”,而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况且,剧中包公形象还是经剧作者美化后的形象。故司法公正,非拜清官所赐,而源于民主法治。

参考文献:

- [1] 范嘉晨. 元杂剧包公戏评注[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6: 33.
- [2] 王振荃. 不用刑判决书故事选[M].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87: 229.
- [3] 窦仪. 宋刑统[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474.
- [4] 关汉卿, 李韵. 关汉卿名剧赏论[M].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 51.
- [5] 石玉昆. 三侠五义[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9: 174.
- [6] 郭成伟. 大元通制条格[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0: 436.
- [7] 徐忠明. 解读包公故事中的罪与罚[J]. 现代法学, 2002(3): 9.

[责任编辑: 范 君]

受领迟延制度的属性争议

张 阳

(华东政法大学 研究生教育院, 上海 200042)

摘 要:受领迟延制度是大陆法系一项传统的债法上的制度,我国民法虽然有相关规定,但也未形成系统的制度。受领行为的性质直接决定了受领迟延责任的定性,即迟延受领是否要承担违约责任。主要大陆法系国家包括我国法律中都没有明确规定受领行为的性质,透过学说和外国立法例的分析,受领实质上是债权人的权利,而在一般情况下,受领迟延系对权利的放弃,债权人不承担违约责任;意定或者法定情况下,若违反相关义务,债权人则要承担迟延责任。

关键词:受领迟延;权利;义务;不真正义务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2-0013-03

On the dispute about characteristics of defaulted acceptance behavior ZHANG Yang

(College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Abstract: Default of acceptance is an important legal system of obligation law of continental law system, yet China's civil law system is still lacking in a systematic system. The definition of acceptance determines the nature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defaulted receiving, i. e., whether the creditor should be liable for the breach of contract or not. Most continental law countries include the qualities not explicitly regulated in our country. The analysis of theory and foreign legislation denotes that acceptance is substantially the right of creditors.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the default of acceptance is the abandonment of rights and the creditor bears no liability for the breach of contract; by agreement or legal provisions, if violating the obligations, creditors should be liable for the default.

Key words: default of acceptance; right; obligations; obliegenheit

一、债权人迟延相关概述

债权人迟延(default of the creditor),或称受领迟延,是指债权人对于已提供的给付,未为受领或未为其他给付完成所必要的协力的事实^[1]。在债的履行中,给付既包括债务人单方即可完成,又包括需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配合才可完成的。前者如脱密期间履行保密等不作为的债务,只要债务人不泄露有关工作业务秘密,合同债务便得以履行;后者则普遍存在于双务合同中,只有债权人完成协助行为或者接受给付,当事人才能履行合同和实现交易。债权人的延迟受领,使得债务人陷入债务拘束中,债务人不仅无法进行新的交易,而且有可能承受履行迟延所产生的负担或不利益。债权人的迟延履行不仅有违公平原则,且妨碍了正常的交易秩序。基于此,各国都规定了债权人迟延制度来保

护诚信的债务人,并提高交易效益。

合同中债务人的给付行为分为现实提供给付和言词提出给付,在这两种情形之下都存在债权人受领迟延的情况。其中现实提供给付分为赴偿之债和送付之债,前者要求债务人必须前往债权人处履行给付,后者则要求标的物必须到达债权人处,现实提供中债权人的受领行为即为一般接受给付行为。若债权人已明确拒绝受领或者拒绝为协助受领之行为,债务人只需要提出言词给付即可。比如在往取债务中,债务人只需为催告的给付行为,而债权人前往提取标的物的行为即为受领行为。虽然大部分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中都存在受领迟延的内容,但是鲜有对受领行为明确的定性规定。若受领是债权人的义务,那么受领迟延则要承担违约责任,反之则不存在追究责任的问题,各国法律和学说对此都有着不同认识。

二、受领行为的定性:权利抑或义务

(一) 外国学说的认识

法国民法的各家学说及司法判例倾向于义务说,即受领是债权人的义务。法国的判例认为债权人不当拒绝履行的提供,系违反法国民法典第1146条及第1153条关于债务不履行的规定,应负损害赔偿^[2]。受领既然是义务,债权人迟延受领就是违反债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法国民法典没有明确界定受领是否为债权人之义务,但依“清偿的提出和提存”制度可推断立法与学说判例立场相吻合。法国民法典第1257条和1260条规定,债权人若受领迟延,债务人可提供现实的提议,债权人若再次拒绝,债务人可提存其提供的款物;债权人负担提供现实履行及提存的费用^[3]。

《德国民法典》关于债权人受领迟延的规定详见于第293条至第304条,法条本身也并未明确地表示受领行为的性质归属,只规定了债权人迟延的效力,即第300条规定债权人受领迟延后自动承担标的物风险,且债务人仅对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负责。同时,债权人迟延以债务人已提供现实的给付为前提,法典第372条规定了提存制度,债务人为保护自己的权益可提存标的物^[4]。

《德国民法典》“债务关系的内容”这一章中共规定了四种给付障碍,即给付不能、不当履行、债务人迟延和债权人迟延,然而前三种情况都属于该章第一节“给付义务”的内容,第二节则单设为“债权人迟延”。此可看到,立法者明确了债权人受领非给付义务。《民法典》中“义务”一词为“Pflicht”,而债权人的受领行为则是“Obliegenheit”。与债务人的给付义务不同,债权人的受领行为本质上是为了使自己顺利地得到给付,这在原则上并不是债权人的义务(Pflicht)。国内有部分学者将“Obliegenheit”翻译为“不真正义务”。所谓不真正义务,是指在债的关系中,除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之外的一种强度较弱的义务,其主要特征在于相对人通常不得请求履行,而且其违反并不发生损害赔偿,只是使承担此项义务者遭受权利减损或丧失不利而已^[5]。也有学者将“Obliegenheit”称为“负担”^[6],没有履行该负担仅损害债权人自身法律利益,并减轻债务人的责任。新的日本民法典在旧的法典基础上,补充了德国法的相关内容,将迟延责任与提存制度相结合,即第413条、第494条规定债权人拒受履行债务,或不能受之,则其债权人,从提供履行之时,任迟滞之责;辨济者供托辨济目的物,以免其债务^[7]。

我国台湾民法之规定较之德国民法基本相同,并未认定受领之具体性质,仅规定债权人拒绝受领或者不能受领者,负迟延责任。

(二) 我国相关学说

我国民法界对于受领行为性质也无统一定论,

总的来说可归为四种学说:(1)受领权利说。受领理所应当为债权人之权利,代表学者为梁慧星^[8]。其认为债权系一种权利,而债权权利的权能之一是受领,这样债权人承担债务人的给付才有权利依据,债权人的受领才属于正当得利。(2)受领义务说。合同目的的完成取决于债权人最终时候适当受领,受领行为是债权人的合同义务,债权人迟延受领系债务不履行的体现,因此拒绝受领之后,债权人就要承担违约责任,债务人即可解除合同及要求赔偿损害^[9],代表学者有王利明、佟柔、叶林等。(3)权利—附随义务说。该学说也将受领解释成债权的权能之一,故受领首先是一种权利,同时依诚信原则,若债务人的履行需要债权人受领或给予协助时,为了减轻债务人不必要的负担,使债权人和债务人公平交易,债权人须协助债务人受领给付。然而这样一种协助行为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并非一种受领义务,不具有强制履行性。如果没有履行这种协助义务,债权人将造成自身利益的消极减损,债务人的负担因而减轻,债权人可能还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债权人的协助义务与附随义务均基于诚信原则而生。该学说代表学者为张广兴,其认为受领既为权利,又为附随义务^[10]。(4)权利—不真正义务说。韩世远先生借用德国法上的“不真正义务”一词来说明受领的性质。他认为债权身为权利,其基本属性为利益与自由。因而,债权人的受领行为首先是一种自由、一种对权利的支配,即受领体现了债权的直接效力。同时,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债权人应履行协助义务和附随义务,该两种义务并非法定或意定的,属于现代债权法发展过程中债之义务群的扩张。但二者又有明显区别,协助义务包括适当受领、配合履行、积极协助等,是债权人的义务。附随义务的主体则是债务人而非债权人,因而受领不同于附随义务,而是一种不真正义务。不真正义务属于一般义务的特例,它没有强制性,具体到受领来说,债务人不能强制债权人为受领行为。

三、受领为权利

附随义务是指法律没有规定,合同主体也未明确约定,但为保护对方利益,依照诚信原则,当事人应当负担的义务。一般来说,附随义务或协助实现主给付义务(如妥善包装等),或为维护对方当事人人身财产利益(如禁业竞止等)。由此可见,附随义务都是为了实现合同目的,双方当事人根据合同约定各自都完成给付之后,就已经实现合同目的,之后债权人是否受领给付都不影响合同目的实现与否。

“不真正义务”并非强制性地要求当事人作为或者不作为,而是民事主体若不为特定行为,主体之权利便发生障碍,权利的相应请求权不发生。权利的障碍只是导致行为主体权利行使不便,该结果

是民事主体自主选择的,并非行为强制资格,“不真正义务”必然不属于义务范畴。债权人首先行使债权请求权之后,债务人再依约履行相应给付,此时债权请求权已得到实现,若债权人迟延受领,不存在债权请求权之障碍,仅债权人放弃自身利益而已。因此受领既非附随义务,亦非不真正义务,受领应是债权人之权利。

其实在债权理论中,应该明确给付是债务人的义务、受领为债权人的权利,这是债权关系成立的基础,混淆受领的性质,将会造成整个债权关系的混乱。因为首先,法律关系的内容即为权利和义务,具体到债权法律关系则表现为受领和给付的形式。债务人负有给付义务,债权人则对立地受领债务人的给付,如果不区分给付与受领的性质,那么将模糊债权人与债务人对立的法律地位。同理,既然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那么把受领解释为权利中的附随性义务更是毫无逻辑而言。其次,假设受领为债权人的义务,债权人未按约定适当受领系违约行为,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债务人则享有强制受领权、赔偿请求权和行使合同解除权。然而综观我国民法,都没有规定债务人以上各种权利,就连《合同法》规定的违约责任内容中,也未曾规定债权人因受领迟延而应承担何种违约责任。第三,只要债务人完整适当地履行了给付义务,债权的目的就已实现。如在双务合同中,双方当事人互为债权债务,当双方都完成其相应给付之后,合同目的便已实现。受领作为与给付对应的概念,是指债权人接受债务人的给付。正是因为债权人有受领的权利,所以其接受给付才有合法权源,债务人的给付和债权人的受领完成后也就实现的债的目的。基于此点,受领是债权人的权利,而给付是债务人的义务。第四,权利的本质即为自由,债权作为一种权利也是以自由为核心,因而债权人是否行使债权是完全由自身意志决定的。债权人不为受领行为,属于抛弃债权权利,直接体现了债权的自由性。若受领为债权人的义务,那么债权人拒绝受领即违反了义务,这是不符合常理的,这样不仅完全限制了民事主体的私权处分,也是违背民法基本精神的。

对于受领的定性,之所以除了权利说外还存在其他学说,是因为他们认为受领如果为权利,受领迟延则是权利人放弃行使权利的体现,那么债权人只产生了消极的不利益,而没有造成债务人的损失。但各国立法都规定了相关制度,即债权人在受领迟延时需赔偿债务人的相关损失(如债权人需支付债务人提存费用等),这样理论与实践便产生了冲突。

其实这种理解下产生的冲突,并不是因为“受领是权利”这个逻辑推理的基础错误,而是由“受领是权利”推导出“受领迟延不应该赔偿债务人损失”这一逻辑思维的错误。根据前文所论,在债权的权利义务关系中,与债务人给付义务相对应来

说,受领是一种权利,因此为受领行为是债权人享有权利的体现。债务人受领迟延是一种行为事实,该事实发生之后,债务人便承担着约定之外(或者法定之外)的责任(如善良保管等),这对善良的债务人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为了减轻债务人不合理的负担,法律遂规定在发生受领迟延这一事实之后,债权人应该承担标的物的灭失风险以及提存保管之费用,该费用若是债务人支付的,债权人应予以赔偿。这时所谓的赔偿责任,并非原先之债里的违约责任,而是由迟延受领之事实而引发的独立的无因管理之债。

当然某种情况下,也可能因为债权人受领迟延而产生损害赔偿赔偿责任。债是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的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权利义务关系,如果合同明确约定或者法律直接规定了,债权人作出受领行为的时间、地点、方式等内容,此时债权人迟延受领,那么当事人正是在受领的时间上违反了约定。如此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绝不是因为放弃了受领的权利,而是主体违约或违法行为的结果。因为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地位平等,两方间的义务或由法律直接规定,或由当事人明确设定,此外不发生义务。也就是说如果把受领的时间双方意定(或法律规定)为一种义务,债权人对于债务人的给付未能及时受领,就违反了合同义务。这种约定恰恰是民法保护私权处分的体现。我们说,一般情况下,债权人对债务人的给付不予受领是放弃权利的表现;而特殊情况下,若将受领时间意定或者法定为债权人的义务,债权人受领迟延后因债权人的违约或违法,产生了义务不履行的问题,进而承担损害赔偿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 [1] 韩世远. 履行障碍法的体系[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117.
- [2] 韩世远,张广兴. 合同法总则(下)[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12.
- [3] 罗结珍. 法国民法典(下册)[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969-971.
- [4] 杜景林,卢谌. 德国民法典评注(总则·债法·物权)[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20-184.
- [5] 王泽鉴. 债法原理(第一册)[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47.
- [6] 齐晓琨. 解读德国《民法典》中的债权人迟延制度[J]. 南京大学学报,2010(2):138-139.
- [7] 王兰萍. 《新译日本法规大全》(点校本)第一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17-328.
- [8] 梁慧星.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债权总则编)[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19.
- [9] 王利明. 违约责任论[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87.
- [10] 张广兴. 债法总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90.

[责任编辑:范君]

基于复合 DEA 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测度

——以安徽省中小型科技企业为例

刘传德¹, 何刚¹, 吕金梅²

(1. 安徽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01; 2. 安徽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01)

摘要:基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过程的复杂性,从环境层面、企业层面和员工层面三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复合 DEA 方法对中小型科技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进行测度,找出相对无效单元,并选出对决策单元无贡献的影响指标,为企业改善人力资本管理提供建议。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中小型科技企业;复合 DEA

中图分类号:F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2-0016-04

Measuring th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efficiency based on composite DEA —taking the example of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in Anhui province

LIU Chuan – de¹, HE Gang¹, LV Jin – mei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2.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plexity of the process of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the paper attempts to use composite DEA method to measure th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efficiency of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through building the index system at environmental, corporate and staff levels, this paper finds the relatively ineffective unit, and points out impact indicators that make the decision – making unit relatively invalid, providing advice to administrator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management.

Key word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composite DEA

目前,中小型科技企业是我国科技产业中数量最大、最活跃的一支力量,是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主力军,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与传统企业相比,中小型科技企业具有知识、技术、人才高度密集、追求创新和有形资产少无形资产多的典型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人力资本是中小型科技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源和企业生存的重要保障。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指出在现代经济中,人力资本时代就是指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资本形式,个人以及任何企业的经济成功都取决于如何广泛而有效地

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近年来,为了赢得未来的市场,企业管理人员把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到战略高度,不断增加人力资本领域的投资额度,然而投资的科学性和收益性相对较低,投资收效不明显。本文运用复合 DEA 方法对案例企业进行分析,挖掘人力资本投资投入产出的“黑箱”过程,找出影响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收稿日期:2013-09-11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11-12D108);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0YJAZH025)

作者简介:刘传德(1990-),男,安徽六安人,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人力资本管理。

一、文献述评

关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研究,国外早已有之,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美国学者加里·贝克尔,运用微观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法克尔,运用微观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法分析在职培训的方式、投资和收益之间的关系,提出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多少,取决于其回报率不能低于利率和有形资产的回报率^[1]。雅各布·明赛尔在《在职培训:成本、收益与某些含义》一文中,根据劳动者个人收益率差别,估算出美国对在职培训的投资总量和在这种投资上获得的私人收益率^[2]。人力资本之父舒尔茨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对教育投资的收益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了定量研究^[3]。国内学者研究成果主要有:蒋冰、吴燕燕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企业员工培训,提出企业应当有选择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在留住员工的基础上提高企业的投资收益^[4]。顾阳基于多个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绩效数据,提出人力资本以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运营为介质影响企业绩效,得出人力资本与绩效考评正相关^[5]。陈树文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进行分摊分析,认为企业与员工都不可能独自承担投资成本,最优选择是双方共同分摊人力资本投资成本^[6]。

文献研究发现,对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研究成果较多,并且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但是,从投入产出角度,深入分析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研究较少,尤其是针对中小型科技企业。同时,归因于当前国内外没有统一的人力资本测度体系,以及相关学者对于概念理解的差别,评价结果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以企业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典型特征和人力资本投资过程的复杂性,进一步深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因素,构建系统的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指标体系,运用复合DEA方法,评价目标企业的投资效率,并针对薄弱环节提出改善建议,从微观层面丰富人力资本投资评价理论。

二、模型的构建

(一) 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DEA评价中,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与确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7]。在中小型科技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过程中,投入成本并不是单纯成比例地转化为企业效益,而是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因

而需要建立一个影响因素体系,全面系统地剖析中小型科技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过程。指标选取应该反映评价目的,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测度尽可能反映出环境层面、企业层面和员工层面等各要素差异。首先,通过相关文献研究、企业问卷调查和专家访谈等路径初步确定影响因素体系;之后,运用德尔菲法对初始指标进行净化和补充;最终,通过专家组论证,得出环境层面、企业层面、员工层面三个维度的指标,每个维度下设若干子指标,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中小型科技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效率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
环境层面		政府政策 y_1
		宏观经济状况 y_2
		行业状况 y_3
		科学技术因素 y_4
		自然环境因素 y_5
中小型科技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效率测度指标体系	企业层面	企业经济效益 y_6
		企业文化水平 y_7
		企业品牌形象 y_8
		管理艺术 y_9
		决策科学度 y_{10}
员工层面		核心员工流动率 y_{11}
		员工受教育程度 y_{12}
		学习能力 y_{13}
		团队意识 y_{14}
		员工心理素质 y_{15}
		员工生理素质 y_{16}
		员工职业规划 y_{17}

(二) 复合DEA方法

复合DEA模型是一种效率评价模型,对多输出和多输入问题具有很好的分析能力;并且相对其他评价方法,其对数据的要求较低,即便数据不多也可以分析,而且无需对指标权重进行人为设定,从而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8-9]。本文不考虑投资的规模有效性,运用基于输出的 C^2GS^2 模型,深入剖析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内部环节的运作情况。首先,通过模型计算得出样本企业“有效性系数”,让企业找准自己在市场中的位置;其次,由于在不同指标体系下评价结果的差异性,文中通过逐一减少指标,观察相关指标对于整体评价结果的影响

度^[10],从而为企业管理人员找出决策单元相对无效的影响因素和改进方案,使得管理工作有的放矢。

1. 计算各个决策单元的有效性系数

把案例企业设为 n 个具有可比性的决策单元(DMU),每个 DMU 都有 m 种类型的“输入”, s 种类型的“输出”。

x_{ij} 表示第 j 个单元的第 i 种投入的数量, $x_{ij} > 0, y_{rj}$ 表示第 j 个单元的第 r 种投入的数量, $y_{rj} > 0, v_i$ 是第 r 种投入的一种度量, u_r 是第 r 种产出的度量^[11]。

$$X_j = (x_{1j}, x_{2j}, \dots, x_{mj})^T, j = 1, \dots, n$$

$$Y_j = (y_{1j}, y_{2j}, \dots, y_{sj})^T, j = 1, \dots, n$$

$$V = (v_1, v_2, \dots, v_m)^T$$

$$U = (u_1, u_2, \dots, u_s)^T$$

评价案例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有效性数学方程如(1)所示,

$$(C^2R)' \begin{cases} \max \frac{U^T Y_0}{V^T X_0} \\ \frac{U^T Y_j}{V^T X_j} \leq 1, j = 1, \dots, n \\ U \geq 0, U \neq 0 \\ V \geq 0, V \neq 0 \end{cases} \quad (1)$$

本文把所有的输入都看作是 1,只测量输出有效性,此时模型(1)可以写成:

$$\begin{cases} \max U^T Y_0 \\ U^T Y_j \leq 1, j = 1, \dots, n \\ U \geq 0, U \neq 0 \end{cases} \quad (2)$$

运用 deap2.1 软件,可以计算得出每个案例企业的有效性系数 θ_i ,若 $\theta_i = 1$,该决策单元为弱有效;若 $\theta_i = 1$,且 $V^0 > 0, U^0 > 0$ 那么该决策单元有效。

2. 找出影响无效单元最大的输出指标

运用 deap2.1 软件计算案例企业的 $\theta_i(A_i)$ 值,其中 A 表示所有输出指标的集合, A_i 表示输出集中删除第项之后的集合,那么 $\theta_i(A_i)$ 表示第个决策单元除去第项输出指标之后的有效性系数。之后计算 θ_i 与 $\theta_i(A_i)$ 的差值,记为 b_i 。则 $b_i = \theta_i - \theta_i(A_i)$,找出 b_1, b_2, \dots, b_i 中的最小值,如最小值为 b_s ,则第 s 项输出指标对无效单元 i 的影响最大,经济意义就是第 s 项指标的产出太小,从而案例企业应该把 s 项作为重点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改进方案。

三、实证研究

(一) 数据采集和样本选取

从表 1 指标体系可以看出,本文选取的指标既

有定量指标又有定性指标,定量指标可以从企业经营数据直接获取,而定性指标不能直接从企业的经营报表和相关统计年鉴获得,考虑数据的同一性,文章对所有评价指标采用国际通用的 1-7Likert 专家打分法进行赋值(如表 2)。其中,1 表示情况很差,7 则表示情况表现很好。其中定量数据的评分,按照案例企业数据的大小,划分到七个等级指标中;对于定性数据,课题组组织相关专家和企业领导对其进行直接赋值,并以专家赋值的平均值作为指标数据。对于样本的选取,考虑到员工层面的指标数目为 8 个,从 DEA 数据处理科学性角度,决策单元数目是指标数目 2 倍以上,本文选取 20 家安徽地区中小型科技企业作为实证对象。

(二) 案例分析

表 2 20 家企业的指标数据

DMU	OUTPUT						
	Y ₁₁	Y ₁₂	Y ₁₃	Y ₁₄	Y ₁₅	Y ₁₆	Y ₁₇
1	5	3	1	1	1	1	2
2	3	7	2	7	6	5	3
3	6	4	6	7	4	1	6
4	4	2	1	6	4	1	6
5	3	7	7	1	7	4	1
6	7	7	6	2	5	1	3
7	7	4	4	3	5	6	4
8	4	1	5	5	7	6	3
9	5	2	2	1	6	6	5
10	5	3	4	6	5	2	5
11	2	5	7	1	2	5	3
12	3	2	4	5	2	4	4
13	4	5	4	4	7	7	1
14	2	5	2	6	1	5	7
15	6	2	4	6	4	6	2
16	2	1	5	7	2	4	1
17	2	3	5	7	7	4	3
18	2	3	3	3	5	6	2
19	2	3	3	5	4	1	4
20	4	4	7	2	4	1	3

鉴于文章篇幅有限,且三个层面复合 DEA 测度方式相同,故本文只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最直接对象员工层面进行测度。若企业需要完整评价结果,其他两个层面和总体评价可以依照文中介绍方法步骤进行进一步细化。经过数据采集和处理,20 家案例企业赋值数据如表 2 所示,deap2.1 软件对于原始数据具有标准化处理功能,文中不做赘述。以员工层面指标作为输出指标的复合 DEA 计算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3 员工层面指标的复合DEA计算结果

DMU	θ	去掉 Y_{11}	去掉 Y_{12}	去掉 Y_{13}	去掉 Y_{14}	去掉 Y_{15}	去掉 Y_{16}	去掉 Y_{17}
1	0.714	0.471	0.714	0.689	0.700	0.532	0.714	0.714
2	1.000	1.000	0.842	1.000	0.875	1.000	1.000	1.000
3	0.875	0.689	0.870	0.742	0.742	0.545	0.719	0.870
4	0.910	0.876	0.899	0.546	0.776	0.899	0.899	0.857
5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6	0.689	0.610	0.543	0.609	0.471	0.689	0.689	0.554
7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8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9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966
10	0.989	0.985	0.989	0.989	0.962	0.900	0.989	0.966
11	1.000	1.000	1.000	0.875	1.000	1.000	1.000	1.000
12	0.874	0.874	0.874	0.808	0.842	0.874	0.714	0.823
1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4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922
15	0.968	0.968	0.879	0.789	0.919	0.912	0.968	0.567
16	1.000	1.000	1.000	1.000	0.766	1.000	1.000	1.000
17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8	0.899	0.899	0.899	0.899	0.897	0.899	0.733	0.857
19	0.796	0.796	0.791	0.796	0.786	0.714	0.796	0.714
20	1.000	1.000	1.000	0.752	1.000	1.000	1.000	1.000

人力资本投资最直接的对象就是企业员工,对员工层面相关指标进行评价,是检验人力资本投资实施效果最有效的方式。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表现为:核心员工的流失率相对与同行业比较低;员工自身素质有质的飞跃,无论是知识层面还是心理素质都会有较大的提高;同时员工自身的学习能力也会提高;具备良好综合素质的员工,对自身未来职业有科学的规划。在复合DEA的帮助下,得出如表3所示的20家企业的计算数据,其中值显示部分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有效性不足,这表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大量的投资没有给员工带来切身效用。这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及时改进,因为当员工没有真切的感受到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时,会造成员工流动性加大,会进一步增加企业的人才招募和培训的成本。表3显示DMU1, DMU3, DMU4, DMU6, DMU10, DMU12, DMU15, DMU19企业投资有效性系数小于1,也即存在投资相对无效。将指标逐一减少,观察有效性系数变化,找出导致决策单元相对无效的原因,为企业下一步的改进提供方向。在此,以DMU19为例,通过复合计算得出, Y_{11} , Y_{13} , Y_{16} 指标是导致决策单元相对无效的主要原因,为使决策单元回归到有效的水平,首先,企业管理人

员要深度调查核心人员流失的原因,改善企业员工待遇,明晰员工职业规划;其次,员工的学习能力不强,说明企业在员工培训的过程中,只注重传授知识和技能,忽视传授员工如何去自我思考,鉴于此企业可以引进学习型组织相关管理办法,让员工在思维层次上寻求突破;最后该企业的员工生理素质存在不足,说明企业在员工医疗体系投入不够,身体是员工工作的基本保障,企业必须尽快改善医疗保障体系。

四、结语

人力资本是未来社会竞争的核心,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同时注重投资的科学性,有效规避盲目投资。通过建立多维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指标体系,尝试运用复合DEA作为测度的方法,深入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各方面因素,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进行测度,有效的评价案例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水平,并找出导致相对无效的指标,对企业改善投资状况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

参考文献:

- [1] 加里·S·贝克尔. 人力资本[M]. 梁小民,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 [2] 雅各布·明赛尔. 人力资本研究[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 [3] 西奥多·W·舒尔茨. 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M]. 蒋斌,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0.
- [4] 蒋冰,吴燕燕. 博弈论在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中的应用[J]. 经营管理者,2009(14):185.
- [5] 顾阳. 科技人力资本与科技型中小企业绩效——基于沈阳15家科技型企业的实证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2009(7):338-340.
- [6] 陈树文,李晓尘,姜海.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与风险研究[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10(1):6-10.
- [7] 王军霞,官建成. 复合DEA方法在测度企业知识管理绩效中的应用[J]. 科学学研究,2002,2(20):84-88.
- [8] 魏权龄. 评价相对有效性的方法[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8:6-131.
- [9] 马占新.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在中国经济管理中的应用进展[J]. 管理学报,2010,7(5):785-789.
- [10] 魏权龄,王鑫. 复合DEA方法及应用[J]. 管理工程学报,1993,7(4):216-220.
- [11] 魏权龄,王鑫. DEA与数据挖掘[J].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9,39(24):141-151.

【责任编辑:范君】

区域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

——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

严慧斌, 崔跃武, 汪克亮

(安徽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01)

摘要:在规模报酬可变假设下,利用非参数DEA方法对2006-2010年全国30个省区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再运用Malmquist指数法分析各省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动态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考察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区域差异的形成机理。实证结果表明:样本期内,由于技术退步,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从区域角度来看,东部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表现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为了防止区域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中央政府应该加大对中、西部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

关键词: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DEA;Malmquist指数法

中图分类号:N94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2-0020-09

Evaluation on regional LMI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based on DEA – Malmquist index

YAN Hui – bin, CUI Yue – wu, WANG Ke – l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large – scale variables may change, this paper measur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LMIE (large and medium – siz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China's 30 provinces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6 – 2010 by utilizing nonparametric DEA method, analyzes dynamic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MI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by using the Malmquist index method, and studi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LMI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because of technological regress,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LMIE in China has shown a downward tendency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LMIE in eastern regions is much better than that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ccordingly, in order to avoid the expansion of the gap,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its support for LMI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Key words: LMIE;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 DEA; Malmquist index

一、引言

世界经济发展历程已经告诉我们:技术创新是

人类社会财富之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与不竭动力。当前,在企业日益成为创新主体的条件下,知识的生产将更多源于企业,工业企业已成为

收稿日期:2013-12-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071003);安徽省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011sk153zd);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11-12D107);安徽省高校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SK2012B146)

作者简介:严慧斌(1989-),男,安徽宿松人,硕士,研究方向:技术创新管理。

区域技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工业企业中的大中型企业则又是工业企业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创新能力的高低。据统计,截止2011年底,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人员全时当量为136.99万人,申请的专利数为19.89万件,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48.23%和53.76%。因此,我们应该不断加大投入坚定不移的推进技术创新,实现技术跨越发展,与此同时,我们更要关注技术创新的效率,因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创新资源有限,技术创新效率会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的质量。因而,在此背景下对我国各省区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科学测度,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上考察其异质性特征,并由此提出相关改进的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技术创新效率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国外学者如Sharma和Thomas^[1](2008)考察了国家创新效率水平的高低,并分析了国别差异形成的原因;Gayle^[2](2001)以美国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企业的规模和市场份额与企业的创新能力显著正相关;Akihiro and Shoko^[3](2008)对日本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测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国内学者如池仁勇等^[4](2005)、虞晓芬等^[5](2004)均从区域技术创新效率视角研究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认为要增强我国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减小三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中西部地区须要促进企业制度变革、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白俊红与江可申^[6-8](2008,2009,2010)对我国区域创新系统效率进行评价,得出我国区域创新效率偏低的结论,且证实这是由于纯技术效率过低所致;李婧等^[9-10](2008,2010)对中国各省区区域创新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分析了东、中、西三大地区创新效率的差异进行了分析,认为技术效率较低的地区正在向领先地区靠拢,存在收敛趋势;Zhang et al.^[11](2003)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度了中国企业的研发效率并分析了影响因素;吴延兵^[12](2008)运用DEA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29个省区1996-2003年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知识生产率,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并考察其收敛性;项本武^[13](2011)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我国工业行业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测度,发现工业行业技术创新效率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提高;官建成与马宁^[14](2003)、官建成与陈凯华^[15]

(2009)均是运用DEA方法对我国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改进对策与建议。

已有研究取得很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结论,但仍存在可拓展之处。第一,过去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整个区域的创新效率,而区域大中型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还较少;第二,既有研究往往只是基于某一年的截面数据,而没有研究技术创新效率的动态演变趋势,或只关注技术创新效率的整体变化而忽视了区域差异性的研究,缺乏系统性与全面性。DEA作为一种非参数的统计估计方法,无须假设任何权重,也不须要给定投入产出的生产函数,避免了很多主观因素,在评价多投入、多产出对象的相对效率方面有其独特优势。基于此,本文将全国30个省区(西藏数据缺失)大中型工业企业2004-2010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非参数DEA方法科学测度各省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每年的技术创新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技术有效性及规模有效性,基于Malmquist指数法分析各省市自治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动态变化,并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差异性特征进行分析,以为全面提升各省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提供经验依据与决策参考。

二、研究方法

(一)BCC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由美国运筹学家Charnes、Cooper与Rhodes在1978年提出,即CCR模型,该模型借助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确定相对有效的生产前沿面,将各个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s, DMU)投影到生产前沿面上,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偏离生产前沿面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DEA方法有其独特的优势:一是适用于多输入多产出的有效性评价;二是应用DEA方法无须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三是无须任何权重假设,排除了很多主观因素。

CCR模型是最经典的DEA模型,其建立在规模报酬不变假设的前提下,而这种假设多与现实不符。为此,Banker et al.(1984)在CCR模型基础上加上规模报酬可变的条件,提出了BCC模型,不仅更加符合实际生产经验,而且可以考察决策单元的技术有效性与规模有效性,其具体形式为:

$$\begin{aligned} & \min \theta \\ & s. t. \sum_{j=1}^n \lambda_j x_j \leq \theta x_0; \sum_{j=1}^n \lambda_j y_j \geq y_0; \\ & \sum \lambda_j = 1; \lambda_j \geq 0, j = 1, \dots, n \end{aligned} \quad (1)$$

其中, θ 为评价单元的有效值, s^+ 和 s^- 为松弛变量, λ_j 为原决策单元与对应的重新构造的决策单元的组合比例。

由 CCR 模型求出的效率值 (TIE) 可分解为规模效率 (SE) 与纯技术效率 (PTE) 的积, 即: 技术效率 = 纯技术效率 \times 规模效率, 纯技术效率为 BCC 模型所求的效率值。根据 $\sum \lambda_j$ 的值来判断决策单元规模报酬情况: $\sum \lambda_j > 1$ 时, 表示规模报酬递减; $\sum \lambda_j = 1$ 时, 表示规模报酬达到最佳收益点; $\sum \lambda_j < 1$ 时, 表示规模报酬递增。

(二) Malmquist 指数法

Malmquist 指数是由 Malmquist 于 1953 年提出, Caves et al. [16] (1982) 则是首次利用 DEA 构造 Malmquist 指数测度效率变化或生产率。由此, 本文研究中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变化指数 (TIEC) 可以表示为:

$$TIEC_t^{t+1} = M_t^{t+1} = \left[\frac{D^t(x^{t+1}, y^{t+1})}{D^t(x^t, y^t)} \times \frac{D^{t+1}(x^{t+1}, y^{t+1})}{D^{t+1}(x^t, y^t)} \right]^{\frac{1}{2}} \quad (2)$$

根据 Fare et al. [17] (1994) 的研究, 我们可以将技术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 (EFFCH) 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 (TECHCH), 可以进一步理清效率变化的根源:

$$TIEC_t^{t+1} = M_t^{t+1} = \underbrace{\frac{D^{t+1}(x^{t+1}, y^{t+1})}{D^t(x^t, y^t)}}_{EFFCH} \times \underbrace{\left[\frac{D^{t+1}(x^{t+1}, y^{t+1})}{D^t(x^t, y^t)} \times \frac{D^{t+1}(x^t, y^t)}{D^{t+1}(x^t, y^t)} \right]^{\frac{1}{2}}}_{TECHCH} \quad (3)$$

其中, EFFCH 表示决策单元对生产前沿的一种“追赶”效应, EFFCH > 1 表明前沿面下的 DMU 向前沿面趋近, 而 EFFCH < 1 表明远离前沿面; TC 表示生产前沿面的移动, TC > 1 表示生产前沿外移, 也就是有技术创新, TC < 1 表示生产前沿内移, 即技术退步。当技术效率变化 (EFFCH) 在可变规模报酬时, 可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 (PTEC) 和规模效率变化 (SEC)。

$$EFFCH = \underbrace{\frac{D^{t+1}(x^{t+1}, y^{t+1} | V)}{D^t(x^t, y^t | V)}}_{PTEC} \times \underbrace{\left[\frac{D^{t+1}(x^{t+1}, y^{t+1} | C)}{D^t(x^t, y^t | C)} \times \frac{D^t(x^t, y^t | V)}{D^{t+1}(x^t, y^t | V)} \right]}_{SEC} \quad (4)$$

前面一项为纯技术效率变化 (PTEC), 第二项为规模效率变化 (SEC)。PTEC < 1 时, 表示纯技术效率下降, 反则反之; SEC > 1 时, 表示规模效率提升, 反则反之。

由 (3)、(4) 式可知, 在规模报酬可变假设前提下,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可以分解为:

$$TIEC_t^{t+1} = M_t^{t+1} = PTEC \times SEC \times TECHCH \quad (5)$$

即将技术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规模效率变化指数以及技术进步指数。

三、变量与数据

分析区域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 科学合理的选择投入产出指标非常关键。本文综合吴延兵 [18] (2006)、官建成等 [14] (2003)、白俊红等 [6,7,8] (2008, 2009, 2010) 的研究, 选择的投入指标如下: R&D 人员全时当量 (X_1), 这一指标反应从事 R&D 活动全是人员和非全时人员按工作量折算为全时人员的总和, 更真实的反映了企业从事 R&D 活动人员数量; 开发新产品经费 (X_2), 这一指标反应企业专门用于新产品开发的经费, 是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重要指标; 其它技术活动经费支出 (X_3), 指企业用于技术改造、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购买国内技术的经费, 是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另一重要指标。产出指标选择: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 (Y_1), 是衡量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直接指标, 包含企业广泛的创新; Gayle [2] (2001) 将申请专利数 (Y_2) 作为衡量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一个重要指标, 专利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成果, 申请专利越多,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越强; 柳卸林和陈璐 [19] (1995)、Liu et al. [20] (2007) 将新产品工业产值 (Y_3) 作为创新产出的又一重要指标, 这一指标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目的, 反应企业技术创新最重要的成果。由于 DEA 研究数据时要求样本量是指标数的 2 倍以上, 因而本文以中国 30 个省区为研究对象, 选取 6 个投入产出指标是适当的。本文数据来源主要是来源于 2007 - 2011 年各期《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由于科技活动的特殊性, 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时滞性”, 我们参考 Furman et al. (2002) [21] 的研究, 将各指标的时滞定为 2 年。即 2004 年的投入, 对应 2006 年的产出, 依次类推。表 1 中为投入产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表1 样本投入、产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2006-2010)

变量	单位	个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Y_1	件	150	24 443	35	4 044	4 471
Y_2	件	150	43 776	5	3 932	6 973
Y_3	千万元	150	114 984	100	15 458	19 915
X_1	人年	150	258 943	85	32 514	39 611
X_2	千万元	150	7 200	15	941	1 341
X_3	千万元	150	5 479	6	1 367	1 081

由于数据用DEA模型进行研究有一个前提条件,即投入产出变量之间是否满足“等张性”,也就是决策单元投入增加时,对应产出也应增加^[22]。所以,先用Pearson相关分析进行验证,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在不低于0.05的显著性水平的情况

下,投入产出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表中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结果可知,样本数据满足“等张性”的条件要求,可以用DEA模型建模^[23,24]。

表2 样本投入、产出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

变量	X_1	X_2	X_3	Y_1	Y_2	Y_3
X_1	1.000					
X_2	0.767**	1.000				
X_3	0.895**	0.867**	1.000			
Y_1	0.887**	0.792**	0.816**	1.000		
Y_2	0.906**	0.840**	0.921**	0.938**	1.000	
Y_3	0.846**	0.530**	0.737**	0.824**	0.838**	1.000

注:**表示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四、实证分析

(一)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地区差异

本文应用DEAP2.1软件,基于投入导向的模式,以全国30个省区2006-2010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选取新产品开发项目数、申请专利数、

新产品工业产值为产出变量,R&D人员全时当量、开发新产品经费、其它技术活动经费支出为投入变量,运用BCC-DEA模型测算各省份的技术创新效率、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测度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各省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分析结果(部分年份)

省份	2006年			2008年			2010年			5年均值		
	TIE	PTE	SE	TIE	PTE	SE	TIE	PTE	SE	TIE	PTE	SE
北京	0.728	0.733	0.993	1.000	1.000	1.000	0.905	0.906	0.999	0.895	0.883	0.997
天津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河北	0.563	0.586	0.961	0.602	0.605	0.995	0.764	0.767	0.996	0.645	0.623	0.987
山西	0.520	0.523	0.994	0.436	0.448	0.973	0.533	0.542	0.984	0.503	0.512	0.986
内蒙古	0.815	0.863	0.944	0.576	0.624	0.923	0.515	0.527	0.976	0.658	0.684	0.952

辽宁	0.498	0.509	0.977	0.588	0.594	0.990	0.602	0.615	0.979	0.547	0.576	0.983
吉林	0.826	0.872	0.948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974	0.906	0.981
黑龙江	0.759	0.771	0.986	0.578	0.591	0.978	0.913	0.915	0.998	0.757	0.782	0.995
上海	1.000	1.000	1.000	0.905	1.000	0.905	0.817	1.000	0.817	0.952	1.000	0.932
江苏	0.545	0.566	0.962	0.631	1.000	0.631	0.734	0.961	0.764	0.678	0.865	0.789
浙江	0.726	0.832	0.873	0.946	1.000	0.946	1.000	1.000	1.000	0.896	0.963	0.976
安徽	0.812	0.850	0.955	0.696	0.697	0.999	1.000	1.000	1.000	0.841	0.972	0.981
福建	0.796	0.860	0.926	0.674	0.688	0.979	0.697	0.700	0.996	0.705	0.768	0.981
江西	0.566	0.576	0.983	0.589	0.601	0.980	0.717	0.722	0.994	0.653	0.651	0.985
山东	0.793	1.000	0.793	0.702	1.000	0.702	0.730	1.000	0.730	0.786	0.999	0.735
河南	0.581	0.595	0.976	0.724	0.787	0.919	0.798	0.799	0.999	0.764	0.798	0.980
湖北	0.643	0.660	0.974	0.673	0.673	1.000	0.677	0.681	0.993	0.687	0.675	0.996
湖南	0.887	0.892	0.995	0.560	0.565	0.992	0.924	0.925	0.999	0.886	0.901	0.994
广东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999	1.000	0.999
广西	0.863	0.870	0.992	0.782	0.799	0.979	1.000	1.000	1.000	0.879	0.968	0.996
海南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983	1.000
重庆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994	0.998	1.000
四川	0.860	1.000	0.860	0.835	0.943	0.886	1.000	1.000	1.000	0.954	0.985	0.923
贵州	0.806	0.935	0.863	0.959	1.000	0.959	0.986	1.000	0.986	0.946	0.960	0.973
云南	0.529	0.555	0.955	0.750	0.811	0.924	0.602	0.625	0.964	0.674	0.742	0.952
陕西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883	0.883	0.999	0.965	0.967	0.999
甘肃	0.692	0.695	0.995	0.781	0.836	0.935	0.959	0.994	0.964	0.897	0.874	0.951
青海	0.679	1.000	0.679	0.595	1.000	0.595	0.368	1.000	0.368	0.547	0.989	0.586
宁夏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997	1.000	9.987
新疆	0.885	1.000	0.885	0.445	0.556	0.801	0.466	0.543	0.858	0.743	0.768	0.863
均值	0.779	0.825	0.949	0.768	0.827	0.933	0.820	0.870	0.945	0.786	0.847	0.929

通过计算我们发现,2006-2010年期间,全国整体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平均技术创新效率值为0.786,整体水平不高,距离生产前沿面还存在21.4%的改进空间,效率提升潜力较大。从演变趋势来看,如表1所示,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呈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强的波动性,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说明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并不稳定。样本期内,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纯技术效率则一直处于比较稳健的提升进程之中,而技术创新规模效率在考察期内也存在一定的波动性,但是波动幅度不大。相比较而言,平均纯技术效率为0.847,而平均规模效率达到0.929,说明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主要受制于较

低的纯技术效率,为此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是主要改进策略,而规模效率已经接近生产前沿,改进空间较小,因而不能再一味追求投入的增加,否则适得其反。

从各省区的五年均值来看,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均值为1的省区只有天津、海南,它们位于生产前沿面,效率相对最优,起到带头与示范作用。天津近年来积极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形成以企业主导产业技术开发创新体制,滨海新区更是成为推动天津自主创新发展的强劲动力。海南省通过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形成了主导产业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局面,现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总体规模较小,但企业管理制度科学,创新资源利用效率

较高;效率值在均值以下的省区有: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江苏、福建、江西、河南、湖北、云南、青海、新疆,这些省份是国家推进企业技术创新政策需要重点关注的省区。其中来自于东部沿海的江苏、福建较为特殊,原因各不相同,江苏省技术创新效率低下的主要是规模效率低所致,而福建省则是由于纯技术效率低下导致技术创新效率低。其它省区大多来自于经济欠发达、技术较落后及管理水平低下的中西部地区,尤其有山西、辽宁、青海的技术创新效率均值更是低于0.600,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状况“恶劣”,亟需改善。为此,国家应制定对应相关政策,加大对这些省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以带动这些省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实现跨越式提高。

(二) 区域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动态演变及其分解

基于投入导向模式,利用DEAP2.1软件测算2006-2010年全国各省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变化Malmquist指数并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与技术进步指数,考察技术创新效率的动态演变趋势以及效率变化的根源。按照传统地域划分方法,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在此基础上分析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分布特征和区域差异。

1. 效率演变及分解

通过结果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从全国整体来看,2006-2010年各省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年均下降2.9%。其中,技术进步指数年均下降3.2%,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则实现年均3‰的增长。其中,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变化的幅度较小,技术创新效率变化指数的趋势与技术进步指数保持一致,呈现出较强的波动性。虽然技术效率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技术效率的下降,但由于技术进步下降幅度太大,导致技术创新效率呈下降趋势。由此可知,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变化主要是由技术进步的波动引起的。因而提

升工业企业的基础研发能力,不断追求其技术创新领域的技术进步显得非常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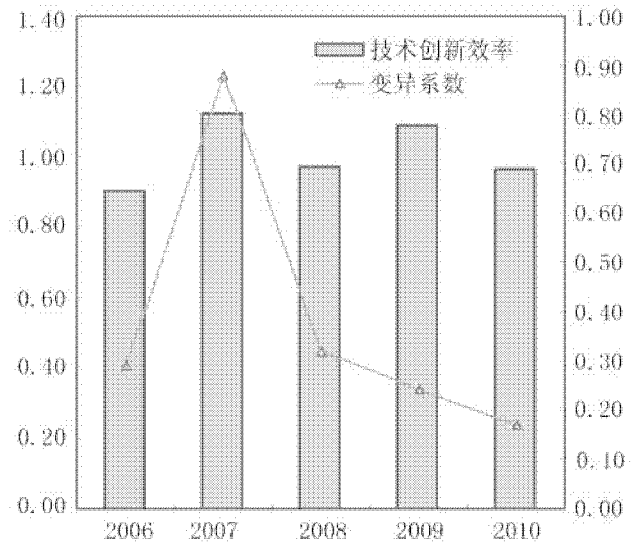


图1 2006-2010年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及变异系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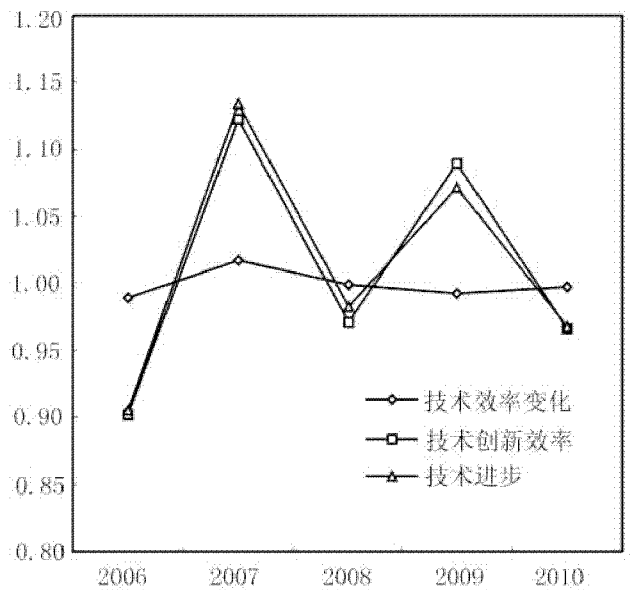


图2 2006-2010年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变化及分解

表4 2006-2010年30个省区大中型工业企业平均技术创新效率的变化及其分解

地区	TIEC	TECHCH	PTEC	SEC	地区	TIEC	TECHCH	PTEC	SEC
北京	1.026	1.047	0.980	1.000	河南	0.923	0.899	1.026	1.001
天津	0.934	0.934	1.000	1.000	湖北	0.951	0.934	1.016	1.002
河北	0.951	0.951	1.053	1.001	湖南	0.969	0.960	1.003	1.006

山西	0.906	0.906	0.984	1.007	广东	1.085	1.085	1.000	1.000
内蒙古	0.961	0.942	0.992	1.029	广西	1.002	0.962	1.028	1.014
辽宁	1.036	0.964	1.076	0.998	海南	1.058	1.058	1.000	1.000
吉林	1.136	1.075	1.044	1.012	重庆	1.018	1.018	1.000	1.000
黑龙江	0.938	0.919	1.015	1.007	四川	0.900	0.900	1.000	1.000
上海	0.970	1.010	1.000	0.960	贵州	0.988	0.928	1.040	1.024
江苏	1.072	1.029	1.059	0.983	云南	0.932	0.960	0.943	1.029
浙江	1.064	0.960	1.094	1.014	陕西	0.896	0.918	0.975	1.000
安徽	0.992	0.992	1.000	1.000	甘肃	0.889	0.883	0.999	1.009
福建	0.966	1.038	0.931	0.999	青海	0.853	1.041	1.000	0.819
江西	0.903	0.905	0.987	1.011	宁夏	0.964	0.893	1.000	1.079
山东	1.024	1.036	1.000	0.989	新疆	0.884	0.982	0.885	1.017
东部	1.017	1.006	1.017	1.085	中部	0.964	0.949	1.007	1.008
西部	0.932	0.948	0.987	0.999	全国	0.971	0.968	1.004	0.999

如图1所示,样本期间内,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增长呈现较强的波动性,特别是在2007和2009年,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增长明显,这主要得益于这两年国家出台了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加大投入力度,促进了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通过计算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变异系数,发现考察期内变异系数趋于减小,表明全国各省区大中型工业企业之间的技术创新效率差距在缩小,整体存在收敛性。

具体到各省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明显差异。北京、江苏、浙江、广东、山东、辽宁、吉林、广西、海南等省份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增长趋势,通过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分解发现,其中北京、山东、广东、海南、重庆等省份来源于技术进步的改善。其它省份技术创新效率的增长则来源于技术效率变化的改善,通过进一步对技术效率变化的分解发现,其中辽宁和江苏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提高来源于纯技术效率的改善,吉林、浙江、广西则是由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共同改善的结果。北京、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广西、海南等沿海东部省份开放程度高,经济发展迅速,形成了非常有利于企业引进、开发新技术的氛围。吉林和

辽宁在中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下,抓住机遇,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而甘肃、陕西、青海、新疆等西部省份的技术创新效率呈下降趋势,通过对技术效率变化的分解发现,是由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较低所致,这与这些省份的工业“底子薄”、研发投入少、管理创新能力较差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省份应当成为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政策重点关注地区。表2中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均值比较看来,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考虑到三大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其深层次的原因。

2. 区域差异性检验

由于我国地域、资源、国家政策等原因造成我国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变化可能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为此,本文根据三大区域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的分解结果,用多样本非参数Kruskal-Wallis检验,来验证三大区域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动态演进的区域差异性特征,表5为检验结果。

表5 三大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演变的差异性检验结果

地区		东部	中部	西部	真实概率 p
技术创新效率变化	最小值	0.934	0.903	0.853	0.002*
	最大值	1.085	1.136	1.018	
	标准差	0.050	0.066	0.054	
技术效率变化	最小值	0.930	0.991	0.819	0.637
	最大值	1.109	1.057	1.079	
	标准差	0.049	0.018	0.073	
技术进步	最小值	0.903	0.899	0.883	0.049*
	最大值	1.085	1.075	1.041	
	标准差	0.054	0.052	0.050	

注: * 表示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由表5可知:(1)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变化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这表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直接联系。其中,东部地区的表现明显由于中西部地区;(2)通过对三大区域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的分解,我们发现,技术效率变化(EFFCH)指数的区域差异并不显著,真实概率p值为0.637,表明东、中以及西部地区各省份均存在对生产前沿面的“追赶”效应;三,技术进步(TECHCH)指数差异显著,东部地区领先于中西部地区,这表明东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新产品的研发能力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这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企业科研资金充足,吸引了众多高端科研人才,建立了很多研发机构,使得其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明显领先中西部地区。

3. 技术创新效率区域差异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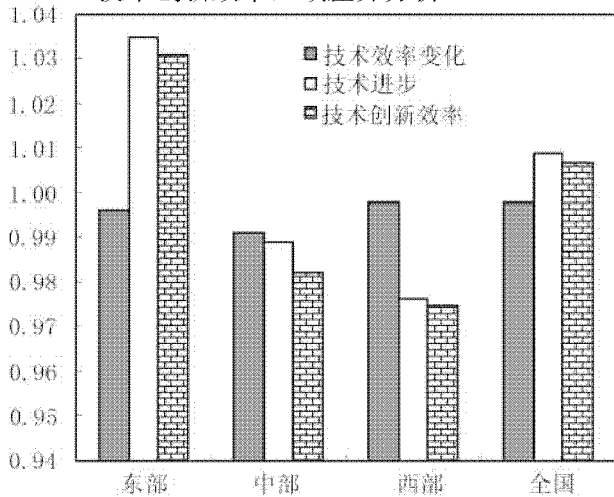


图3 2006-2010年三大区域和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平均技术创新效率及其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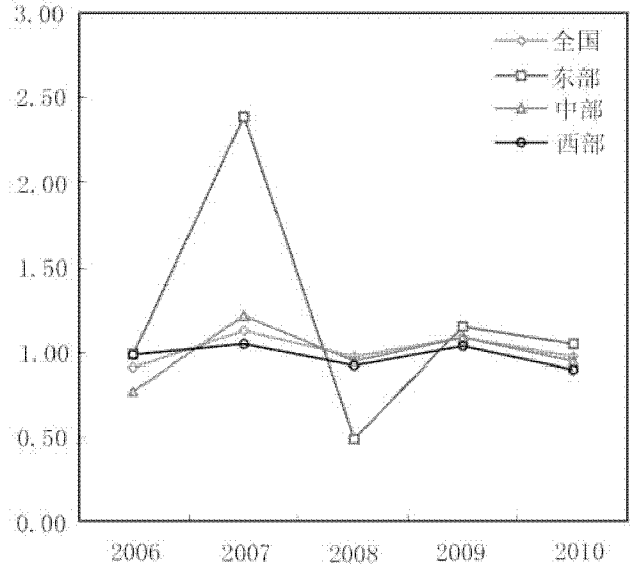


图4 2006-2010年三大区域和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动态变化

从图3、4中可看出,在2006-2010年间,三大区域的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自东向西逐步下降,其中:(1)东部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年均增长3.1%,其中技术进步指数年均3.5%,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则年均下降4%。长期以来东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国家政策倾斜、经济基础雄厚等原因,技术创新能力一直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因此,东部地区作为“引领者”,应继续保持自身优势,不断创新管理理念和方法,以确保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可持续发展,做好“领头”与“示范”作用;(2)中部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则年均下降了1.8%,这是由于技术退步与技术效率

恶化共同导致的。进一步分解发现,技术效率恶化主要是源于规模效率的下降,这表明中部地区各省区在近年在国家“中部崛起”战略宏观政策调控下,工业企业创新投入规模不断增加,但已逐渐接近饱和水平,必须改变依靠扩大投入规模的发展方式,重点提高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3)西部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落后于东、中部地区,年均下降2.5%,主要是由于技术年均退步2.4%所导致。长期以来由于国家实施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导致西部地区工业企业技术水平落后,科研基础薄弱,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西部各省份企业应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机遇,积极引进优秀人才,加大技术研发和创新力度,积极促进地区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模式来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

从图4中可看出,东部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在2007、2008年有较大波动,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的波动所致。中西部地区整体趋于平稳,波动较小。全国整体效率趋向于稳定,三大地区之间的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差距在逐渐缩小,这表明国家近年来实施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宏观政策和战略取得了显著效果。

五、结论与政策涵义

本文运用了基于可变规模报酬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我国30个省区2006-2010年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分析期内,我国各区域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年均下降2.9%,技术进步指数年均下降了3.2%,而技术进步效率指数则上升了3%。所以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下降主要由于技术退步所致;(2)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强的波动性,在分析期内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说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并不稳定,易受国家宏观政策等外部因素影响;(3)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在2006-2010年间大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差异比较大,东部地区年均增长3.1%,中部地区年均下降1.8%,西部地区年均下降2.5%,下降的原因各不相同,中部地区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恶化与技术退步共同所致,西部地区则是由于技术退步造成的。

本文的政策涵义为:(1)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提出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力图通过鼓

励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由于当前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退步。因此,各地区应进一步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在加强自身技术研发能力的同时,不断引进先进的工艺、设备与技术,这是提升我国各地区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根本途径。(2)由于规模效率低下制约了企业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因此,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应该适当调节投入,提高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优化创新资源的配置。(3)东中西三大区域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明显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为此,东部地区应在保持自身优势,稳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前提下,带动中西部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实现跨越式提高,中西部地区则应充分利用技术选择的后发优势,通过购买、模仿与学习东部地区发达的技术以及管理经验来驱动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以最终实现对东部地区的赶超。

参考文献:

- [1] Sharma, S., Thomas, V. J.. Inter - country R&D efficiency analysis: application of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J]. *Scientometrics*, 2008, 76 (3) : 483 - 501.
- [2] Gayle. P. G. "Market Concentration and Innovation: New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Schumpeterian Hypothesis" [R]. *Colorado: University of Colorado*, 2001.
- [3] Akohiro Hashimoto, Shoko Haneda. Measuring the change in R&D efficiency of the Japanes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J]. *Research Policy*, 2008 (4) : 1 - 8.
- [4] 池仁勇,虞晓芬,李正卫.我国东西部地区技术创新效率差异及其原因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04 (8) : 128 - 131.
- [5] 虞晓芬,李正卫,池仁勇,施鸣炜.我国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现状与原因[J]. *科学学研究*, 2005, 23 (2) : 258 - 264.
- [6] 白俊红,江可申,李婧,田泽永.中国区域创新生产效率变动的实证分析 - 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J]. *系统工程*, 2008, 26 (7) : 40 - 44.
- [7] 白俊红,江可申,李婧.应用随机前沿模型评测中国区域研发创新效率[J]. *管理世界*, 2009 (10) : 51 - 61.
- [8] 白俊红,江可申,李婧.中国地区研发创新的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J]. *科研管理*, 2010, 31 (6) : 7 - 18.
- [9] 李婧,白俊红,谭清美.中国区域创新效率的实证分析 -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及DEA方法[J]. *系统工程*, 2008, 26 (12) : 1 - 7.

入世以来中国对外服务贸易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探析

孙 艳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贸易系,安徽 淮南 232007)

摘 要:我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服务贸易取得了可喜成就。文章在总结我国入世以来对外服务贸易主要成就的同时,也提出了对外服务贸易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立足世界贸易组织框架,提出中国今后对外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构想。

关键词:中国;世界贸易组织;对外服务贸易;问题;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2-0029-05

Analysis of China's foreign service trade development status,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since entering the WTO

SUN Yan

(Department of Economy and Trade, Anhui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of Industry & Trade, Huainan, Anhui 232007, China)

Abstract: Since joining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hina has made gratifying achievements in foreign service trade.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the achievements in foreign service trade after china's accession to WTO,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ain problems in foreign service trade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on Chinese foreign service trade in the future with regard to the framework of WTO.

Key words: Chin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foreign service trade; problems; development strategy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第143个成员方。在世界贸易组织基本运行规则指引下,在世界贸易组织三十个协定,特别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保障下,我国对外服务贸易取得了可喜成就。在对外服务贸易规模方面,2012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4 705.8亿美元,同比增长12.3%,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5.6%,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其中,出口为1 904.4亿美元,同比增长4.6%,居世界第五位;进口为2 801.4亿美元,同比增长18.2%,居世界第三位(见表1)。在对外服务贸易行业分布方面,2012年,旅游业居首位,进出口总额1 520.1亿美元,同比增长25.6%;运输业第二,进出口总额达

1 247.7亿美元,同比增长7.5%;咨询业第三,为534.7亿美元;保险服务业第四,为239.3亿美元;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第五,为187.9亿美元;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第六,为182.9亿美元;建筑服务业第七,为158.7亿美元;广告宣传业第八,为75.2亿美元;金融服务业第九,为38.2亿美元;通信服务业第十,为34.4亿美元;其他商业服务总共为479.8亿美元(见表2)。在对外服务贸易目标市场分布上,2012年,我国服务贸易目标市场前五位的国家(地区)分别是中国香港、欧盟(27国)、美国、东盟和日本。我国与上述五个国家(地区)的服务进出口贸易额超过3 100亿美元,占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近三分之二。在对外服务贸易企业结构方面,2012年,我国服务进出口贸易企业结构为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体上

收稿日期:2013-10-28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合肥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路径研究(2012SQRW235)

作者简介:孙艳(1978-),女,安徽淮南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国际贸易。

是4:4:2的格局。也就是说,目前,我国的对外服务贸易依然是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唱主角,民营企业力量相对薄弱。在对外服务贸易国内地区分布方面,2012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地区分布仍相对集中于沪、京、粤三地。其中,上海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1 515.6亿美元,居全国第一;北京首

次突破千亿美元,位居第二;广东为713.1亿美元,排名第三;同比分别增长17.2%、11.7%、15%。三地合计占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69%。在对外服务贸易收支平衡方面,2012年,我国服务进出口贸易为逆差,金额为897亿美元(见表3)。

表1 我国入世以来服务贸易进出口情况及世界排名(2001~2012)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服务进口				服务出口				服务进出口			
	金额	同比增长(%)	占世界比重(%)	世界排名	金额	同比增长(%)	占世界比重(%)	世界排名	总金额	同比增长(%)	占世界比重(%)	世界排名
2001	390	8.8	2.6	10	329	9.1	2.2	12	719	9.0	2.4	13
2002	461	18.1	3.0	9	394	19.7	2.5	11	855	18.9	2.7	9
2003	549	19.0	3.1	8	464	17.8	2.5	9	1 013	18.5	2.8	9
2004	716	30.5	3.4	8	621	33.8	2.8	9	1 337	32.0	3.1	9
2005	832	16.2	3.5	7	739	19.1	3.0	9	1 571	17.5	3.2	9
2006	1 003	20.6	3.8	7	914	23.7	3.2	8	1 917	22.1	3.5	8
2007	1 293	28.8	4.1	5	1 217	33.1	3.6	7	2 509	30.9	3.9	6
2008	1 580	22.2	4.5	5	1 464	20.4	3.9	5	3 045	21.4	4.1	5
2009	1 581	0.1	5.1	4	1 286	-12.2	3.9	5	2 867	-5.8	4.5	4
2010	1 922	21.5	5.5	3	1 702	32.4	4.6	4	3 624	26.4	5.1	4
2011	2 370	23.3	6.1	3	1 821	7.0	4.4	4	4 191	15.6	5.2	4
2012	2 801	18.2	6.8	3	1 904	4.6	4.4	5	4 706	12.3	5.6	3

数据来源:商务部《中国服务贸易统计2012》。

表2 入世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分行业情况表(2001~2012)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运输	159.6	193.3	261.4	366.1	438.8	553.9	745.9	887.5	701.4	974.7	1 160.1	1 247.7
旅游	317	357.9	326	448.9	510.6	582.7	670.2	770	833.8	1 006.9	1 210.5	1 520.1
通信	6	10.2	10.7	9.1	10.9	15	22.5	30.8	24.1	23.6	29.2	34.4
建筑	16.8	22.1	24.7	28.1	42.1	48	82.9	146.9	153.3	195.6	184.5	158.7
保险	29.4	34.6	48.7	65	77.5	93.8	115.6	141.2	129.1	174.8	227.6	239.3
金融	1.8	1.4	3.8	2.3	3.1	10.4	7.9	8.9	11.7	27.2	16	38.2
计算机和信息	8	17.7	21.4	28.9	34.6	47	65.5	94.2	97.4	122.3	160.2	182.9
专有权利 特许使用	20.5	32.4	36.6	47.4	54.8	68.4	85.3	108.9	115	138.7	154.5	187.9
咨询	23.9	39.1	53.3	78.8	115	162.2	224.4	316.8	320.4	378.6	469.7	534.7
广告宣传	5.4	7.6	9.5	15.5	18	24.1	32.5	41.4	42.6	49.3	67.9	75.2
电影音像	0.8	1.3	1	2.2	2.8	2.6	4.7	6.8	3.8	4.9	5.2	6.9
其他	130.2	136.9	215.2	244.3	262.7	309.5	451.5	491.3	434.6	527.7	505.4	479.8

数据来源:依据《中国服务贸易统计2012》整理计算得出。

表3 入世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差额(2001~2012)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差额	-61.3	-67.0	-84.8	-95.5	-92.6	-89.1	-76.0	-115.6	-295.1	-219.3	-549.2	-897.0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号表示对外服务贸易为逆差。

综上所述,入世以来中国对外服务贸易发展势头强劲,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凸显,但同时我们又看到,现阶段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剖析中国对外服务贸易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探寻促进中国对外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服务贸易主要成就

(一)对外服务贸易规模迅速扩大

2001年,我国对外服务贸易额为719亿美元,世界占比为2.4%,世界排名为第13位。2012年,我国服务进出口贸易额猛增至4706亿美元,增长了5.5倍,世界占比为5.6%,提高了3.2个百分点,世界排名为第3位,位次上升了10个位次,已经成为世界对外服务贸易大国。

(二)对外服务贸易结构渐趋优化,高附加值对外服务贸易快速增长

2012年,我国旅游和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8.8%,比2001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高附加值服务中的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广告宣传出口快速增长,分别比上年增长122.5%、18.6%、40.1%、17.8%、18.2%;通信服务、金融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进口增势显著,增幅分别为38.6%、158.4%、20.7%。

(三)重点领域服务进出口贸易成效显著

首先,2012年,旅游和运输等传统服务在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达58.8%,规模优势继续巩固,贸易效益继续提升。其中,旅游服务进出口贸易额为1520.1亿美元,比2001年的317亿美元增长了3.7倍,居各类服务之首;运输服务进出口贸易额为1247.7亿美元,比2001年的159.6亿美元增长了6.8倍,位居第二。其次,我国服务外包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年均增长率在50%以上。2012年,我国服务外包合同金额438.5亿美元,同比增长34.4%,执行金额336.4亿美元,同比增长

41.1%,使中国攀升为全球第二大离岸外包承接国。再次,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呈现良好势头,据不完全统计,我国2009、2010、2011年文化产品核心内容的对外贸易额分别为97882.52万美元、135083.25万美元和145170.65万美元,年复合增长率在20%以上。最后,我国技术进出口贸易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2006年至2011年,我国技术进出口总额从226.1亿美元上升到535.6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了1倍多。

(四)对外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更加健全、政策体系日趋完善

2006年,商务部开始成立了服务贸易司,专门负责拟订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规划、制订我国服务和技术进出口贸易政策,并负责对我国对外服务贸易进行监督和管理。2011年,商务部把服务贸易司更名为服务贸易与商贸服务司。

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相继制订了《服务贸易“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服务贸易“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商务部关于加强服务贸易工作的指导意见》等重要政策文件。同时,在服务外包、技术贸易、会计服务、文化贸易、中医药服务贸易等服务贸易重点领域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我国对外服务贸易政策体系日趋完善。

(五)对外服务贸易促进平台建设取得可喜成绩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已经先后成功举办了三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对推进我国服务进出口贸易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还多次成功举办了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重庆)高峰会、中国(大连)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会、中国(香港)国际服务贸易洽谈会等大型展会,为我国对外服务贸易发展搭建了坚实的平台。

(六)对外服务贸易基础工作不断夯实

入世以来,我国出台了《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使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统计工作更加规范和科学;每年都用中英文对外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全面分析研究我国服务进出口贸易的成就和不足,为我国对外服务贸易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

和数据依据;另外,还适时出版发行《服务贸易简报》、《中国软件出口发展报告》等资料手册,以指导我国对外服务贸易健康快速发展。

(七) 服务市场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

入世以来,我国认真履行承诺,为国外服务商提供了包括金融、电信、建筑、分销、物流、旅游、教育等在内的广泛的市场准入机会。“在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分类的160个分部门中,中国开放了100多个,开放范围已经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011年,中国新设立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15 000家,利用外资大约500亿美元,占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近50%。我国的服务贸易对外开放度,2011年已达到了7.25%,处于世界中等水平。

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服务贸易主要问题

(一) 对外服务贸易规模仍偏小,且持续逆差

我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对外贸易总额为43 375亿美元,其中,服务贸易4 706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0.8%;货物贸易38 669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89.2%。世界各国对外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平均水平为18.6%,而我国仅为10.8%,显然,我国的对外服务贸易比重偏低;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际货物贸易的比重为10.5%,而我国服务进出口贸易额仅占国际服务贸易总额的5.6%,只是货物贸易占比的将近一半,服务贸易规模明显偏小,这与我国的经济总量、与我国的对外货物贸易量是不相吻合的。

入世以来,我国对外服务贸易就一直处于逆差状态。特别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且最近两年迅猛增加,2011年为549.2亿美元,2012年更是高达897亿美元,已处于严重失衡状态。

(二) 对外服务贸易结构失衡

一是服务贸易部门结构失衡。我国对外服务贸易仍以传统行业为主,2012年,传统的旅游和运输服务占我国对外服务贸易总额的58.8%,而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咨询服务等高附加值服务贸易仅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21%左右,部门结构明显失衡。

二是服务贸易区域发展不平衡。2012年,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相对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大

约90%的服务进出口贸易是由我国东部的11个省份完成的,其中沪、京和粤三地服务贸易进出口就占到了69%,远超其他省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而西部地区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服务贸易发展十分落后。

三是服务贸易国别(地区)结构失衡,目标市场过于集中。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目标市场过于集中,中国香港、美国、欧盟、日本和东盟等国家和地区是我国对外服务贸易最主要的目标市场。特别是中国香港地区,2012年与我服务贸易进出口额达1 345.5亿美元,占到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的28.6%;上述五个国家和地区占我国服务进出口额的比重则高达65%,而很多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和地区却几乎为零。

(三) 服务业整体发展滞后,开放度不高,竞争力不强

由于我国服务业起步较晚、层次低且相对落后,导致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相对低下。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或接近70%,而中国现在仅为43%,占比相对偏低。一个国家如果服务行业整体发展滞后,势必会影响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另外,我国对外服务贸易中,垄断经营现象严重,诸如金融、保险、证券、运输、邮政、电信、医疗、教育、商业、科研等部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垄断经营。因为垄断,这些部门和企业往往就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和压力,市场开拓和竞争的意识 and 实践就会淡化和弱化,其后果就是保护落后、工作懈怠、效益低下、竞争力疲软等。

四、我国对外服务贸易发展对策构想

(一)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步伐

现代服务业具有“三高”等特点,即高人力资本含量、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一方面,要加快发展信息、金融、保险以及会计、咨询、法律服务、科技服务等商务服务行业;另一方面,要不断拓展新的服务领域,加快发展动漫服务业、计算机和软件服务业、创意服务业、会展服务业等。同时,还要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推进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特许经营、多式联运、物流配送等组织形式和服务方式的发展。

以开放促发展,是我国未来服务贸易发展的总

趋势。我国要根据自身的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与国际接轨,放宽市场准入,消除市场壁垒,不断提升服务业开放水平,并利用国外服务业的先进理念和管理手段,加快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在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同时,可通过服务贸易“商业存在”模式,实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的开放型经济战略转型,扩大服务贸易规模,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战略升级。

(二) 多渠道扭转服务贸易逆差

一是要适度管控汇率波动。2012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额高达897亿美元,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也是造成这种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一定要坚持有管控的汇率政策,控制住人民币汇率的不断上扬,为服务出口企业减压。

二是要促进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协同发展。以货物贸易带动服务贸易,发展与货物贸易相衔接的服务贸易。为了增强我国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拉动作用,需要不断发挥服务贸易高附加值优势,逐渐提高货物贸易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延长货物贸易价值链。同时,要逐步降低加工贸易在对外出口结构中的比重,改变因大量进口资本密集型设备而阻碍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的状况,并通过自主创新和技术合作等方式逐步提升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形成上下游完整的制造业产品生产链条,促进国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互动发展。

三是要有序引导服务企业“走出去”,进一步开拓和占领国际服务市场。对外服务直接投资有利于绕开国外贸易壁垒,有利于降低对外服务贸易成本,有利于国外服务市场的开拓和占领。因此,政府要引导、扶持我国服务企业克服困难,为服务企业“走出去”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进一步加快服务出口步伐,以推进服务贸易进出口均衡发展。

(三) 调整和优化对外服务贸易结构

要着力提高通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文

化、咨询等智力密集、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现代服务贸易占服务进出口贸易的比重,优化服务贸易部门结构。同时,要继续加快发展重点优势领域的服务进出口,特别是要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推动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承接跨国公司在华服务外包业务,扩大我国服务外包市场份额,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取得国际认证,创建服务外包公共服务平台,完善服务外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高我国服务外包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各地可根据自身的条件和优势,有重点地发展特色对外服务贸易,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同时,充分发挥对外服务贸易发展较快的东部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实现良性互动、优势互补,构建充满活力、各具特色、区域协调的对外服务贸易发展格局。诸如,上海、北京、广东等地,银行设置比较密集,就可以狠抓对外金融服务发展;而沿海地区港口比较多,就可以大力发展离岸服务外包贸易;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丰富,就可以优先发展对外建筑服务;有些中西部地区城市大学比较集中,就可以大力发展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服务、软件服务等。

参考文献:

- [1] 张莉. 中国对外贸易监测报告 2011 [M].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2.
- [2] 周柳军.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 2012 [M].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3.
- [3] 商务部. 2011 年服务贸易工作要点 (商服贸字 (2011) 1 号) [R]. 2011-1-13.
- [4] 商务部. 中国服务贸易统计 2012 [M].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3.
- [5] 胡心宇. 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与对策 [J]. 中国市场, 2013 (7): 71-74.
- [6] 李晓峰, 左煌.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3 (4): 38-42.

[责任编辑: 范君 李丽]

信息技术能力对内部控制作用及理论框架

李云龙

(安徽工业大学 商学院, 安徽 马鞍山 243032)

摘要:内部控制的实质是外部投资者对企业董事会行为的监督过程。它被誉为企业的“长寿基因”,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信息化下内部控制问题研究是一个综合性问题研究,具有交叉性,需要运用多种理论加以理解。从内部控制实施的角度出发,探讨信息技术能力对内部控制作用,认为信息技术能力从制度层面、流程层面以及信息层面对内部控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同时构建了信息技术能力对内部控制作用的研究框架,以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帮助。

关键词:信息技术能力;信息化;内部控制;理论框架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2-0034-05

The role a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pability on the internal control

LI Yun - long

(S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 anshan, Anhui 243032, China)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internal control is a monitoring process of outside investors to corporate the board's behaviors, which is hailed as the company's "longevity gene"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e study of internal control und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a comprehensive problem with cross-cutting features, needing the understanding via a variety of theories. This paper, by exploring the role of IT cap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suggests that IT capability have produced positive results at the system, proces and information levels while constructing a research framework between IT capability and internal control in order to provide help for the the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IT capability; information; internal control; theoretical framework

内部控制源于私有制所带来的弊端,它是对所有人财产的一种保护。国家组织的统治者通过财产记录定期核对和检查、人员岗位分离等牵制手段,防止下级串通舞弊侵占财产以及意志不能得到正确贯彻、执行。如今,企业组织成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营绩效的好坏会对整个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在企业实际的内部控制实施中,很多企业将其当成是一项“任务”,“走形式”现象严重,其实质在企业高层的“动机性管理”中发生了扭曲,事

后控制是主要形式^[1]。其实,企业在运行过程中有两套程序和制度,一种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程序制度,另一种则是内部控制制度,它是政府、外界投资者通过法律法规对企业的强制要求,可以说内部控制制度是嵌入到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中去的。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伴随着企业的生产过程,它是一个物流过程,也是一个生产工艺过程,其实质就是产生信息、传递信息过程。而内部控制的目的是揭示信息以及产生预

收稿日期:2013-12-10

基金项目:安徽工业大学研究生创新研究基金(2013099);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SK2012A155)

作者简介:李云龙(1989-),男,安徽合肥人,硕士,研究方向:资本运营与财务控制。

警,从而保障信息的真实完整。内部控制既是对信息的反映,也是对企业制度的反映,所以内部控制有效性表现在信息披露上,而实质体现在制度上,就是企业对政府、社会公众以及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护的程 度。如何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必须从保障信息的角度出发。在企业信息化下,信息技术能力渗入内部控制,将企业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分类和归集,建立实时预警机制,从而能有效反映相关控制信息,信息技术能力对内部控制效率的改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信息技术能力对内部控制的作用

从内部控制实施的角度出发,探讨在企业的实践中,信息技术能力是如何嵌入内部控制体系,提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从企业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内部控制体系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一是制度层面;二是流程层面;三是信息层面。制度是基础,流程是关键,信息是本质。信息技术能力通过这三个层面,影响内部控制五大要素,进而对整个内部控制产生积极的作用。

(一)内部控制制度是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以及第三方给予企业的行为规范,以更好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内部控制制度与企业现有的运行制度相互融合,不断嵌入企业原有的制度中,与企业现有制度并行,成为内部控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企业内部控制需要由外在控制转化为自我控制,形成企业的控制文化。内部控制规范规定了企业需要关注的控制领域,例如组织架构,它包括公司治理架构与组织结构两部分。治理架构中的董事会在制度框架内授予组织结构中经理层适当的权限,从而会涉及组织架构中权限控制的问题,特别是关联方交易、资产折旧等。因此,企业在具体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时,需要考虑其内容是否与外部的规范一致。如今,信息技术能力对建立内部控制制度越来越重要。信息技术能力通过影响企业内部环境,逐步建立 IT 下的内部环境,优化内部控制制度,为内部控制在企业中真正发挥作用奠定了基础。具体表现在组织架构、人力资源政策、企业文化等方面。信息技术冲击了传统的组织架构,IT 治理模式代替原有治理模式,治理层对经理层的监督更为有效,而组织结构扁平化则进一步促进了上对下的分权,影响了组织结构、职责权限等制度的制定。信息技术对人力资源的影响主要是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改变^[2],并从而对人力资

源政策的制定也产生积极影响。而信息化技术推动企业文化变得更加开放,更具创新,也使建立的企业文化制度更加有效。各国也都逐渐意识到信息技术在制定内部控制制度方面的积极作用,将其看成是非常重要的项目之一。日本将“对 IT 的应用”列为内部控制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我国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下简称《规范》)也明确指出“企业应当运用信息技术促进信息的集成与共享,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信息与沟通中的作用。”信息与沟通是内部控制制度的组成部分,要求企业要及时、准确地收集、传递与内部控制相关的信息,这个过程会进行大量的数据处理和整合,仅仅依靠人力是不科学的,而且容易受到噪音的影响,信息技术通过建立网络虚拟空间和信息集成平台,使信息与沟通免受外界的影响,保证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运行,信息技术能力是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的有力保障。所以,信息技术能力对内部控制制度揭示的实质就在于保证制度的规范性和完整性。

(二)流程控制实质上就是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具体操作,它是内部控制有效实施的关键。流程之间相互交叉、相互影响。可以说内部控制是以风险为导向的、对企业各控制活动进行控制监督过程。信息技术对内部控制流程层面的影响集中在风险评估和控制活动上。在控制活动上,一方面,企业的组织架构需要建立职责权限、审批流程设置等控制流程。组织规模越大,组织架构就越复杂,权限过多,控制流程也越繁琐。而信息技术能力的运用一方面使组织结构扁平化,上下级之间的控制活动加强,各部门之间流程传递速度加快,处理能力增强,大大简化了业务流程;另一方面它也会带来新的流程设计模式。特别是 ERP 的广泛运用,将企业内部的各 种业务、流程以及权限集中于信息系统平台上,及时完成授权审批,控制人员能够与流程管理人员及时信息共享、反馈,并迅速制定新的流程。因此, Mohsen Attaran^[3]将信息技术能力在流程中的这种角色划分成流程设计前、流程设计中以及流程设计后三种。在流程设计前区分、选择流程并且创建基础设施和管理信息;流程设计中把非结构化流程引入日常的交易中;流程设计后,信息技术能力能够建立关键资源,对再造流程进行评价。当然,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支持单个的业务流程,而且还能整合流程和不相关的组织的边界^[4]。比如说企业的关联方交易行为,需要组织的逐层授权审批,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信息技术能够将各

层级人员“聚集”在一起,沟通交流,及时审批,通过简化组织结构整合了关联方交易的流程控制。在风险评估上,将风险预警模型与信息技术结合,提高了风险识别和风险应对能力,优化控制手段,从而加强了内部控制在业务流程中的事前、事中以及事后处理能力。

(三)内部控制制度和具体实施过程要求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反映企业的控制情况,完整的说明相关控制的各个方面。《规范》中“信息”一词出现频率非常高,而且在不同的要素中阐述了相应的作用^①,信息是内部控制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其所揭示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是具体内部控制实施的本质。企业的任何流程都会产生信息,它反映了企业经营情况的实质,内部控制根据信息考察企业经营情况,并将其运用于物流、资金流以及人力资源流,以达到“三流整一流的”效果,而外部的投资者根据内部控制提供的信息判断企业是否“健康”,是否存在过度风险。信息的范围应该包括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5]。由于会计信息更容易被篡改和修饰,内部控制更多关注的是产生会计信息的领域和流程。这些信息的获得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处理,传统的办公方式会影响到决策的及时性,也缺乏对未来的科学预期,以致决策失误。信息技术环境下,信息的传递、处理、反馈都变得简化。信息技术平台依靠整合资源的优势能够及时准确的收集、传递信息,保证企业在内部、内外部之间进行有效沟通。信息技术压缩了复杂的组织层次,改变了以往的单向沟通模式以及同层之间信息闭塞局面,简化了信息传递途径,加快了信息传递速度。它通过实时监控信息的产生过程,作出风险预测和预警,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信息技术能力通过信息系统改变了传统的人工监督控制,将人工监督与程序监督相结合,监督变得更加程序化,于是监控不仅仅可以依靠会计信息展开,还可以根据诸多管理系统生成的业务信息展开^[6],将信息中蕴藏的最大价值找出来,依托信息,提高内部控制效率。

二、信息技术能力对内部控制影响的理论框架

信息化下内部控制问题研究是一个综合性问

题研究,具有交叉性的特点,信息技术能力对内部控制的影响作为一个命题需要一些理论给予解释。它的理论不仅需要内部控制相关理论,还涉及到其他的理论,包括基础理论和支撑理论,其中基础理论有系统理论、信息理论以及控制理论;而支撑理论有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制度经济理论和流程理论。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信息技术能力对内部控制影响的基本框架,如图1所示。

信息技术能力与内部控制之间联系的载体是信息,用以建立起两者之间的作用“桥梁”。一方面,信息技术能力能够保证信息的有效传递,简化信息处理的流程,加快信息传递的速度,从而实现内部控制信息的真实完整;另一方面,内部控制涉及预防控制、实时控制以及事后控制。内部控制应该要将预防控制和实时控制结合,内部控制将控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信息系统,系统通过与标准对照,不断更正过程,以保证过程不偏离预定的方向,实现有效控制。这种传递——反馈机制形成了信息技术能力对内部控制影响的基本模式。

(一)支撑理论

内部控制是外部投资者进行自我利益保护的重要措施,它涉及企业产权的归属、委托者与代理者之间的关系、多元主体之间掌握信息的程度以及业务流程等问题。解释信息技术能力与内部控制的关系需要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流程理论来支撑。

产权理论:产权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其实质就是资源的稀缺所产生的资源的专用。现代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现象十分普遍,在提高经营治理水平的同时也到来了许多问题。产权理论认为,企业的股东就是产权的所有者,而管理者就是产权的使用者。无论管理者如何改善企业绩效,企业的所有权仍然属于股东。正因为产权不属于管理者,其就不会太在意财产是否遭到损害。对管理层监督有限,使得管理者会利用产权资源,损害产权所有者的利益。产权人为防止自己遭受过多的损害,需要对管理层加以一定的约束,内部控制其实就是为起到这种约束而产生的,产权人通过管理层定期发布的内部控制报告,了解企业内

^① 《规范》在第十五条中指出“内部审计机构应当结合内部审计监督,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监督检查”、第二十条“企业应当根据设定的控制目标,全面系统持续地收集相关信息…”、第三十四条“…综合运用生产、购销、投资、筹资、财务等方面信息,…”、第四十条“重要信息应当及时传递给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等。这些规定说明了信息对具体执行要素中的重要地位。

部控制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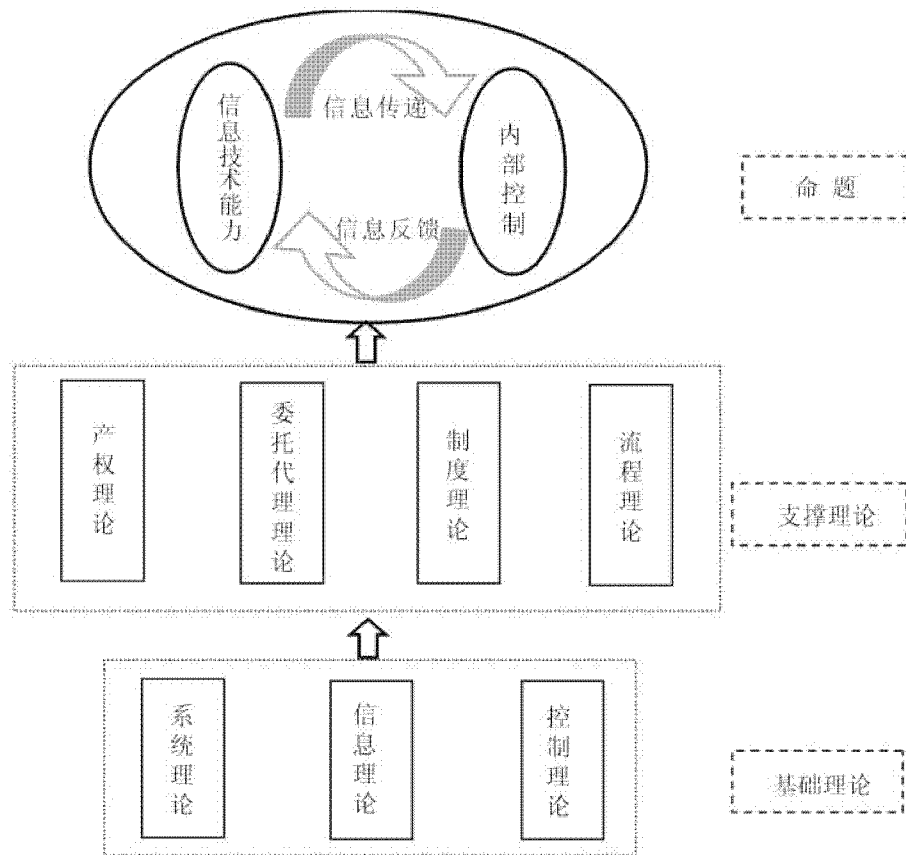


图1 信息技术能力对内部控制影响的基本框架

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进一步深化了内部控制中产权理论的含义。产权所有人（股东或委托者）与产权使用人（管理层或代理人）之间会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情况，委托者由于不参与企业日常管理，不可能完全掌握企业全部信息，而管理者为了业绩、晋升也不会把“坏消息”告诉股东，企业对外报出的信息可能都经过了“粉饰”，基层员工之间的串谋行为、管理人员披露信息会存在“动机选择”^[7]。股东只有通过外在的机制来限制管理层的“为所欲为”。从这个方面来说，内部控制其实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长期博弈的产物，虽然内部控制不能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但是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管理层的违规、舞弊和决策失误行为，保护了委托人的权益。内部控制要注重内部交易成本，平衡公司股东和经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矛盾，将其视为目标之一^[8]。

制度理论：企业产权制度使管理者缺乏努力奋斗的动机，信息不对称又为管理者侵占资产提供了机会，企业股东要想从源头消除这种情况的发生，首先要关注制度设计。制度是对人行为的一种强制要求。一个制度的好坏会影响企业控制的效果。

好的制度会保证企业按照规范正常经营，坏的制度则最终导致企业淘汰。监管部门以及第三方通过内部控制制度，要求企业必须按照规范行事，对高管和基层员工起到威慑效果，促使他们不得不按照制度安排，加强内部控制。内部控制制度就是通过制衡和监督机制的设计，让“坏人”不能做坏事^[9]。通过将内部控制制度与企业原有制度融合，弥补制度缺陷和盲点，对管理者起到很好的约束效应。

流程理论：从流程的视角看，企业其实是由各个相互联系的流程构成的，企业的控制过程就是流程的控制过程，内部控制是否有效最终是要落实到流程上。因为信息产生于流程中，内部控制只有将这些信息真实完整的传递给股东，它的作用才能体现出来。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内部控制制度也是如此^[10]。内部控制需要在制度的框架下，加强流程管理，整合业务流程，双管齐下，才能有效保证信息的质量。

（二）基础理论

对信息技术能力与内部控制之间关系研究不仅需要支撑理论，还要找出其基础理论，它是两个交叉学科研究的交集，是运用支撑理论加以解释的

基础。其主要有三个基础理论,系统理论、信息理论以及控制理论。

系统理论:内部控制属于企业系统中的一个控制部分,同时本身也是一个系统,信息技术能力对内部控制的影响体现了系统是如何更为有效的运行。系统理论认为,系统是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它是由众多要素组成的,这些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区别。内部控制将企业内部的各项活动整合成为一体,使得业务之间、部门之间、信息之间能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这过程中不断的发现问题,然后立即加以解决并进行反馈。它是一个具有预防性和实时性的动态系统。从这个角度来说,信息技术能力对内部控制的影响问题就是如何促进内部控制系统内要素之间更加有效联系和相互作用的问题。只有从系统观的角度出发,支撑理论对信息技术能力与内部控制关系的解释才会更加深刻。而且,信息技术有助于加强内部控制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利用信息系统促进业务之间、组织之间的信息传递,从而在系统内部的“动力”和“传动”机制中起到“润滑剂”的效果,提高整个内部控制系统运转能力,保证内部控制效率的提高。

信息理论与控制理论:控制论认为信息是控制的基础,信息在传递中需要控制,而控制会通过信息的反馈进行修正。控制论与信息论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信息在控制系统中经过输入、处理、输出以及反馈方式将结果在传递回信息使用者,这将影响信息的再次输入,以制约的方式实现预定目标。内部控制过程应该是一个实施控制的过程,对每一项交易、业务都要进行传递和反馈,以保证其没有违背内部控制的有关规定,这样所有的控制过程综合起来就能保证内部控制目标的有效实现。它既能事前控制,也能事中控制。但是在很多企业它只是一个事后控制,即当内部控制的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之后才会采取以保证下次内部控制的有效。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实时传递和处理信息的工作量很大,会影响公司管理效率,员工在实际的过程中会“偷工减料”,减少内部控制的步骤及内容,也不会对业务的反馈信息做出处理。信息技术能力将信息技术高效的运用在控制中的信息传递和反馈过程中,并通过预警系统实时跟踪业务的情况,对可能背离内部控制目标的情形及时反馈,采取措施强制保证目标的最终实现。从控制论来看,信息技术能力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其实就是信息技术运用网络和数据处理优势,控制和处理大量的

信息,及时传递并反馈的过程。

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被称为“老三论”,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它们是信息技术对内部控制影响研究的基础理论,是支撑理论的地基,如果没有很好地把握这三个理论对该研究的重要意义,那么该理论研究就岌岌可危了。

三、总结

在如今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给各行各业带来了便捷,信息技术是社会未来发展的源动力。信息技术给企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企业的发展,尤其是上市公司,需要不断提高内部的经营管理水平,合理授权,完善制度、流程以及信息层面的控制,保证企业战略的实现,为投资者创造更多的财富。这些都要求企业增加对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提高内部控制能力。然而,流程上的连续性与内部控制点上控制的矛盾,无法保证信息的实时有效和准确,因此,未来的企业将更加要依赖信息技术,信息技术能力会是保证内部控制有效的“法宝”。

参考文献:

- [1] 杨雄胜. 内部控制理论面临的困境及其出路[J]. 会计研究, 2006(2): 53-59.
- [2] 樊友平, 张才明. 信息技术对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影响[J]. 企业经济, 2011(8): 69-71.
- [3] Mohsen Attaran.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J].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04(41): 585-596.
- [4] Basu A, Blanning R W. Synthesis and decomposition of processes in organizations [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03, 14(4): 337-355.
- [5] 李心合. 内部控制: 从财务报告导向到价值创造导向[J]. 会计研究, 2007(4): 54-60.
- [6] 吴慧婷. 信息化环境下的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研究[D], 苏州大学, 2007.
- [7] 崔志娟. 规范内部控制的思路与政策研究—基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动机选择”视角的分析[J]. 会计研究, 2011(11): 52-56.
- [8] 何浪沙. 内部控制规范实施与企业信息化投入的实证研究[D],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12.
- [9] 薛万东. 关于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本质的思考[J]. 会计之友, 2010(8): 46-47.
- [10] Jensen M C. The modern industrial revolution, exit, and the failure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3, 48(3): 831-880.

【责任编辑: 范 君】

安徽城镇化进程中的体育旅游探析

吴娟娟, 方新普

(安徽工程大学 体育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其主要特征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毋庸置疑, 城镇化、经济发展、人口结构优化必然促进体育旅游乃至旅游产业的发展, 然而体育旅游的基础性要素却是旅游资源。文章认为, 安徽省具备体育旅游发展的现实条件, 当下, 制约安徽省体育旅游发展的因素主要是安徽省体育产业的结构障碍, 因此推动安徽省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应该是优化安徽省体育产业结构。

关键词: 安徽省; 城镇化; 体育旅游

中图分类号: F292, F5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2-0039-04

Analysis of the sports tourism in Anhui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WU Juan - juan, FANG Xin - pu

(Sports Institute of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Urbanization mainly refers to the transference of the rural surplus labor to the cities.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ims not only to improve the urban population ratio, but to relate the employment,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culture, education, training, health, and sports lifestyle improvements, etc. of the "new population", which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human recreation, health - related aspects. Departing from Chinese sports culture and Sports Tourism Expo and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promotion of Anhui Sports Tourism development also requires the form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tourism products,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Key words: Anhui province; urbanization; sports tourism

纵览人类已知的城镇化模式——无论是最早实现城镇化的英国, 还是美国的示范城市计划, 抑或是东亚的集中型城镇化道路——都面临着一个悖论: 城镇化带来的经济发展与人口爆炸带来的社会问题。毋庸置疑, 安徽省城镇化进程中必然面临这一困境, 而这个悖论的两面似乎都从某个角度促进着体育旅游乃至旅游产业的发展: 一方面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促进着体育旅游的发展; 另一方面人口激增同样促进着体育旅游的发展。因此, 城镇化进程必然推动体育旅游的发展, 当然城镇化也必

然带给体育旅游以难题, 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本文致力于探讨体育旅游与城镇化进程在何种程度上契合、在何种意义上背离。

一、城镇化进程: 安徽省体育旅游发展的契机

安徽省城镇人口比例由 1978 年的 12.6% 提高到 2009 年的 42.1%^[1], 2012 年达到 46.5%。截止 2012 年底, 安徽省主要城市城镇化率: 铜陵市 76.3%, 合肥市 66.4%, 淮南市 65.3, 马鞍山市 61.

收稿日期: 2013-12-18

基金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社会阶层分化与体育利益群体研究”(SK2012A017)资助

作者简介: 吴娟娟(1988-), 女, 安徽芜湖人, 在读硕士, 研究方向: 体育社会学。

2%, 芜湖市 58.0%, 蚌埠市 48.3%, 滁州市 45.1%, 黄山市 44.4%, 阜阳市 34.9%, 亳州市 33.0%。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率普遍超过 70%, 我国城镇化率平均水平为 52.6%, 安徽省城镇化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6.1 个百分点。因此, 安徽省城镇建设发展空间存量较大, 根据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提高 3.7 和 1.8 经济和消费增长点, 安徽省城市经济和消费具有较大潜力。从城镇化进程中安徽省人口转移的视角观察: 安徽全省 16 个省辖市中, 城市(不含市辖县)常住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城市有 8 个。截止 2012 年底, 全省 5 988 万常住人口中, 城镇人口近 2 800 万人, 占 46.5%。根据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安徽已经进入城镇化发展的加速阶段, 城镇人口步入快速增长轨道, 也就是说, 已经有 4 成以上的常住人口成为“市民”, 这个数据比 2010 年的 43.2 提高了 3.3^[2] 个百分点。

城镇化进程意味着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来, 这一进程必然推进体育旅游的发展, 同样体育旅游的发展也推进了城镇化的建设。为此, 安徽省提出“十二五”期间形成皖江城市带、合肥经济圈和皖北城市群竞相发展的城镇化战略格局, 着力打造黄山、安庆、池州等全国著名旅游城市, 进一步提高芜湖、合肥、马鞍山、六安旅游城市品牌。例如, 安徽芜湖大浦城镇化进程推进了农业产业的发展, 大浦试验区 6 年多来, 大浦新村、大浦绿洲、科普植物园、特色果蔬园、QQ 农场、组培中心、驯化中心、自动化育秧育苗生产中心、中国农业自然灾害教育体验主题公园等一批项目相继建成, 该试验区游客人数由 2011 年的 52 万人次, 增长到去年的 80 万人次, 跻身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行列, 成为芜湖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试验区还提供了 1 200 多个就业岗位, 实现了附近农民就近就业。再如, 安徽省池州市举办第二届全国绿色运动健身大会、“茶溪小镇”杯安徽池州国际铁人三项赛等重大赛事, 以及广泛开展“全民健身、健康安徽”系列主题活动, 全年共举办或协办赛事活动 58 次, 参加活动人数 6.6 万人次^[3]。随着安徽省经济、产业和城镇化发展, 必然有助于推进体育旅游的发展。

二、旅游资源: 安徽省体育旅游发展的基础

安徽省旅游资源丰富, 长江、淮河纵横于安徽

省境内, 支流主要有青弋江、秋浦河、裕溪河等 17 条以上河流; 东南部分属于新安江的钱塘江流域; 黄山脚下的太平湖、八里河湖、瓦埠湖等 14 处; 还有 800 平方公里的巢湖; 以及梅山水库、佛子岭水库、万佛湖水库等山水资源; 安徽省黄山、九华山、天柱山均在全国十大名山旅游胜地之列; 全省共有 A 级及以上旅游景点(区) 438 处。民间曾有: “走这走那不如淮河两岸”的民间谚语, 澎湃八百里皖江、淮河五千年文明; 徽州故里世外桃源人家; 登黄山看仙境, 访九华佛文化; 诸多文化语言诠释了安徽旅游和文化特色。2012 年全年入境旅游人数 331.5 万人次, 比 2011 年增长 26.1%; 国内游客 2.92 亿人次, 增长 30.2%。旅游总收入 2 617.8 亿元, 增长 38.6%。其中, 旅游外汇收入 15.6 亿美元, 增长 32.5%; 国内旅游收入 2519.1 亿元, 增长 38.8%。

旅游资源是体育旅游发展的基础, 文化底蕴开发体育旅游的精髓。安徽山水文化催生了皖南体育健身旅游节、国际登山节、山地自行车和皖北华佗五禽戏养生健身节等体育旅游。从黄山国际登山节、黄山体育健身旅游节、华东地区青年登黄山大赛、万佛湖风景区亚洲铁人三项运动锦标赛和国际龙舟邀请赛, 到黄山站全国钓鲫精英赛, 再到黟县自然形态的体育旅游形态——自行车、徒步穿越、登山、定向越野、漂流、攀岩、宿营、自驾车等运动, 都诠释着体育旅游的文化内蕴。2013 年中国体育文化·体育旅游博览会以“体育文化引领风尚, 体育旅游向上健康”为主题, 以“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展示体育文化成果, 搭建体育产业平台”为方针, 以“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规划建设为契机, 全面展示国内外体育文化、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新成果, 宣传体育文化、体育旅游的新成就, 推动体育文化、体育旅游与其他相关产业的相互融合, 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国体育文化·体育旅游博览会将进一步促进安徽体育文化体育旅游业的发展, 也必然推进安徽省城镇化的建设。

基于此, 安徽省政府提出, 以合肥经济圈为中心, 建设皖中体育健身竞赛产业集聚区, 重点发展体育赛事、体育旅游用品销售、体育健身培训、体育休闲、运动康复、体育旅游中介业的思路。打造以黄山、九华山、天柱山和太平湖等水资源的发展旅游或体育旅游业, 皖南体育旅游、体育休闲产业集

聚区,重点发展体育旅游、体育品牌赛事活动、户外运动休闲产业;构建以马鞍山、芜湖、铜陵为重点,重点发展运动旅游产业和体育休闲健身产品及相关制造业,充分挖掘历史文化名城和民间民俗体育文化资源,建设皖北民间民俗体育产业聚焦区,重点发展传统武术、养身,健身等。集“旅游安徽,文化安徽”发展的新文化建设发展旅游的新思路,充分利用生态旅游资源,打造“文化旅游、生态旅游、观光旅游、民俗旅游、休闲旅游、体育旅游”等多元文化取向的旅游大省,将会进一步的推进安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

三、经济发展:安徽省体育旅游发展的保障

城镇化进程必然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某种意义上说,城镇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然而,提高物质生活同时还要丰富精神生活需求,城镇化进程中要考虑的社会保障、社会公共产品投入、就业、教育、卫生、文化以及体育的发展。

据安徽省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安徽省2012年全年生产总值(GDP)17 212.1亿元,安徽经济持续发展有利于促进体育旅游的发展。全社会劳动生产率41 336元/人,比上年增加3 884元。人均GDP达到28 792元(折合4 561美元),比2011年增加3 133元。其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长50.2%。全年财政收入3 026亿元,比上年增长14.9%,其中地方财政收入1 792.7亿元,增长22.5%。在全部财政收入中,增值税下降4%,营业税增长19.1%,企业所得税增长19.4%。财政支出3 936.7亿元,增长19.2%。其中,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增长15.6%,医疗卫生支出增长13.5%,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增长21.8%,教育支出增长25.7%,科学技术支出增长25.5%。全年33项民生工程累计投入565.2亿元,基本惠及城乡居民。

安徽省经济财政有力的支持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开展,2012年全年在国际和国内的重大比赛中,我省运动健儿共获得34枚金牌、26枚银牌和30枚铜牌。其中,世界冠军6个、亚洲冠军6

个。在第30届伦敦夏季奥运会上,我省取得了1个冠军、2个第四名、1个第五名、2个第六名和1个第七名的历史最好成绩。“全民健身、健康安徽”系列主题活动蓬勃开展,全年共举办百人以上的群众体育健身活动1 860次,其中现代体育项目活动1 537次,民间传统体育活动323次。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根据人均收入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并且提出社会再生产过程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组成^[4]。按照卡恩的理论,安徽省当前属大规模消费社会或先进工业社会阶段(即大规模消费社会或先进工业社会阶段)——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达到或接近800美元,城市居民具备文化娱乐消费的基本欲望和文化娱乐消费的基本能力,由此必然带来安徽省居民体育消费的热潮,体育旅游将逐渐成为居民选择性体育消费的主流。

四、优化体育产业结构:发展安徽省体育旅游的当务之急

优化产业结构是城镇化进程中的题中应有之意。所谓优化产业结构是指城镇化进程中一、二、三产业结构的调整,或者说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之间的转换过程,其最明显的特征是城镇化进程中服务性产业的大发展。毋庸置疑,宏观层面上体育旅游产业乃至体育产业属于第三产业,微观层面上体育旅游产业属于体育的新兴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说,体育旅游产业在城镇化进程中必然迎来大发展,然而,安徽省体育产业和体育旅游产业都面临着一系列结构性难题。

根据我国学者的研究结果,中国体育产业增值265.13亿元,占第三产业产值的0.82%。目前国内从事健身娱乐、竞赛表演、体育中介等体育服务经营机构2万多家,但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数量较少。特别是我省与深圳、上海、浙江等城市相比显得不足。深圳有76家体育企业营业额达到2.3亿元左右^①,年利润可达250万元左右,年创税1 100万元以上,就业人数可达3 500人以上,体育产业约占深圳第三产业总值的2%左右^[5]。

① 见方新普《安徽省体育强省重点难点的研究》(2010年安徽省第二届体育科学大会会议论文)

表1 我国部分省(市)体育产业产值一览表

	年度	体育产业总值(亿元)	体育产业增加值(亿元)	体育产业占GDP比重(%)
北京市	2002	128.40	52.90	1.70
广东省	2002	250.13	67.90	0.57
浙江省	2000	252.37	55.65	0.92
天津市	2002	90.9	2.08	0.14
辽宁省	2001	145.90	39.40	0.78
云南省	2001	16.88	0.86	0.86
安徽省	2001	13.07	5.33	0.16
四川省	2001	6.74	2.87	0.07

安徽省16个地级市共856家旅行社(注册),从总量上看发展较快,但集团性质的产业化发展缓慢,有实力的旅行社数量偏少,产业结构体系、体育产业消费市场、特别是专营体育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尚未形成规模,体育旅游产业依托于旅游商业、产业以及交通等,还未形成具备明显特征的体育旅游产业结构。并且,安徽省现有的体育旅游企业,或社团、旅行社竞争力不强,甚至是由非体育旅游专业旅行社承揽安徽省境内的体育旅游业。

目前,安徽省冠以体育旅游产品有近100项左右,然而,却因大多数都为旅游“景点”表演形式,缺乏体育旅游专业的产品,仅为人文旅游的形式,旅客们在旅游中缺乏健身性、娱乐性、拓展性消费的“动态”参与,在产品结构上制约了体育旅游的形式和特征。事实上,安徽省还没有形成真正的体育旅游产业及其衍生的产品市场。其实,安徽省的自然山水资源和“徽景、徽商、徽文化”资源背景,从条件上构成了体育旅游市场或旅游产品的框架基础,并由此基础可望形成黄山、长江、淮河等“拓展体验、生态环境游、休闲娱乐游”之三大体育旅游产品结构,但安徽省却因专业旅游或旅行社的缺乏,而缺少体育专门旅游的通道或机构。因此,优化体育产业结构是安徽省旅游发展的当务之急。

五、结语

城镇化进程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城镇化也必然导致农村人口迅速的城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城镇化必然带来体育旅游的大发

展。然而,影响体育旅游的因素应该不止于城镇化那么简单,甚至可以说安徽省旅游资源才是体育旅游的基础性要素。那么,笔者探讨的体育旅游与城镇化进程是否就没有价值了呢?实则不然,在安徽省乃至全国城镇化进程的背景下,如果体育旅游能够紧紧地抓住这一时机,厘清体育旅游与城镇化进程的关系度数,把握安徽省的产业优势,合理利用安徽省体育用地、体育产业、体育市场、体育信息、体育服务业等政策,是大有可为的。

参考文献:

- [1] 安徽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 2012年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13-02-26]. http://www.dss.gov.cn/news_wenzhang.asp?ArticleID=325482.
- [2] 安徽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十二五”城镇化发展规划[EB/OL]. [2012-01-27]. <http://www.hefei.gov.cn/n1070/n304559/n311446/n24082684/n24124235/24156509.html>.
- [3] 池州市统计局. 池州市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13-03-29]. <http://czj.chizhou.gov.cn/newshtml/tjgb/20130329092447.htm>.
- [4] 顾明远. 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上)[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571.
- [5] 刘武,方新普. 安徽省体育产业结构探析[J]. 安徽体育科技,2010(4):16-18.

[责任编辑:吴晓红]

临终关怀的现实意义与实现路径

徐晓红

(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07)

摘要:人口老龄化与死因模式的转变提升了对临终关怀的需要。临终关怀是病人及其家属释放压力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表现。传统死亡观念阻碍了中国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故急需将死亡教育纳入相关部门的工作计划,以改变传统死亡观念,提高对临终关怀作用的认识,推广临终关怀的科学方法,并最终提高临终关怀的服务质量。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死因模式转变;临终关怀;死亡观念;死亡教育

中图分类号:R82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2-0043-04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realizing path of hospice care

XU Xiao - Hong

(Nantong? Textile? Vocational? Technology? College, Nantong, Jiangsu, 226007, China)

Abstract: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and change of death causes prompt the demand for hospice care, which is a requirement for the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to release pressure as well as a reflection of social progress. The traditional attitudes have imped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ospice care, so it is urgent that education on death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working plan of related departments to change traditional ideas about death,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that hospice care plays, and promote scientific ways of hospice care for the ultimate goal of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hospice care service.

Key words: aging of population; change of death causes; hospice care;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education on death

一、临终关怀的内容与目标

临终关怀又称“安宁和缓医疗”、“善终服务”、“安宁疗护”、“姑息疗法”。桑德斯博士于1967年在英国首创临终关怀院。临终关怀是向临终病人及其家属提供全面的照料,涉及医疗、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临终关怀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以照护为主替代治疗为主,以整体服务的形式提供适度治疗,满足患者及亲属的心理需要。临终关怀服务的目的在于使临终病人的生命得到尊重,症状得到减轻,病情得到延缓,生命质量得以提高,安宁、舒适地完成人生的最后旅程,从而使患者亲属的身心健康也得到尽可能的维护。临终关怀服务

包括四个方面:(1)对临终者进行姑息性治疗和护理,使其疼痛得到缓解,症状得到控制,增加其舒适感。(2)理解临终者的情绪,尽最大可能减轻焦虑和抑郁,使其从复杂的心理定势中解脱出来,坦然接受并面对现实,避免情绪失控和极端行为,安详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3)给临终病人留下安排后事的机会,最后一次履行对社会、家庭的职责,如对亲人的希望、个人遗产的分配、债务的处理、器官捐赠等。(4)帮助亲属做好临终与后事安排,包括临终照护安排、治疗方式、殡葬计划等。

二、临终关怀的现实需要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

目前60岁以上人口已经达1.78亿,占13.3%^[1]。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因此,临终关怀的提出适应了我国的现实国情。

(一)临终关怀是人口老龄化与死因模式改变的需要

老年人口是一个高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群体,据民政部透露,全国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有940万,部分失能老人更是多达1894万。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恶性肿瘤已替代呼吸系统疾病成为全国城乡居民的第一死因^[2]。也就是说当前社会的死因模式已经从从前的急性病为主发展为现在的慢性病、难以治愈且痛苦的癌症为主,这就要求医疗模式从单纯地关注疾病向注重减轻痛苦、提高生命质量方向转变。人口老龄化、癌症的发病率及死亡率的提高,使得临终关怀的需求日益增强。

(二)临终关怀是病人及其亲属释放压力的有效途径

癌症带给病人突出的问题是肉体上持续的痛苦、高额治疗费用带来的经济压力以及精神上的恐惧。对于患者的亲属,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即将失去亲人的现实的同时,还要承受持续、不断增加的经济压力、工作压力、精神压力与社会压力。有了晚期肿瘤患者的家庭多是不惜倾家荡产极力抢救,患者艰难存活,全家痛苦煎熬。由于手术、介入、化疗、放疗等治疗手段的不断丰富、检测设备不断更新,当代社会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过度医疗时代,仿佛一切病痛只有尝试过所有可能的治疗手段,才能证明它的不可逆转性。事实上,对于进入生命晚期的病人来说,太多的治疗和检查已经没有实际救治意义,临终关怀才能给他们更大的帮助。曾有美国专家指出,即使越来越多的医学界人士意识到对晚期癌症患者实施化疗等疗法弊大于利,但仍有相当多的癌症病人在临终前接受了毫无意义的治疗,最终在十分痛苦的状态下离开人世。对晚期癌症患者来说,过度治疗既花钱又痛苦。手术或化、放疗等激烈治疗带来的痛苦可能比癌症本身更重,甚至可能加速死亡^[3]。在这种情况下,临终关怀是病人及其亲属的最佳选择。

(三)临终关怀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体现

临终关怀不是一种治愈疗法,而是一种专注于让患者在逝世前的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内减轻疾病症状、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临终关怀修正了过去只关注疾病本身,忽视对患者精神关

照的做法,也适应了现代社会家庭人口结构的演变。另一方面,将大量的医疗资源用在无法治愈的病人身上,不仅会增加患者的痛苦,亲人的负担,还浪费了大量的社会卫生资源。张朝霞等人对215例恶性肿瘤患者临终期医疗费用的调查结果表明,恶性肿瘤患者临终期的医疗消费十分惊人,给卫生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4]。美国有调查显示,在临终关怀上花掉1美元,会节约1.52美元的医疗保险费用^[5]。临终关怀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是患者的需要,是患者亲属的需要,也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体现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1992年卫生部原部长陈敏章在首届东西方临终关怀国际研讨会上曾说:“对临终病人的照护,不仅体现对人类尊严的维护,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家庭和单位的负担,也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内容,是一种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善举”。

三、传统死亡观念与我国临终关怀的发展

(一)我国临终关怀的发展现状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2008年组织的“中国城市临终关怀服务现状与政策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每年大约需要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病人超过750万,临终关怀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6]。中国的临终关怀服务最早源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1988年,天津成立了第一个临床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同年,上海创建了中国第一所临终关怀医院。但是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的临终关怀事业规模仍然非常有限。目前开设临终关怀的医疗机构约有100多家,几千张床位^[7],临终关怀资源十分匮乏,供需矛盾十分突出。英国一家调查机构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英国和澳大利亚成为最能获得“体面的临终关怀”的国家,中国排名37位^[8],在40个主要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四。在西方一些国家,临终关怀项目开展得非常普遍,无论是医院、老年公寓,还是居家住所,各种形式的临终关怀项目随处可见。如美国,有超过3200个临终关怀机构^[9]。在一些医院,只要有两位医生签字,证实某位病人患有不治之症,而且其寿命不会超过6个月,他(她)就有资格住进临终关怀医院(或者呆在自己的家里),主治医生的责任是千方百计地减少病人的痛苦,让他(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能享受人生,最后舒舒服服地、没有遗憾地走向死

亡^[10]。

(二) 传统死亡观念对临终关怀发展的制约

中国在“体面的临终关怀”国家中排名如此之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传统死亡观念对临终关怀的负面影响。上个世纪中叶,一些发达国家积极开展死亡教育,普及死亡知识,特别是美国,制定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正规课程,使死亡教育系统化、规范化。而中国的死亡教育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使得临终关怀理念根本得不到社会的广泛认可、理解与支持,与现代化的发展很不适应。郑晓江指出,中国传统的死亡观念有三大特征阻碍科学地认识死亡问题^[11]。一是死亡态度的政治化。无论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传统的思想观念,都在极力倡导尽忠尽节可以流芳百世,苟且偷生则会遗臭万年的生死态度,导致中国人缺乏个体生命神圣的观念,缺乏对个体生命存亡的深切关怀。二是死亡的伦理化。历代贤哲无不鼓励人们应该且必须为其所属集团的利益和道德的价值而勇于赴死。个人生死的家庭家族化,使得个人的去世导致亲属的极大悲伤。三是死亡的神秘化。认为死后世界由魂魄、鬼神、阴间、极乐世界等构成,是一个无法确知却又充满很多可能的世界,致使中国人面对死亡常常产生极大的恐惧和痛苦。

传统死亡观念对临终关怀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回避死亡问题。尽管死亡随时都可能发生,但许多人仍不愿意正视它,因为死亡让人联想到的是一层层地狱,故而害怕死亡,对死亡采取否定、回避的态度。生与死是人生中的两件大事,但是,中国人很重视优生,却忌讳死亡问题,对于许多人来说,对死亡的探讨仍是一个禁区。死亡教育基本上是空白,这使得不少人对临终关怀缺乏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北京地区调查发现,77%的中老年人、71%的大学生不知道临终关怀。调查对象中,尤其是中老年人,不愿意接受有关此类问题的采访,尤其是晚期癌症患者^[9]。死亡和濒死在传统文化中被视为晦气,但临终关怀却使死亡问题公开化。在现实生活中,许多老人自己可以谈论死亡,如果子女谈论,就会被扣上“不孝”的帽子,要是他人与老人谈论,就被认为是在咒他死。实践表明,如果在居民区设立临终关怀医院会让许多居民存在心理障碍,甚至有人将临终关怀医院称之为“死人医院”。临终关怀不被认可,也很难摆到桌面上来谈。二是传统孝道观的误区。许多临终病人家属不能接受放弃积极治疗而选择临终关怀,原

因是担心被指责不尽孝道。甚至连送老人去老年公寓都不肯,认为这是不孝,认为“临终关怀就是送终、等死”。有资料表明:对于晚期癌症患者,亲属的求医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伦理上的考虑。很多患者的家属心存疑惧,如不把患者治疗到服侍到最后的一息,不为病人多花一些钱,社会舆论受不了^[12]。于是,多数人在亲人病危时要求医生尽全力抢救,期待奇迹出现,以人工呼吸机、心脏起搏器、血液透析和鼻饲等需要高额费用的方法来维持朝不保夕的生命,但这种抢救往往是过度的,可能会让病人已经濒临衰竭的身体增加数倍痛苦。还有,薄养厚葬思想下的死亡仪式缺少了死亡的高贵和神圣。各地的葬礼不乏大操大办,很多死者亲属在仪式上呼天抢地,而刚一吃完饭便开始打麻将,悲痛全无,厚葬仪式仅仅是向外人显示自己孝道的一种手段。

四、临终关怀的实现路径

(一) 开展死亡教育

死亡教育是关于濒死或死亡问题的教育,旨在引导人们科学地认识死亡、对待死亡,利用医学死亡知识服务于医疗实践和社会教育。有关死亡的知识涉及多种学科,包括哲学、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医学、护理学、生物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等。广泛宣传 and 开展死亡教育、向社会大众普及科学的死亡知识是促进临终关怀事业的一个重要途径。正确的死亡观有助于减轻患者对濒死、死亡的恐惧,提高临终生命质量,缓解患者家属的悲痛情绪,提高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也有助于转变社会大众对临终关怀的错误认识,为临终关怀的开展创造良好的社会伦理环境。

对于临终关怀而言,开展死亡教育可以通过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两种渠道。从内容上看,对死亡的本质的认识、死亡的科学知识以及临终关怀的科学方法等都应成为死亡教育的内容。从教育的主体看,有关教育部门要担负起死亡教育的主体责任,而包括宣传部门、医疗机构、民政部门、老龄工作部门等非教育主体也应在死亡教育中发挥各自的效用。为了更好地普及死亡教育,相关部门应将编辑、出版适用于不同人群的(公众、临终病人及亲属、及相关工作人员)的死亡教育的教材与宣传手册也纳入其工作计划之中。

(二) 革新死亡观念

改变关于死亡的封建迷信传统观念,树立科学

的死亡观,正面地看待死亡,将有助于推动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首先,死亡不可避免。生与死是人类自然生命历程的必然组成部分。死亡是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的终止,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正确地认识死亡,辩证地看待生与死,将有助于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缓解面对死亡的焦虑与悲伤。其次,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死亡。既然死亡不可避免,那就无需尽一切手段,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延长不可挽救的生命,当然也不会提早结束患者的生命,只是尽可能减轻患者的痛苦,使其有尊严地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从容地安排好后事,圆满终结个人的社会角色。这样做的结果是提高了患者临终期的生命质量和生存意义。再次,积极学习应对死亡的科学知识。学习和了解死亡的心理过程以及死亡对人们的心理影响,可为正确处理自我之死或亲人之死做好心理上的准备。临终病人接受死亡即将来临的现实,有助于其释放内心的冲突和不满,适时安排后事,尽可能完成未尽愿望,不留遗憾。基于对死亡的知识了解,家属将听取医务人员的护理意见并与临终病人协商,为临终者创造一个安谧、恬淡、尽可能舒适的环境,尽可能满足其各种合理要求,以减轻其悲痛程度。临终者因而能够自始至终保持尊严,提高生命最后阶段的质量。医护人员能针对面对死亡不同阶段的心理特点,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临终者缓解精神压力及肉体疼痛,尊严、安宁地走向人生终点,帮助丧亲者度过最困难的哀伤阶段。

(三) 创设临终关怀机构

临终关怀的实现除了取决于人们观念的改变外还依赖于临终关怀机构的设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我国的医疗卫生福利制度还不很健全的大背景下,这一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机构如何才能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如何应对市场经济的考验成功地生存发展下去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政府和社会公益性机构都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上海率先在中国内地全面设立“舒缓疗护”病区,在提高癌症晚期患者生存质量的同时,为其带来充满人道温情的“临终关怀”。在努力推进设立“舒缓疗护”病区的同时,上海也积极学习海外经验。

28名“舒缓疗护”医护人员已赴港观摩“临终关怀”。他们参观了白普理宁养中心、小姐妹安老社等临终关怀机构,借鉴行之有效的临终关怀方法、与患者和家属的沟通技巧等^[13]。这些举措是对临终关怀事业的有益尝试。只有创设了足够的临终关怀机构,并配备相当规模的专业工作人员,临终关怀事业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R]. 2011-04-28.
- [2] 卫生部. 卫生统计信息工作[R]. 2009-03-05.
- [3] 夏雨. 美国专家质疑癌症晚期治疗[N]. 生命时报, 2006-06-13(2).
- [4] 张朝霞, 廖晓平, 安金波, 等. 临终关怀服务中卫生资源配置的伦理学思考—215例恶性肿瘤患者临终期医疗费用的调查研究[J]. 中国医学伦理学, 1995(4): 26-27.
- [5] 徐勤. 美国临终关怀的发展及启示[J]. 人口学刊, 2000(3): 52-54.
- [6] 胡念飞. 临终关怀: 理念被误解制度性建设迫在眉睫[N]. 南方日报, 2011-12-12(5).
- [7] 缥缈孤鸿影. 中国的临终关怀机构状况[EB/O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e067b760100w722.html.
- [8] 环球网. 临终关怀最佳国家英国第1 中国排名第37[EB/OL].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07/961313.html>.
- [9] 王巧燕. 宁养在中国大陆发展现状[EB/OL]. <http://sp.ruc.edu.cn/2007-10-09>.
- [10] 钟纭. “临终关怀”困扰美国人[N]. 人民日报: 华南新闻, 2000-10-17(2).
- [11] 郑晓江. 善死与善终(中国人的死亡观)[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7.
- [12] 丁焱. 临终关怀发展中的伦理问题[EB/OL]. <http://www.qnr.cn/med/data/leyzk/hlx/201003/391034.html>.
- [13] 陈静. 上海全面推行“临终关怀”欲实现“生死两相安”[EB/OL].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3/01-10/4478184.shtml>

[责任编辑: 范 君]

社会系统的群体经验过程研究

刘益宇

(华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系统科学与系统管理研究中心, 广州 510006)

摘要: 社会系统理论的第三次浪潮提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即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理论来描述社会过程, 尤其是描述社会系统的群体经验生成过程, 过程思想则为探究这个问题提供了原则性的分析工具。过程思想构建出一种经验分析模型, 强调感受经验、感受经验的传递、客观经验的突现、过程因果效力的建构等层次性特征, 以系统群体经验与个体经验的关系互动为基本分析对象, 为描述社会系统的群体经验生成及其原因提供一条新的研究进路。

关键词: 社会系统; 过程思想; 群体经验; 过程因果

中图分类号: B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 (2014)02-0047-05

Study on the process of group experience in social systems

LIU Yi - yu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ystems Science and System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Center,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e third wave of social systems puts forward an urgent problem about how to find a suitable theory to describe the social process of group experience, especially the generating process of group experience in social systems. The process thought offers principal analytical tools for exploring such a problem. The process thought constructs an experience model with hierarchical features of feelings, transference of feelings, prominence of objective experience and processing causal efficac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 between individual and group experiences and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for the generation and its cause of group experience in social systems.

Key words: social systems; process thought; group experience; processing causal efficacy

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具有普遍性理想的一般系统理论及其影响下的系统运动,在解释自然系统方面取得空前成功,而在解释人类社会方面进展缓慢,主要是以系统隐喻的方式来理解人类社会,但这却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是否可以用系统概念和方法来解释所有层次?人类社会是否具有独特性?复杂社会系统如何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系统更加有效和稳定?稳定的社会系统如何进化?社会系统中个体的作用是什么?个体经验与群体

经验如何互动?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理论来描述社会过程。进一步说,如何进行社会过程的经验研究。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索耶(R. Keith Sawyer)教授将复杂系统突现的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系统的经验研究,认为人类主体交流具有独特的复杂性,需要重视三个层次的研究:个体、个体的相互作用动力学、群体的社会突现的宏观性质,提出了“非还原个体主义”的“突现范式”(The Emergence Paradigm),以解释社会群体的复

收稿日期:2013-11-2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华帝国后期的时间管理——明清时代之颁历制度研究”(13YJC770044);华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培育基金“社会系统的过程机制研究”资助

作者简介:刘益宇(1982-),男,内蒙古卓资人,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过程哲学、系统哲学、科学与宗教。

杂现象如何从个体相互作用中产生及传播。然而,索耶的突现范式依然没有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社会过程群体经验生成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一、社会系统理论三次浪潮的范式转换

社会系统理论经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第二次浪潮是源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一般系统理论,第三次浪潮是基于90年代的复杂动力学系统理论的发展^{[1][7]}。三次浪潮的主导范式依次为:结构范式、相互作用范式、突现范式。在范式转换中,社会过程的群体经验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系统理论的核心问题。

(一) 社会系统理论的三次浪潮

社会系统理论第一次浪潮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在第一次浪潮中,帕森斯在其主要著作《社会系统》中,利用系统理论和控制论提出著名的社会系统的结构功能主义。帕森斯所说的社会系统就是结构,而这种结构预设了系统是分层次的,不同层次的系统模块具有其固有的原则。帕森斯结构——功能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可分解性。这种可分解性不仅体现在结构上,也体现在功能上。帕森斯主张,任何社会系统都具备四项基本功能:A—适应(adaptation)、G—达标(goal-attainment)、I—整合(integration)、L—维模(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2]。功能的可分解性的一个结果就是功能的局部化。“在社会系统中,与系统有关的作用和功能之间有相同顺序的关系,正如有机体中器官和功能的关系”^[3]。然而,帕森斯理论的主要问题在于将社会系统理解为均衡的、静态的和可分解的,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系统被还原到个体层次上解释。在这种结构—功能系统中,群体经验被概念化为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最终用功能来定义解释。

第二次浪潮是源自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一般系统理论。社会系统的第二次浪潮具3大特征。首先,最明显的特征是强调动态和变化。代表人物英国社会学家沃尔特·巴克利(Walter Buckley)在《社会学和现代系统理论》(1967)中指出,动态的社会系统不仅包括均衡的结构,也包括变化的潜力,在不断变化中自组织和自维持。其次,强调动态系统的非线性和非还原性。“科学家习惯于发展理论来描述在特定领域的观察结果,并不把它们追溯到一个更基本领域的理论。尽管在附加特定信息被提供的情况下,这样一种推导在原

则上是可能的,但在任何给定时间对于大多数实例在实践上不可能的。”^[4]再次,强调开放系统。在开放系统中,系统和环境之间存在能量流、信息流或物质流。许多理论家认为,第一次浪潮的结构—功能主义就是控制论的衍生理论,只适合于封闭系统。“耗散社会系统呈现远离均衡的行为。也就是说,它们的进化是混乱地被驱动…能够用研究自然耗散系统相似的方式来研究耗散社会系统。”^[5]一般来说,第二次浪潮没有解决社会突现的问题,从自然科学中引用过来的一系列隐喻被用在社会学,但在社会学意义上,很难看出社会如何会是一种耗散结构,或是远离平衡态的系统。换句话说,一系列非线性、动态系统的隐喻并没有帮助人们去理解微观社会的相互影响以及如何贡献于社会突现。

第三次浪潮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的复杂动力学系统理论的发展。社会系统的第三次浪潮对于解释复杂社会现象更为合适。第三次浪潮从近年来计算机科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中突现出来,主要关注社会突现、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和分析层次间的关系(见图1)。相比于第二次浪潮的观点,第三次浪潮的理论家们认为社会系统不只是动态的、非线性的,而且社会系统中的突现过程在本质上不同于自然和生物系统的突现过程,尤其强调微观层次的主体以及主体之间的交流在社会突现中的作用。在自然系统中,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具有可观察性。比如,在神经细胞中可以观察到神经键之间相连。而微观主体之间的信息传递的本质却不是很好理解。微观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比神经突触传递更为复杂。指向过程、意义和主体间性变得更为重要,这些交流内容不具有可观察性和可描述性,而具有符号性和意向性等特点。

(二) 范式转换

社会系统第一次浪潮的主导范式是结构范式。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正是结构范式的典型进路。结构范式强调两个层次的分析:个体和社会结构。结构范式理论主要有三种类型:结构决定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混合理论。结构决定论认为基本的社会结构是驱动性因果力,决定了个体的性质;方法论个人主义指出个体性质决定了社会结构;混合理论则认为个体和社会结构都是自主性实体,社会学必须解释上向和下向两种因果力。然而,结构范式无法解释社会突现过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浪潮的主导范式是相互作用范式。相

互作用范式同样强调个体和社会结构,但更加注重个体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将相互作用作为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分析层次。相互作用包括话语模式、符号相互作用和主体际性等。如果说结构

范式承认结构还原和个体还原,那么相互作用范式就是强调最终要还原到互动。然而,相互作用范式没有提出社会结构与相互作用层次、个体与相互作用层次之间的机制,也没有提出社会突现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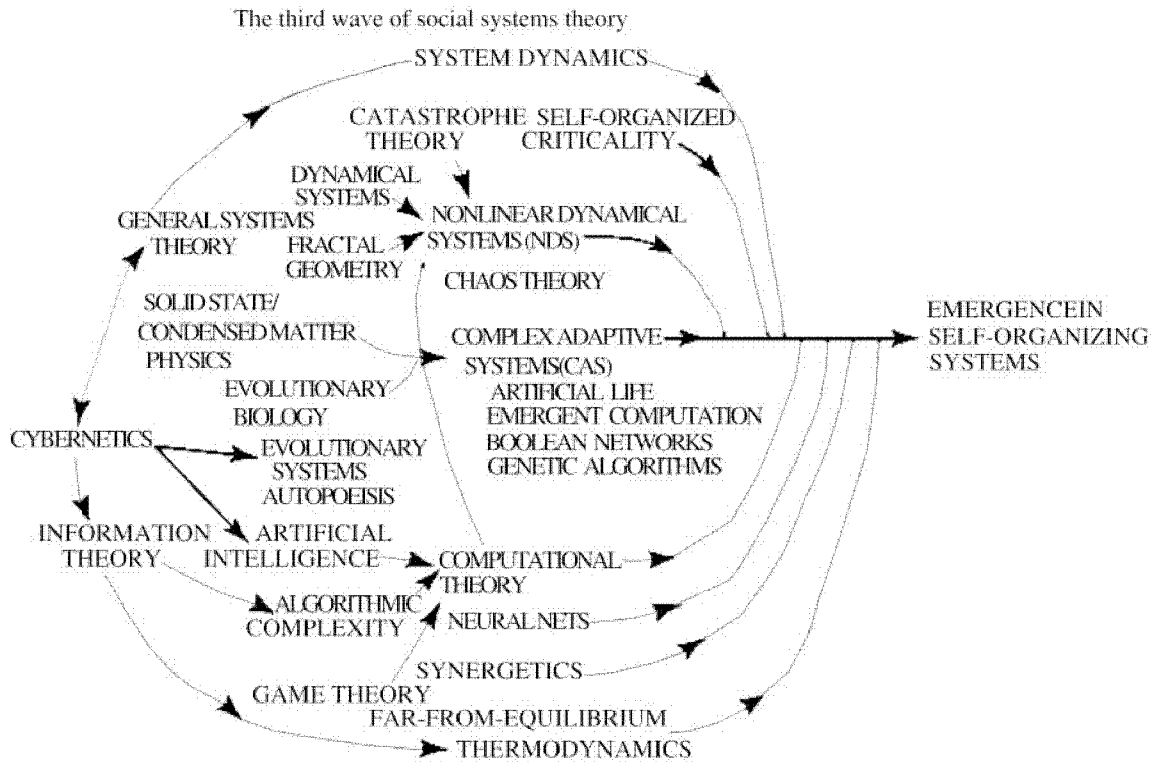


Figure1 The histoical development of third-wave emergence theory(from Goldstein 1999,55).

突现范式主导第三次浪潮。突现范式引入两种新的层次:短暂突现和稳定突现。短暂突现包括主题、语境、相互作用架构、参与结构、关系角色和地位,而稳定突现包括群体亚文化、共享的社会实践和群体记忆等。社会突现是连接相互作用层次与短暂、稳定突现层次的过程。

二、群体经验的过程模型

社会系统第三次浪潮的显著特点就是反还原主义。然而,尽管社会系统理论家们普遍认为还原到一个低层次的解释是不可能的,但没有对所涉及的一个核心问题给出一种原则性和基础性的论证:社会系统为什么在理论上不可能被还原到低层次的分析。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为探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工具。

(一)过程与经验

过程主要分为宏观过程和微观过程。宏观过程是因果性地从已达到的现实性(Actuality)向正

在达到的现实性的转变,而微观过程则是条件的转变,即从纯粹的真实(merely real)转变为确定的现实性。有机体就是宏观过程和微观过程的综合。就具体事物来说,过程的首要意思是宇宙的扩展;而有机体的首要意思则是指处于扩展中的宇宙。

经验的五个预设条件:(1)经验形式的根本原因在于创造性;(2)经验生成的根本原理是指,分离状态的世界凭借创造性成为一个联合状态的世界;(3)经验生成的先决原因在于共在,新共在的产生就是合生,只能通过直觉来解释;(4)经验生成的起点是永恒客体,即纯粹潜能,或者可称为关于事实的确定性形式;(5)经验的最具体要素包括现实实有(actual entity)、摄入(prehension)、联系(nexus)。现实实有的一般特征包括情感、目的、评价、因果关系。联系是指现实实有中任何这样的共在的特殊事实。当现实实有进行感受时,即进行肯定摄入时,现实实有就是自因,特征是创造性。“现实实有是可分的,然而事实上又是未被分的。

因此,其可分性指的仅是它在其中超越自己的那些它的客观化,但是该超越只是自我展示。”^{[6]311}

(二) 感受经验的生成与传递

关于现实实有生成的核心观点就是感受论。在一个感受中,现实世界是选择性地被占有的,既是作为前提的资料,也是有自己的实现了的选择性地相关的形式,所谓实现了就是“被客观化”。在一个感受中,将自己呈现在某物之前的东西就是原始资料,将自己呈现在某物之中的东西就是主观形式,将自己既呈现在某物之中又在某物之后的东西,就是“主体-超体”。

一个感受是指一个现实实有的满足可分为种种的活动,这些活动便是“摄入”,而其中肯定摄入被称之为“感受”(feelings)。一个感受包括五种因素:(1)进行感受的“主体”;(2)要被感受的“原始资料”;(3)因否定摄入而产生的“排除”;(4)被感受的“客观资料”;(5)“主观形式”,即该主体是如何感受该客观资料的。一个感受在各方面都是明确的,它有明确的主体、明确的原始资料、明确的否定摄入、明确的客观资料,以及明确的主观形式。一个感受不能脱离享有它的那个现实实有。这样的现实实有被称为该感受的“主体”。感受的主体是自因。关于一个感受的描述,可以用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对声音的倾听。首先,这一感受有一个倾听者作为感受主体。其次,存在着一个复杂而有秩序的环境,该环境通作为这一感受的资料,被这一感受系统地理解的外部世界。再次,还存在着一个情绪的传感模式,即主观形式。这一声音被倾听者感受,有其音高、音质和强度,可被分析成基本音调以及各种泛音。此外,还存在着音叉的空间模式、与音乐厅的共振和身体等要素,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一种感受整体。在感受整体中,倾听行为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第一阶段是早期的原始倾听,并不包含喜欢或不喜欢的情绪模式,第二阶段倾听行为与其它感受相结合,获得了主观形式的复杂性,其中包括情绪模式。

如何感受?现实实有A可以感受另外三个现实实有B、C、D。现实实有B也可能感受到C、D。现实实有C也可能感受到D。现在B作为被A感受的原始资料,B并通过媒介作用让A感受到C和D。同样,C作为被A感受的原始资料,C通过媒介作用让A感受到D。因此,A通过三个不同的渠道感受到D:(1)直接感受D;(2)在D与C的联系中感受D;(3)在D与B的联系中感受D。换一

句话说,在A合生的基础阶段,出现了原始资料D的三种不同的摄入。在第一种摄入中,A直接感受D,但由于A具有主观形式,所以必然与D的完整形式有不一致。同样,B和C感受D时有不一致。而A通过B和C的媒介作用感受到D也有不一致。通过A的主体统一性范畴,A对这些不一致进行否定摄入,即进行排除。这样第一阶段的三种感受达到一致,因而便可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整体中。

感受如何传递?存在三种基本的感受类型:简单的物质性感受、概念性感受、变化感受(transmuted feeling)。“在简单的物质性感受中,原始资料是一个单独的现实实有;在概念性感受中,原始资料是一个永恒客体;在嬗变感受中,原始资料是一个联系,这个联系由现实实有组成。”^{[6]318}一个简单的物质性感受包括两个相关的现实实有。一个是这个感受的原始资料,另一个是这个感受的主体。作为原始资料的现实实有是“原因”,作为感受主体的现实实有就是“结果”。原因进入结果,这一过程是时间的累积性,而时间的累积性特征决定了时间的不可逆转性。一个简单的物质性感受具有双重特性:既是原因的感受,又是作为主体的结果。这种双重特性导致一种原因导致结果的矢量特性。概念性感受和简单原因感受属于两类初级感受,所有其它复杂的感受都源自于初级感受在某一阶段的整合过程。主体在两类初级感受的整合中完成自我建构,并对新颖的概念性感受进行主观评价和修正主观形式,从而指导整合过程。

(三) 群体经验的合生过程

群体经验产生的第一个阶段是合生衍生的纯粹阶段,或者说是感受反应阶段。一个现实实有“分割”成多个“摄入”。摄入就是关联性的个别事实。每个摄入都在自身内繁衍出那个现实实有的那些一般特征。每一个摄入包含三方面要素:进行摄入的“主体”、被摄入的“资料”和“主观形式”。对现实实有的摄入被称之为“自然的摄入”,而对永恒客体的摄入被称之为“概念性摄入”。摄入包括两种类型:肯定摄入和否定摄入。肯定摄入是指“感受”,而否定摄入是指“从感受中排除”。摄入的第三方面要素是“主观形式”,是指“主体”如何摄入“资料”的,具体形式包括情绪、评价、目的、反感、厌恶、意识等等。明确性包括两方面内容:确定性和位置。确定性是指对选择的永恒客体的演示,而位置是指现实实有联系中的相关地位。

群体经验产生的第二个阶段是合生衍生的不

纯粹阶段,或者说是感受补充阶段。感官知觉:以表象直接性的方式显示的意识知觉。感受补充首先是审美补充,然后是理智补充。在审美补充阶段,知觉对于合生中的客观内容抑制或者强化;而在理智补充阶段,知觉则会充分对比纯粹理论潜能和已实现的事实。第三个阶段是合生过程的最终阶段,或者说是感受满足阶段。合生的最终结果是生成一个现实实有。最终阶段被称之为“满足”,即一个复杂的、充分明确的感受过程。所谓满足,就是创造的欲望实现它的范畴性要求因而满意。“一个现实实有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期间,具有不完整主观统一体的许多活动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活动统一体;这被称之为‘满足’。”^{[6]300} 满足的明确性包括发生、超验创造性的客观特性和对每一事项的摄入。合生过程可以简单概括为:许多感受组成的初始阶段;整合早期简单感受的复杂感受发展阶段;感受复合统一的满足阶段。

三、关于社会群体经验的过程式探究

探究社会过程群体经验生成原因的一个前提是如何理解个体和群体的关系。我的观点是如何理解个体和群体的关系,首先要依赖于我们如何理解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从时间化思维来看,整体才可能大于或小于部分之和。时间化思维强调世界在本体论意义上是以时间为本位而存在的。时间性存在一个重要特征是强调过程因果效力。过程因果效力具有三个要素:经验的客观性、不可逆性、瞬间创造性。首先,经验的客观性是指世界作为有机体,将经验的原初资料不断客观化。“有机体”概念的核心内涵是持续的具体实有,其表现是整体的结构对于从属机体的性质都有影响。正如怀特海所指出的,反对事物在时空中的基本形式是简单位置,而是强调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事物在全部时间内都存在于所有的地方。人们可以模糊地认识到,有一个境域是超出于我们清晰的认识能力之外的,作为理论出发点的终极武断事实,应当能显示出和这个境域同样的实有的普遍原则。自然表明其本身体现了一种服从着决定论条件的机体演化哲学。像空间的度数、自然法则、受因果制约的持续实有等都是这类的条件。但这些实有的性质及其时间性与空间性,又是超越其自身的,是自身之外更广阔演化的结果。

其次,不可逆性表明了过程因果的非空间特征,不是空间内一个事物引起了另一个事物的变

化,而是时间内所有事物自身的不断进化,在某一个时刻产生了所谓的“结果”。非空间特征必然导致事物的不可分解性。对于社会系统的研究,不可分解意味着避免方法论个体主义,而倾向于方法论群体创造。“波尔兹曼和达尔文都用对群体的研究取代了对“个体”的研究,并表明细微的变化(个体的易变性或微观的碰撞)在发生了一段长时间之后在一个集体层次上产生进化。恰如生物进化不能在个体层次上加以定义,时间流也是一个全局的性质。”^{[7]16} 再次,瞬间的创造性。创造性没有自身的特性,这正如亚里士多德的“质料”没有自身的特性一样。它是位于现实基础的最高一般性的终极概念。不能描述它的特性,因为任何特性对于它来说都太特殊了。但人们发现创造性总是在一定条件下,被描述为被条件所规定的。囊括一切且不受限制的评价,这种非暂时的行动既是创造性的产物,又是对创造性的一个限制条件。它和所有的造物一样,都有这一双重特性。

参考文献:

- [1] R. Keith Sawyer. *Social Emergence: Societies as Complex Systems*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7.
- [2] 颜泽贤, 范冬萍, 张华夏. 系统科学导论——复杂性探索[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171.
- [3] Parsons, Talcott. *The Social System* [M]. Glencoe, IL: The Free Press, 1951:115.
- [4] Kauffman, Stuart A. *The Origins of Order: Self-organization and Selection in Evolu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15.
- [5] Harvey, David L, Michael Reed. *Social science as the study of complex systems* [C]// Douglas Kiel, Euel Elliott. *Chaos theor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306.
- [6] A. N. 怀特海. 过程与实在[M]. 周邦宪, 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6.
- [7] Whitehead A N.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8:16.
- [8] Whitehead A N. *The Concept of Nature*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0.
- [9] 伊利亚·普里戈金. 确定性的终结: 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M]. 湛敏, 译.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9.

社会工作视角下的义工组织管理机制研究

徐从德^{1,2}

(1. 青岛科技大学 法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61; 2. 香港中文大学 社会工作系, 香港)

摘要:近年来,我国的义工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服务规模不断扩大,服务内容和领域不断拓展,作为组织、管理、服务义工的各种类型义工组织也不断涌现。但现在义工组织的建设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发展体系,没有健全的组织管理机制,缺乏有效的吸引力,组织义工流动性较大,这些问题阻碍了义工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作为与义工服务息息相关的一个专业,社会工作在应对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的问题时有一套独特的工作方法。站在社会工作的角度,运用社会工作的原则与方法,对新形势下义工组织的管理机制进行探讨,成为一种解决义工组织在发展中遇到问题的途径和新的尝试。

关键词:社会工作;义工;组织建设;管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F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2-0052-05

Research on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volunteers'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work

XU Cong - de^{1,2}

(1. School of Law,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Qingdao, Shangdong 266061, China; 2. Division of Social wor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quality of China's volunteer service has been improved continuously, and all kinds of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are emerging. But these organizations have not yet formed a complete development system, nor have they sound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mechanisms or an effective attractiveness. These problems have hindered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As a major closely related to volunteer services, social work has a unique way of responding effectively to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social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work, applying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social work in exploring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in the new situation has become a way and a new attempt to solve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development.

Key words: social work; volunteer;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echanism

一、概念的厘清

(一) 义工

“义工”是英文 volunteer 的中文译法,也称为志愿者,起源于 19 世纪西方国家宗教性的慈善服务,在世界上已经存在和发展了 100 多年。关于义工服务的概念,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秉承助人

的美德,自愿从事不收取任何报酬的福利活动^[1];第二类是以帮助他人或改善环境的组织性利他行为^[2];第三类是基于社会公益,响应社会责任及态度的一种不求回报的参与行为^[3]。

综上,义工的服务本质是服务社会,核心精神是自愿、利他、不计报酬,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分别是志愿性、非利益性、社会公益性和组织性。因

此作为从事志愿服务的主体,义工的定义指的是在不索取任何报酬的情况下,为改善社会服务,促进社会进步而自愿贡献个人的时间和精力,为他人提供服务的个体。

(二) 义工组织

在社会学中,组织是指追求特定目标的社会群体,是群体活动方式的一种类型^[4]。在当前使用的概念中,与义工组织相近的词汇还有诸如“志愿者组织”“志愿组织”“志愿服务组织”等,但这些词的含义是一致的,只是表述不同。在北欧和英国较为流行用义工组织的概念来代替非营利组织的概念,主要为了强调其志愿性的特征,认为义工组织就是指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质和志愿性质的组织^[5]。而萨拉蒙、奥斯本等专家学者认为只要符合正式建立的组织、独立于政府的私立组织,对组织的拥有者和董事没有营利分配、有自我管理并具有控制自己活动的能力、有一些有实质意义的志愿内容^[6]的组织都可称为义工组织。由此,义工组织可以定义为,坚守志愿精神,以满足公共需求、实现社会公益为目标,独立自主地开展非营利性志愿工作和服务的社会组织。义工组织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它提供的是一种志愿性的服务,强调服务的自愿性;二是体现了无偿性,即非营利性;三是相对的独立性,独立地确定自己的运作方向和行为方式;四是服务内容灵活多样性。

(三) 社会工作

根据民政部的定义,社会工作是以“助人自助”为宗旨,运用专业知识和方法,开展困难救助、矛盾调处、权益维护、心理辅导、行为矫治等社会工作,在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正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是现代社会管理与服务的重要力量^[7]。

西方社会工作萌芽于18世纪后期,发展于19世纪,成熟于20世纪初期。这段时间正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社会转型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社会学术语,意指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8])。在这一个多世纪中,社会工作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以救济、解

困和发展为其主要工作内容,对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自身也在这段时间中逐步完成专业化和职业化进程。当前我国也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如下岗、贫穷、人口老龄化等,大量的社会弱势群体出现,并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迹象。社会问题的调适,不仅需要政府部门从政策上予以宏观调控,调动政府各个部门予以解决,而且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来自社会民间的工作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9]。从社会工作专业角度来说,大量的社会工作空白点由此产生。为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并引入社会工作的理论、教学和研究,并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尝试着开展本土化的社会工作专业化建设。

二、当前我国的义工组织发展现状

在近3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义工组织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自发到自觉,从人数不多到数量和类型的不断壮大,从零散、随机性行动到比较规范的活动这样一个过程,并随着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而发展壮大。

(一) 我国义工组织发展历程及现状

我国最早的义工组织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主要是在社区服务的层次上,并逐步建立起为数众多的社区义工组织。90年代初期,另一支义工队伍在共青团系统中形成,并出现了全国性的青年义工组织——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这两个义工组织依然是目前“在中国最为活跃、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两支志愿者队伍”^[10]。它们在实践层面带动了我国其他义工组织的发展。作为我国内地义工组织的发源地之一,广东省较早地将“学雷锋、做好事”与义工组织“自愿、无偿、独立、多样”的理念相结合,创造了我国义工组织发展史上四个全国第一,即全国第一条志愿服务热线电话、第一个正式登记注册的志愿服务团体、第一个地方性法规、第一个地方性公募志愿者事业发展基金会^①,在全国树立了义工组织建设发展的典范。当前,我国的义工服务事业发展迅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义工组织与人数规模不断扩大,来自共青

^① 1987年,广州市十多名热心的青少年服务工作者建立“中学生热线服务”,成为全国第一条志愿者组织热线。深圳市的青年志愿者在1990年6月16日以“深圳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的名义在市民政局登记注册,成为我国大陆地区第一个正式登记注册的志愿者组织。1999年,广东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广东省青年志愿服务条例》,是我国大陆地区第一部志愿者组织的地方性法规。2007年6月19日,广东省志愿者事业发展基金会宣告成立,称为全国首个地方性志愿者事业发展基金会。

团中央的2011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已有规范注册的志愿者3 392万人。自1993年底共青团中央发起实施青年志愿者行动以来,累计已有超过4.03亿人次的青年和社会公众为社会提供了83亿多小时的志愿服务;90%以上地、市、州、盟,80%以上的县、区、市以及1 968所高校成立了青年志愿者协会^①。二是义工服务的法律法规逐步完善。为适应志愿服务事业不断发展需要,已有商务部、团中央和中国红十字会以及山东、福建、河南、黑龙江、吉林、宁夏、湖北、浙江、北京、天津等18个省市制定了志愿服务的条例、规定、办法,还有多个省市准备对志愿服务进行立法或将志愿服务立法纳入立法计划。三是一批精品义工服务项目成为品牌。围绕我国国情,先后成立发展了西部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扶贫接力、环境保护、海外志愿者、红十字志愿者、应急救援志愿者、亚运志愿者、奥运志愿者等义工品牌服务项目。

(二)我国义工组织的类型

按照邓国胜的观点,目前我国的义工组织主要划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模式是自上而下型,这种模式的最典型代表是中国青年志愿者组织,它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下属的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的从属组织,主要是配合团中央以及各级团委开展活动,而且活动主要是以项目性为主,并且和许多国家机关或者企事业单位的志愿者组织;第二种模式是自下而上发起,自上而下推广的模式,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是中国社区志愿服务组织;第三种是自下而上发起,自下而上发展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就是民间自发成立的,旨在以推动社会公益为宗旨而提供无偿服务的民间志愿者组织^[11]。

三、义工组织存在的问题

在各地义工组织不断壮大和发展的过程中,一些问题也不断凸显,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王绍光认为中国发展非营利事业的社会条件、法律条件和资金条件还存在相当大的缺陷。社会条件方面的缺陷是指人们的志愿精神还不够强,积极参加志愿行动的人占总人口比重还不太高。法律条件的缺陷是指现行法规对民间非营利组织约束有余、扶

助不足。资金条件的缺陷是指几乎所有民间非营利组织都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有些甚至等米下锅,难以为继^[12]。总体来看,目前义工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管理机制不健全。义工服务是一种志愿性服务,但是并不是说想去做义工,就去做义工,义工也需要管理和培训,但是目前大部分的义工组织存在着自我管理不完善、人员招募与选拔机制不健全、缺乏对志愿者的科学培训和有效管理、志愿者流失率高等问题^[13];二是资金缺乏。义工组织普遍经费短缺,虽然党政部门和社会机构对于义工组织资源的使用越来越普遍。但是由于政府投入不足,社会支持力度不足,义工组织资金存在重使用、轻支持,重付出、轻资助的现象,使得志愿者组织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志愿组织项目的社会效益受到了一定的制约^[14],特别是志愿者组织的日常管理、人员培训、项目策划缺乏必要的经费、场所等物资支持。严重制约其服务水平、服务能力的提高;三是公信力不足。由于我国政府部门对义工组织成立和登记的门槛设置过高,以双重管理体制加以严格控制和约束,义工组织的发展独立性不足,而且广大的义工组织缺乏相应的人员、财务、活动公开公示制度,公共关系建立、发展、维护方面的工作薄弱,义工服务组织的服务社会认同度比较低,导致组织的公信力不高。

四、社会工作视角下的义工组织管理机制建设

(一)社会工作的视角

社会工作是以助人自助为理念,帮助解决个人和社会问题,促进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服务活动。社会工作的特点一是注重专业价值,在从事社会服务时遵循尊重、接纳、保密、注重关系、个别化等专业的理念、指导思想和伦理;二是强调服务过程中采取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直接工作方法和社会工作行政、社会工作督导等间接工作方法;三是注重实践,社会工作从本质上来说是实践的,社会工作要通过对科学方法的运用,与服务

^① 我国注册志愿者达3 047万 应建立志愿服务保障机制. 参见广西新闻网 <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091212/newgx4b234338-2488267-1.shtml>

对象一起帮助他们改变自己的困境,增进其社会功能;四是多方协同,社会工作者介入的大多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常常既需要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分工,也需要他们之间的合作,很多时候社会工作者也要与其他人员合作,共同去解决服务对象所遇到的比较复杂的问题。以社会工作视角应对处理义工组织建设与发展的问題,需要用到社会工作行政的工作方法。这里的社会工作行政方法,也称社会行政,它包括计划、组织、人事、协调与控制等内容^{[7]1-16}。

(二) 义工组织的管理机制建设思路

在社会工作的视角下,一个义工组织应该在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况下,合理配置好人财物等资源,不断提升组织的公信力,争取机构的独立性运作,具体来说就是做好三个方面的管理。

1. 义工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是与规划、组织、领导、控制并行的一个重要管理功能,主要面对的是组织中的人这一要素,包括义工资源的招募、发展、激励和维持所组成的过程^[15]。这种管理强调重视组织成员的价值,通过对义工的支持与鼓励,协助义工进行服务。根据这一观点,义工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建设应该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招募,包括吸引义工进入组织、选取最佳服务人选、训练新人、分配工作和处理义工离开等;二是训练与发展,包括对义工进行训练,协助其学习助人服务的新技术、新方法,增进他们的服务意识和能力^[16];三是义工的绩效评估与激励^[17]。评估的目的是为了评判义工的服务质量,决定训练内容,改进组织的工作,决定奖惩标准。激励是指促使义工有意愿地追求组织目标,降低义工的疏离感、提升义工的服务满足感,常用的激励措施是表扬、颁发荣誉、评定星级等^[18];四是义工经费的管理。义工服务不仅仅是无偿的,也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持,主要是包括交通、通讯补贴以及必要的服务活动组织费用;五是义工关系的维持。对于义工组织来说,义工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而建立与维持与义工的良好关系,是留住义工的关键,包括公平对待每一名义工、提供充分的服务后勤支持、加强义工训练和义工辅导等。

2. 社会服务机构财务管理。义工组织的财务管理,是指确认、获取、有效使用和妥善记载组织管理与运作和义工服务活动所需的财、物资源的管理过程,目的是维持机构的收支平衡。主要内容包括

三个方面:一是提供经费,支持义工服务活动的实施;二是通过成本分析、监控预算等环节使方案执行更有效率,更节约成本;三是根据组织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预算,包括单项预算法、方案预算法和零基预算法。其中单项预算法以当年的预算作为规划来年预算的基准并以渐进的方式为基础规划来年的预算;方案预算法以某项义工活动计划为基础,根据方案列明各项开支和资源设备等,编成一份预算方案;零基预算法是在制定下一年度预算方案时,以没有资金为基本出发点,根据机构在来年的实际需要而做出预算。

义工组织财务管理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组织资金的筹集。一般来说,义工组织的经费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政府资助和民间捐助。目前可以选择使用的筹资方法有三种:一是通过项目申请;二是街头劝募和电话募捐;三是特别事件筹资活动,指社会服务机构通过特殊事件的筹资活动,引起社会大众对组织和相关事件的关注,比如5.12汶川地震的义工服务筹资活动。

3. 义工组织的公信力评估和公共关系管理。公信力是指义工组织对社会负责和对社会的一种交代,也就是义工组织对其使用的公共资源的流向及其使用效果进行社会交代的过程,包括财政交代、政治交代、专业交代、服务交代和行政交代。具体来说,主要是对义工组织的评估,包括机构本身的评估和社会服务绩效的评估。公信力的功能在于帮助社会服务机构树立社会公信度。公信力的评估性质上属于外部评估,是在政府或外界力量的强制要求下推行的。一般义工组织公信力评估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资金的合理使用和运作评估;二是服务和活动与组织使命和宗旨的一致性评估;三是财务与信息的透明化评估;四是规范的治理结构评估。

公共关系是一个组织为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发展环境,通过一系列有目的、有计划、持续的传播沟通工作。公共关系管理是对组织与社会公众之间传播沟通的目标、资源、对象、手段、过程和效果等基本要素的管理^[19]。义工组织的公共关系管理有助于建立和维持义工组织与公众之间的相互沟通、理解、接受和合作。义工组织通过公共关系管理工作解决和处理各种公众问题,面向公众强调和认定组织以公众利益为核心的经营管理责任,可让社会大众对组织的工作、服务和活动有正确、深入的认识;可以建立良好的形象和关系,有助于义工组织在众多申请争取资助的机构中独树一帜,获得

赞助机构或公众的好感;可以争取社会各界对组织的使命、新计划或新观念的接受;可以就政策的制订和立法的修订进行游说工作,让组织在较有利的环境下开展服务。义工组织开展公共关系常用到的方法包括写新闻稿、开记者会、接受媒体采访、制作组织的刊物、公开演讲等。

五、结语

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义工服务及其蕴涵的精神,既与中华民族扶贫济困、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一脉相承,又适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主体自觉的道德要求。实践证明,义工组织的存在及有效运作,是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有益补充,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义工组织已经成为广大公众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新平台。在新形势下,借鉴社会工作的专业视角,通过改进和加强义工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公信力评估和公共关系管理等,开拓义工组织建设与发展的新局面,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我国义工组织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我们坚信在社会热心公众的参与与支持下,在新的管理视角和方法的借鉴与使用下,义工组织将会渐渐成长、壮大,义工服务精神的鲜花也会在中华大地上绽放。

参考文献:

- [1] Levin H.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in social welfare [M]. In Encyclopedia of Social Work (17th ed.).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 1977:1573-1582.
- [2] Bills D & Harris M. Voluntary Agencies: Challenges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 [3] Smith M P. Taking Volunteerism into the 21st century: Some conclusions from the American Red Cross Volunteer 2000 Study [J]. The Journal of Volunteer Administration, 1989, 8 (1): 3-10.
- [4]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 [M]. 北京: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25.
- [5] 王名. 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9.
- [6] 叶雯. 志愿活动中的政府治道分析 [D].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 2006: 9, 10, 22.
- [7] 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教材编写组. 社会工作综合能力(中级)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16.
- [8] 郑杭生, 李强. 社会运行导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15-30.
- [9] 童星. 现代社会学理论新编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2-18.
- [10] 金晶. 中国志愿者组织的发展现状和功能的研究 [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2007: 7-36.
- [11] 邓国胜. 中国志愿服务发展的模式 [J]. 社会科学研究, 2002 (2): 108-110.
- [12] 王绍光. 促进中国民间非营利部门的发展 [J]. 管理世界, 2002 (8): 44-53.
- [13] 陈佳. 关于中国青年志愿者组织发展现状的思考 [J]. 理论界, 2006 (2): 105-106.
- [14] 徐柳. 我国志愿者组织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J]. 学术研究, 2008 (5): 67-72.
- [15] 陈熙春, 顾建健, 马立. 略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管理 [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6, 7 (6): 30-38.
- [16] 保罗·杰·伊尔斯利. 志愿者教育导论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3.
- [17] 丁元竹, 汪汛清. 志愿活动研究: 类型、评价与管理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 [18] 胡蓉. 我国志愿者的激励机制探讨 [J]. 成都教育学院学报, 2006, 20 (1): 70-72
- [19] 映红. 公共关系管理 [M].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2: 1-5.

[责任编辑: 吴晓红]

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以安徽理工大学为例

张 旻

(安徽理工大学 学生工作处, 安徽 淮南 232001)

摘 要: 国家实施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体系, 全面落实大学生民生工程, 实现病有所医, 让学生充分享受国家惠民政策, 切实保障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医疗, 大大减轻了社会、学校与大学生个体的经济负担。但在运行过程中, 也存在诸多影响运行的问题。以某高校为例, 通过对其近年来的在校大学生参保及运行情况进行调研, 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及措施。

关键词: 大学生;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问题; 建议

中图分类号: F840.6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2-0057-03

Problems of and suggestions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enrollment in the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for urban residents

— taking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ZHANG Yang

(Department of Student Affair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for urban residents,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livelihood project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dical services to enable students to fully enjoy the national policy have effectively guaranteed college students' basic medical needs and greatly reduced the social, school and individual students' economic burden. However, there exist also many problems in the course of the operation. Take some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and by a survey of the recent years of college students' enrollment and operation situ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ir cause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for urban residents; problems; suggestions

为切实保障在校大学生的基本医疗,减轻学校负担,2008年10月25日,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将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范围的指导意见》(国发办[2008]119号),为全国范围内的大学生医保工作制定了指导原则,规定在校大学生全部纳入城镇居民医保。安徽省2008年起实施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五年时间后,笔者对安徽理工大学五年来大学生参保及运行情况进行了调研,分析大学生参保后所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及措施。

一、安徽理工大学大学生医疗保障的现状

根据省教育厅、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和淮南市政府制定的一系列相关文件,安徽理工大学结合本校实际,对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本原则、参保范围、保障方式等制定了文件,加强了管理。经过几年的实践,该项工作初见成效。

(一) 参保的基本原则与参保范围

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实施,坚持自愿参保原则,所需费用由学

生个人缴费(35元/人/年)、财政补助和社会资助捐助等渠道筹集的资金组成,实行住院及门诊特大病统筹与普通门诊统筹相结合的“双统筹”保障方式。重点保障学生基本医疗需求,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安徽理工大学的参保范围为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全日制研究生(以下简称大学生)。保障方式是按照属地原则,通过参加学校所在地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大学生住院和门诊大病进行费用报销^①。

(二) 医疗保障方式

安徽理工大学规定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可享受普通门诊、住院、门诊特大病、意外伤害、省级调剂金等五种保障方式。

1. 普通门诊。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按学校当年实际参保人数和缴费情况,将每所学校的门诊医疗费按统筹基金30元/人划拨给学校,由学校统一管理,专款专用。普通门诊在校医院就诊者药费按20%收费(使用校园一卡通刷卡,门诊费用不再报销);经校医院同意转到市内定点医保医院就诊的,学校报销80%。每学期两类门诊报销门诊票据累计金额超出600元的部分,学校不予报销。根据专项医疗保险基金节余情况,对病情较重、门诊费用支出较大的参保学生进行二次救助。

2. 住院。市内一、二、三级医院住院报销比例分别为73%、68%和63%;符合学校管理规定的实习、寒暑假、因公外出和因病休学等法定不在校期间,参保大学生需在淮南之外住院治疗的,可选择居住地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所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凭材料上报市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年度住院最高报销支付额度为20万元。

3. 门诊特大病。参保大学生门诊规定大特病有以下十五种:肾功能衰竭门诊透析治疗、器官移植后抗排异治疗、恶性肿瘤、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肝硬化、再生障碍性贫血、重症肌无力、帕金森综合症、系统性红斑狼疮、精神病、血友病、类风湿性关节炎、肺心病(含慢性支气管炎伴肺气肿、支气管哮喘)。本着方便大学生就医的原则,门诊规定大特病种应在本人所选择的一家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参保大学生患有门诊规定病种在门诊治疗的,一个参保年度内视为一次住院,不分医院级别,先自付400元起付标准费用(包括申请二种病种),每个病种在规定的限额内,个人自付40%,基金支付60%。

4. 意外伤害。由市医保经办机构统一购买商业保险。

5. 省级调剂金。根据上级相关文件要求,调剂金从各统筹地区大学生医疗保险住院及门诊特大病统筹基金年度结余中提取,实行省级统一管理。调剂金主要用于支付超过当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费用、疑难或重大疾病医疗费用和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补助,以及各统筹地区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及门诊特大病统筹基金超支部分的补助。

(三) 医保工作成果

通过近五年的实施和运行,淮南市和安徽理工大学大学生医保工作取得了良性发展和丰硕成果。第一:医保政策深入人心,学生意识增强,参保认识空前统一(通过对比,改变了对商业保险的认识)。学生保障水平逐年提高,得到的实惠增多,学生普遍感受到党和政府惠民政策的温暖。2008年参保19967人,参保率98%;2009年参保20984人,参保率98.5%;2010年参保22091人,参保率99%;2011年参保22991人,参保率99.5%;2012年参保23511人,参保率99.8%,参保率逐年提高;第二:大学生参保后,大学生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使大病、重病及慢性病风险有所降低。与此同时,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教育厅、财政厅为学生建立了省级调剂金,主要解决学生患大病、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患病时医保基金支付限额以上部分,使大学生看病花费更少的钱。例如:安徽理工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某学生小李,患腰椎肿瘤,家庭经济困难,住院花费3万6千元,经市医保统筹、省级调剂金申请,35元换来2万9千元。淮南市对患病大学生每年最高支付限额达到20万元,如大学生在患有血液病、恶性肿瘤、器官移植等重大疾病时,就会得到有效的保障。实行了这样的措施之后,患病学生的医药费就有了一个稳定可靠的来源,对学生家庭和学校而言,经济压力都将大大减轻。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过5年多的运行,大学生参保确实给大学生看病就医带来了方便和实惠,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相对城镇居民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参保费用低,门诊报销比例大,家庭经济困难和患重病、大病学生可以申请省级调剂金进行二次救助等,也使得部分贫困和患重大疾病的学生看到了希望,同时也缓解了政府、学校及学生家庭的压力,但笔者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 学生参保意识还需提高

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保障体系是国家惠及大学生的一项民生工程,社会保障部要求“在校大学生必须全部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保障体系,同时这项工作又必须坚持自愿原则”。而广大学生中不乏经济条件差和自我健康保健意识薄弱者,如果这些人群不积极参保,将直接影响到大学生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也为今后医

^① 见《安徽理工大学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修订)》(校政(2011)65号)文件。

医疗费用的负担埋下隐患。安徽理工大学每年都有近0.5%的大学生不愿意参加医保。

(二) 与新农合医疗保险及商业保险存在冲突

随着医保政策的不断完善,大学生可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及商业保险。但在实施过程中,3种保险存在一定冲突,70%的大学生认为生病后只能在一种医保政策内享受。例如,大学生患病住院,既然出钱购买了保险,理应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及商业保险同时报销,但3种保险在保险材料上都需要原始票据,或者仅报销大学生医保不能报销的部分,且报销周期非常漫长,最终导致大学生难以享受到应有的“实惠”,这无形中挫伤了大学生参保的积极性^[1]。

(三) 学生大病不能及时报销

大学生纳入医保范围对于这个群体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毕竟他们尚未参加工作,生活费用基本依靠父母。特别是一些家庭贫困的农村学生,学费都成问题,如果不幸患了大病,整个家庭都要面临瘫痪状态。大学生大病医保如果不能及时报销,无疑是雪上加霜。

一般来说,大学生医保报销的程序是先看病、后报销,市内住院属于直接医保统筹基金结算。但不少大病还是属于异地住院治疗,治疗存在长期性、反复性,而且费用较高,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就无法先期垫付较高的医药费,只能通过校园募捐、学校和社会资助等方式解决前期看病费用,等看病结束出院后才能进行报销,享受医保待遇。

例如,安徽理工大学2013级学生罗某,该同学于2013年10月5日突发重度心肌炎,导致心功能衰竭和肺部严重缺氧,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治疗半个月,每天花费近万元。该同学自幼母亲去世,父子相依为命,父亲前年做了心脏瓣膜手术,花费十多万元,家里欠了很多外债,难以支付罗某高昂的治疗费用。学生在还未享受医保待遇的情况下,前期要支付近十万元的医疗费用,由于不能及时报销,往往只有通过师生、社会等募捐的形式帮助学生解决了。

三、做好大学生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几点建议

(一) 做好相关政策的宣传,提高参保率

大学生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是一项国家惠民工程,学校应该高度重视大学生医保工作,切实加强对该项工作的领导和督促,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组织机构,专门负责办理和宣传该项工作。以多种途径、多种形式宣传和解读大学生医疗保险工作,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相互协调和配合。通过加强对辅导员的培训,召开年级、班级会议,举办各类

讲座、专题报告以及开设大学生医保专题网站、印制宣传手册、设立医保橱窗、咨询热线等方式,培养辅导员和大学生们的医疗保险意识,促使大学生了解医疗保险政策,熟悉看病和报销流程,提高大学生的参保率。

(二) 进一步完善大学生医保政策

大学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于改善大学生看病难、看病贵以及降低重病、大病风险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运行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政府、高校及社会应继续发挥作用,高度关注大学生医保工作,加强研究,进一步完善医保相关政策和措施,从政策制订、方案措施、运行机制、资金保障、普及宣传、享受待遇、医疗服务、看病报销、社会救助等多方面入手,建立起既有利于大学生看病就医,又有利于缓解学校及社会压力的长效机制,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大学生,促进大学生医疗保险健康发展^[2]。

(三) 建立医保“绿色通道”

大学生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是一项基本医疗保险,它只能解决大多数大学生常见病、多发病,且“封顶线”较低,尤其对少数贫困或患大、重病学生而言,大学生医保不能帮助他们及时解决看病贵的问题,这就需要市医保中心和学校要建立大学生医保的“绿色通道”,对于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而且患重大疾病、需要反复治疗的学生,提供一定额度的看病保障金,以确保学生能够得到及时治疗 and 救助,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四) 将大学生体检纳入医保范围

将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虽为其健康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仍不能忽视对大学生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各高校应引入健康管理机制,对学生的健康进行全面的监测、分析、评估,并提供健康咨询和健康教育指导,对于健康危险因素还需进行全程干预^[3]。将大学生的体检纳入医疗保障的范围,早发现疾病隐患,防患于未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不仅节约了可能消耗的卫生资源,还能为进一步开展健康管理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 [1] 吕春,黄显官.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实践与思考[J].保健医学研究与实践.2012,9(3):67-68.
- [2] 主桂莲,吴小翎.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存在问题与对策——以重庆某大学为例[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1,27(8):586-588.
- [3] 陈君石,黄建始.健康管理概论[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6:35-80.

[责任编辑:吴晓红]

基于制度有效性的高职大学生诚信他律机制构建与实施

刘文明, 何霞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珠宝学院, 广州 511483)

摘要:通过对广州某职业技术学院4500个样本的问卷调查,得出目前高职院校大学生诚信状况总体较好,但也不尽人意的结论,剖析诚信缺失的原因是社会影响和有效性制度的缺失,提出大学生诚信构建需以他律为主,以有效性的他律制度建设为抓手,以社会联合征信系统构建为前提,建立实施系统的信用法律法规、信用评估体系和严格的失信惩戒制度,从而逐步建成诚信的高职校园,培养出优秀的高职大学生。

关键词:高职院校;大学生;诚信;他律机制;有效性制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2-0060-05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duction of honest heteronomy mechanism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systemic validity

LIU Wen - ming, HE Xia

(Jewelry Institute, Guangzhou Panyu Polytechnic, Guangzhou 51148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4500 samples of a vocational college in Guangzhou,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credit status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s fairly good, yet barely satisfactory with the causes of the serious social impact and lack of the validity of the systems.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honesty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depend on heteronomy mechanism and the validity of the systems and be presupposed by the social system construction of joint credit. Moreover, it needs to implement systematic credit laws, evaluations and punishment systems so as to gradually construc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of honesty and cultivate excellent student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llege students; good faith; heteronomy mechanism; valid system

一、高职大学生的诚信状况

以广州某高职院校为样本,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当面访谈法相结合,以发放调查问卷为主,辅以求证式访谈方式,从经济、学习、生活、择业等四个维度合计22个影响因子着手,调查该校大学生整体诚信状况,借此管窥整个高职院校大学生诚信基本情况之全貌。本次合计发放4500份问卷,共回收问卷4221份,回收率为93.8%。预约访谈200人,实际访谈187人,访谈率为93.5%。

调查结果显示,设定的经济诚信的7个考量因

子诚信情况较好,完全诚信平均为65.3%;生活诚信的6个考量因子完全诚信度平均为56.7%;学业诚信的3个考量因子完全诚信度平均为57.7%;择业诚信的两个考量因子完全诚信度平均为78%。4个维度的18个考量因子(4个因子量化考量只能说明态度,故仅用18个)的完全诚信度平均为62.8%。鉴于完全诚信度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最佳状态,表示学生完全诚信,毫无不诚信行为,所以,由此调查数据可见,高职院校大学生完全诚信度较好,超过六成。事实上,我们在调查时选项设计很多,如“有过1-2次不诚信行为”选

收稿日期:2013-05-27

基金项目:番禺职业技术学院项目“高职院校大学生诚信他律机制构建研究”(0614)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文明(1973-),男,安徽寿县人,工程师,研究方向:珠宝首饰工艺,职业技术教育研究。

项,且这个选项有一定的比例。也就是说,如果把这部分同学也算作是比较诚信范畴的画,那么可以

得出结论:高职院校的诚信度接近七成。如表1图1所示。

表1 四维度18个考量因子诚信度调查结果表

考量维度	考量因子	完全诚信度百分比/%	平均诚信度/%	总体诚信度/%
经济诚信	乘车逃票	69	65.3	62.8
	申请填写	61		
	按期交纳学费	79		
	贷款还贷	72		
	获得假钱流通	83		
	获得多找钱款归还	33		
	索要生活费	60		
生活诚信	如实报告健康状况	76	56.7	
	网络诚信	52		
	借物借书	57		
学业诚信	兑现承诺	21	57.7	
	美化家庭条件及学习成绩	64		
	填写奖助学金申请材料	70		
	完成作业(包括参考借鉴)	63		
	完成调查报告(含参考借鉴)	80		
择业诚信	考试作弊或者助人作弊	30	78	
	对待简历	81		
	对待合约(不会毁约)	78		

从表1中也可以看出,大学生学业诚信和生活诚信度不高,择业诚信度最高。根据访谈,这一结论得到确认。主要原因是相比于本科院校学生的生源质量而言,高职院校学生对于学习的热情不够,动力不足,因而学习不是非常主动,因而会出现

作业抄袭、考试作弊等情形。但是对于择业,大多学生已经意识到社会上的企业不看重学生本人提供的证书、简历等,而是更加看重真本领,所以,学生认为无造假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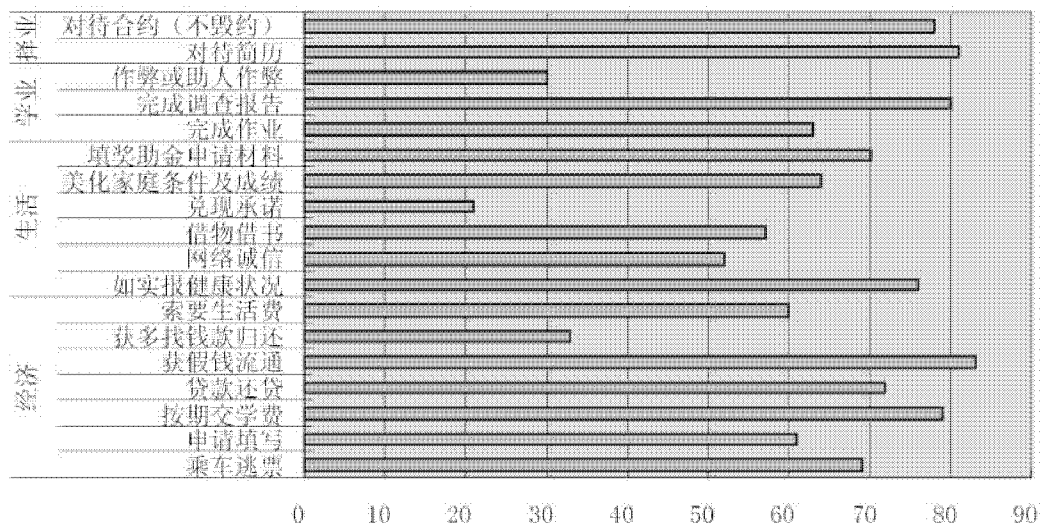


图1 18个考量因子完全诚信度情况直方图

二、高职大学生不诚信原因探析

诚信这种道德品质受到主观和客观的影响。

客观上,社会、家庭、学校各方面都会在学生的诚信品质上打下烙印,大学生的诚信危机,说到底,就是社会诚信危机在校园中的反应和翻版^[1]。在主观上,由于制度有效性的缺失、不足,惩罚机制不健

全,处罚不力,大学生眼见“不诚信”所带来的切身种种既得利益,就会产生“不诚信得利、诚信吃亏”的错觉,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一种“亚文化”,形成“价值观”和“方法论”,指导学生的行动。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社会(包括家庭和学校)的负面影响巨大。“社会是个大染缸”,学校毕竟只是象牙塔。在社会剧烈变迁的当下,各项事业发展迅速,同时竞争空前激烈,利益主体多元化,由于过分强调“金钱”和“效益”,所以见利忘义、不讲信用等诚信失范现象严重,比如:新闻里或者自己的身边到处可见商界的偷税漏税、假冒伪劣,政界的贪污腐败、虚假政绩、尔虞我诈、欺上瞒下,学界的学术造假、成果剽窃,文体界的“潜规则”、“黑哨”,日常生活中的毒大米、鸭肉冒充牛肉等,家庭生活中的配偶之间相互欺骗,学校为了“评估”和获取各种资源利益的造假甚至带着学生造假,这些都会耳濡目染影响到世界观正在形成的高职大学生。而相对于社会来说,高职学生在校时间短,学校诚信教化成果很容易被社会环境影响冲淡、扭曲甚至颠覆,严重扭曲学生的价值观、是非观。这是高职大学生诚信道德缺失的社会根源。

(二)有效性的诚信管理制度严重缺失。制度是秩序形成的基础和约束的主要途径。社会越发展,组织体系越庞大,越是需要靠严格有效的制度管人。从目前国家的层面看,完善的信用评估体系和失信惩罚机制尚未形成,信用的保障和约束体系尚未建立。从高职院校看,当前高校对大学生的诚信表现也缺乏健全的考评体系和机制,大多高职院校未能把学生诚信评价列为重要内容,更没有把评价结果与学生切身利益挂钩。心理契约理论认为,一方面,作为自然属性的人,本性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属性的人又会受到各种各样道德的、法律制度的约束。一旦遇到有效性的诚信他律制度缺失,就会产生投机心理,通过违反诚信道德获取不正当利益。如果失信者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和制度重罚,就会让失信者更加胆大妄为,也会让守信者产生巨大心理落差。其结果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纵容、滋长不诚信行为,形成恶性循环。

三、基于制度有效性的高职大学生诚信他律构建

“人人坚守诚信理念,诚信成为行为自觉”是

高职大学生诚信建设的理想目标。前已述及,有效性制度以及他律机制的缺失是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把加强诚信教育同强化诚信社会管理紧密结合,以同学、家长、学校和社会为他律主体,以教育管理、约束规范、监督举报、舆论谴责、处分处罚为他律手段,学校他律和社会他律相结合的高职大学生诚信他律机制,从而促使高职成为“有信者荣、失信者忧、无信者耻”的信用校园,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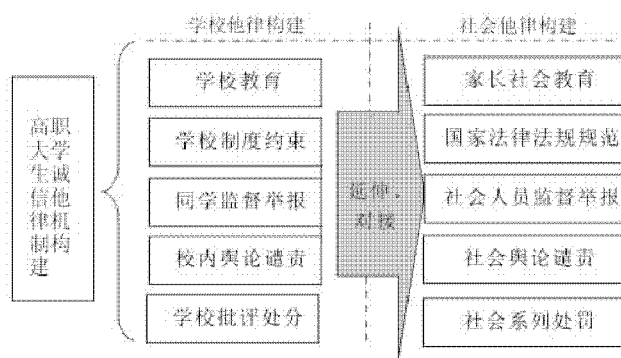


图2 高职大学生诚信他律机制构建示意图

(一)他律机制构建中的制度有效性前提。他律是相对于自律而言的,是指接受他方约束,包括了他人的、外在环境的、社会舆论的、传统习俗的以及刚性的制度措施等方面。他律具有硬性、可见性、可控性、威慑性、可监督性的特征。而自律是自我约束,属于个人内心价值选择,具有弹性、隐性和不可操控性。他律更多强调“必须这样做”、“否则就要受到制裁”。现代法治社会更加强调他律,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趋势。在高职大学生诚信建设这个问题上,同样应该更加强调他律。他律的内容包括教育管理、约束规范、监督举报、舆论谴责、处分处罚等。

制度的有效性建设是他律机制构建的核心是和保障。制度有效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要有严格的制度条文作为切实保障;二是严格地执行制度,发挥制度应有作用。制度有效性就是要求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效的制度是共同遵守的行动准则,会明确提示和指导相关人员能做什么、怎样去做、不能做什么,违者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同时,有效的制度可以随时鞭策和激励相关人员遵守纪律,促使工作程序规范化,岗位责任法规化,管理方法科学化。从管理学角度看,建立规则,科学管理、机制励人是“组织制胜”的最高境界。任何一个组织都要通过制度建设

构筑起按章办事、依法管人的长效机制,这正是体现了有效性制度的科学性、合法性、可行性和稳定性、可控性、威慑性特征。高职院校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也必须从制度有效性着眼,有强有力的制度体系,真正构建起高职院校大学生诚信他律机制,确保高职院校培养的大学生讲诚重信,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 高职大学生诚信他律机制的构建。高职院校大学生诚信他律机制构建是一个动态的任务,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同时也会延伸到家长 and 整个社会。因此,应该从整个社会的诚信建设角度着手,社会、家庭、学校通力合作,统筹设计、规范制度、透明运作、强力监督。

1. 建立完善高职院校参与的社会联合征信系统。目前,我国征信系统建设工作起步较晚,且仅限于涉及信贷和信用卡业务的银行方有诚信记录。这种记录也仅为银行内部所用,不对外提供,不具备兼容性、共享性。为此,必须从国家层面建立完善社会联合征信系统,把高职院校纳入其中。国家征信系统应该由一个专门征信监管机构负责,通过采集整理包括高职院校大学生在内的信用信息,做好信用记录,依法依规向社会提供诚信查询服务,协同高校建立起互通共享的个人信用联合征信服务系统。同时,这一专门机构还应该担负着处理违反诚信的举报、查处工作。高职院校要利用这一完善系统,构建高职学生诚信他律机制,在进行教育、

期间的诚信信息,并向诚信监督管理机构提供,由其录入并按照程序公开,供社会各组织按需查询利用。这个系统中,高职院校接受监管机构指导,为社会组织提供查验,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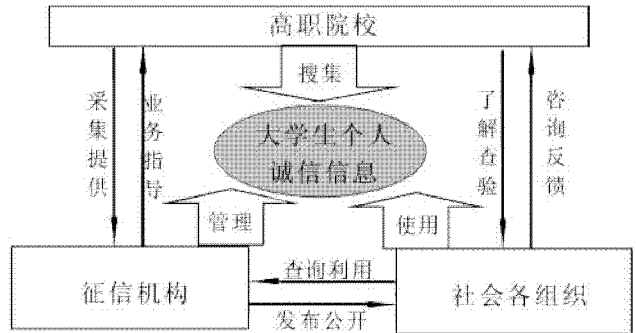


图3 基于高职大学生诚信信息的诚信征信系统构建示意图

2. 设计、制定和严格执行有效性制度。系统的信用法律法规、信用评估体系和严格的失信惩戒制度,是构建“诚信社会”的基石。只有设计和制定规范性的制度,从而建立起由诚信管理系统、诚信评价系统、诚信监督系统组成的诚信监管体系,才能使社会主体诚信状况的评价、奖惩、信息的采集、监督管理使用有法可依。客观地说,我国目前的信用政策法规建设还不完善,存在着诸多的政策法规盲点。国家要加快诚信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把诚信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在此基础上,学校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建立健全诚信管理相关制度,使学校对大学生诚信管理和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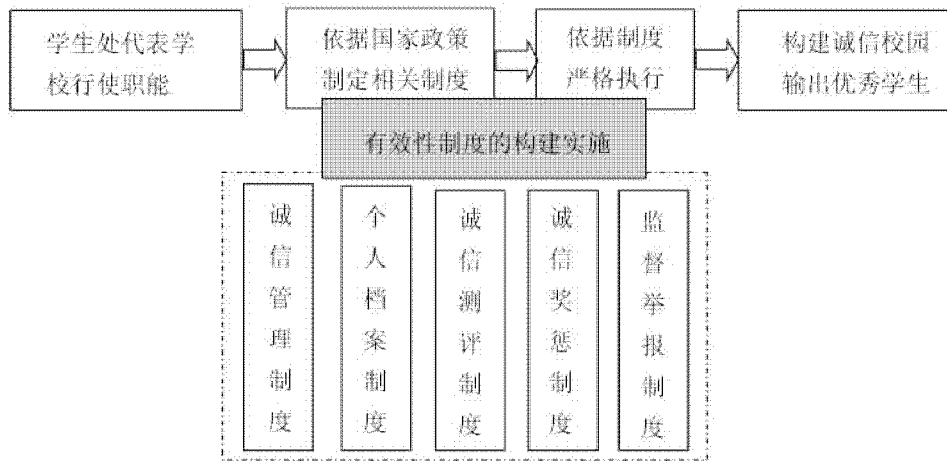


图4 高职大学生诚信他律机制工作状态示意图

(1) 设计制定学校诚信管理总体框架制度。制度是工作的前提。学校要在调研的基础上,精心设计制定明确的校内大学生诚信管理总体制度,这是学校学生诚信管理的重要框架性制度。其中应当明确学校具体的诚信管理机构(一般由学生处负责)、工作框架和工作机制,明确机构的工作职

责、诚信管理的总目标和任务,各院系和协助部门的具体任务等。这个制度其实是一个总体纲领性文件,统筹着学校诚信管理的全部内容。

(2) 建立实施高职学生个人信用档案制度。诚信档案是对个人诚信信息的记录,是评价个人诚信状况的重要依据。高职院校的诚信档案,可由学

生处统一管理,对大学生的诚信表现予以客观、公正、详实的记录。档案跟踪记录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工作、生活涉及的个人资料、学习成绩、信用记录、经济状况、个人意见、学校意见、奖惩等情况。重点内容是信用记录,涉及学习诚信、经济诚信、社会生活诚信等。通过实施档案制度,可为校内各类评先、评优、入党等工作提供诚信依据,也可为将来社会组织的进一步调查提供资料。诚信档案建立后,既要在校内留存,也向社会诚信管理机构提供,此外还要在学生毕业后装入综合档案,转给用人单位,延伸到社会。此时个人诚信档案俨然已经成为如影随形、伴随学生一生的诚信“身份证”^[2]和“通行证”,随时随地彰显着诚信品质,提醒大学生要维护和珍惜自己信用形象,进一步确立诚信意识。

(3) 建立和实施大学生诚信测评制度。诚信测评制度是指在客观详细了解大学生诚信要素的基础上,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办法而评定大学生诚信度的一种制度安排。学校的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各院系按照分类指导原则,结合各院系、专业学生和将来从事职业岗位的不同特点,以国家法律法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校纪班规等为根据,制定与之对应的诚信测评标准。按照标准,采取学生自评、同学互评和老师综评分权重、相结合的科学方法,客观地对大学生考试作弊、不按时还贷、不履行就业合同等具体行为的诚信情况进行定量和定性评价,并进行持续跟踪测评和反馈。诚信测评制度既可以让将诚信度相互进行比较,促使他们在学习、生活、工作等方面更加关注诚信行为,促使他们按照测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日常行为,努力提高自己的诚信度,还可以促使学校根据整体评估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宣传教育活动,增强诚信教育实效。

(4) 建立实施信用奖惩制度。奖惩直接体现着对行为的扬弃,赏罚分明的诚信奖惩制度是他律机制的保障。奖惩制度要在校内和校外双管齐下,延伸沟通,共同作用。奖惩制度要以测评的结果和守信失信的事实为依据,对守信者,可通过设立校园“红名单”的办法,给予在入党、评先评优、申请奖助学金、购买各类保险、信用贷款、评先评优等方面更多便利、优惠。对失信者,除了将其失信行为记录并公布之外,学校和社会组织还要给以极其严厉的惩处,在贷款、评先评优、购买保险、就业、参加公务员等各类考试、职务晋升、出国、参军、考取驾照以及未来走向社会的申办企业、贷款买房、买车等方面予以严厉惩治,甚至列入“黑名单”,实行

“一票否决”(如笔者所在学校规定,考试作弊者一律开除学籍,毫不手软),使其在学校和未来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受到极大的限制,为失信付出巨大代价,甚至无法在社会中生存。这种惩戒目的就是大幅度增加失信风险成本^[3],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将失信者在某处的失信,放大到整个社会,使其“一处失信,处处受制”;二是将失信者在一时一事上的失信,延长为其一个历史记录,使其“一时失信,时时受制”。奖惩制度势必促进“守信处处得利,失信寸步难行”风气的形成。

(5) 建立实施诚信监督举报制度。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实施监督举报制度,就是要建立起诚信情况能及时公开、失信行为能得到及时掌握受罚”的工作机制,促使监督举报工作有章可循^[4]。学校主管部门要依据制度,借助校园广播、宣传栏、网络等校园舆论形式进行诚信情况监督通报,并发动全校、全系、全班同学乃至全社会,都来监督失信行为,切实做到在诚信面前,人人都是透明的。只要失信,就会立即被发现、被检举、被查处、被纠正。这个工作机制要求建立顺畅的检举揭发受理、核实、处理渠道,加强检举揭发人保护。如:学校可开设专门的曝光窗口,以院系为单位或者对外公布任何不诚信学生的名单;各院系还应将失信学生的情况通报其家长,家校互动,加强对失信学生的监督与制约。

高职院校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基地。诚信品质作为职业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高职教育者提出了更高要求。高职院校诚信他律机制建设任务繁重,意义重大。高职教育者应该以他律为本,以有效性的制度建设为抓手,常抓不懈,抓好落实,逐步把高职院校打造成诚信职场人的培养和输送基地,为和谐社会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 [1] 熊平安. 从诚信文化内涵谈大学生诚信制度建设[J]. 学习月报, 2013(5): 56-57.
- [2] 李洪伟, 王炳成, 陶敏. 大学生诚信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J]. 管理评论, 2012(8): 170-176.
- [3] 胡艳香. 解诚信危机重在制度建设[N]. 光明日报 2012-07-21(11).
- [4] 于永成, 于小慧. 大学生诚信的现状与教育对策[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3(1): 85-86.

[责任编辑: 范君 李丽]

英汉化妆品说明书责任型情态的人际意义对比研究

孙启耀, 韩 蕾

(哈尔滨工程大学 外语系,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以中英文较常见且知名品牌的化妆品说明书为语料,运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框架对责任型情态在该类语篇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发现在英文化妆品说明书中责任型情态体现明显,而中文化妆品语料中责任型情态表达形式更多为夸张等。研究表明,针对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消费者而设计的说明书,其商家与消费者分担责任的程度不同。

关键词:责任型情态;化妆品说明书;对比分析

中图分类号:H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2-0065-04

A contrastive study on the interpersonal meanings of deontic modality of English and Chinese cosmetics expositions

SUN Qi - yao, HAN Lei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Halliday's theory of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and famous brand of cosmetics expositions both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s the research data, the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deontic modality in this kind of discourse, and finds that deontic modality is realized distinctly in English cosmetics expositions, while the realization of deontic modality in Chinese is expressed in terms of exaggeration. Moreover,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manufacturer and the consumer share varying responsibilities cosmetics expositions designed in different cultural history backgrounds.

Key words: deontic modality; cosmetics expositions; contrastive study

语言的人际意义元功能意义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输^[1]。国内外的诸多语言学家对人际意义作出了解释。汤普森认为人际意义就是人们运用语言交流时所传递的意义^[2]。韩礼德将情态分为两类:认知型情态(modalization)和责任型情态(modulation)。认知型情态承载信息并暗示说话者对一命题的可能性和通常性的态度,而责任型情态承载意义并指出说话者对一建议的义务和倾向的判断。同时,韩礼德还认为情态的研究离不开量度(value)和向度(orientation)。韩礼德区分了三

种量值:低量值、中量值和高量值,以及两种向度:主观与客观。韩礼德认为,情态是实现语言人际意义的主要手段^[3]。近年来,情态的研究已经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是鲜有学者涉及责任型情态在各种语篇中的人际意义的相关研究。本文以此为研究重点,选取中英文化妆品说明书各30篇,对英汉化妆品说明书中责任型情态的人际意义进行对比分析,从文化差异角度探索导致英汉语言中责任型情态使用不同的根源。

收稿日期:2013-09-20

基金项目: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语用身份构建中责任型情态的人际意义的研究”(13YJA740046);2013年度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语料库的责任型情态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差异研究”(12534039)

作者简介:孙启耀(1957-),男,哈尔滨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功能语言学。

一、英汉化妆品说明书中责任型情态的不同实现形式

(一) 词汇层面表达责任型情态

在现代汉语中,责任型情态有很多种表现形式,例如:情态动词、情态副词、情态助动词等。

1. 情态动词与情态副词。从词汇的层面上,能够表达责任型情态的有情态动词和情态副词,其中,情态动词是最典型的。能够表达责任型情态的情态动词又可以分为两种:单义情态动词(只表达责任型情态),如“必须”、“需要/须要”、“得/可”等;多义情态动词(可表达多种形式的情态),如“能/能够”、“要”等。汉语中的情态副词有很多,例如“恐怕,没准儿,说不定,或许”等等。但是现代汉语的情态副词大部分都是表示认知情态,而表示责任型情态的比较少,只有“千万、无须、务必、务须、勿”等词。

2. 情态助动词。情态助动词是情态意义的主要表达形式,是说话者对他们的语言或其主观猜想的态度。Biber等人把英语情态助动词分为三类:核心情态助动词,如:“can, could, may, might, must, shall, should, will, would”;边缘情态助动词,如:“dare, need, ought to, used to”以及半情态助动词,如:“have to, had better, have got to, be supposed to”^[4]。

责任型情态助动词 must 有一个默认的解释,认为说话者就是责任源。如在“If you're on holiday in France you must visit a Chateau.”中,主语和 must 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而近几十年里,人们对认知型 may 的研究远多于责任型 may。最近的数据表示,责任型 may 是 may 最常见含义。另外,责任型情态动词 may 和责任型情态动词 can 存在着语义区别。may 是用来表示人们对于准予许可的一种许可行为,而 can 是用来表示存在许可。责任型情态动词 will 与第二人称主语连用并且说话者是责任源时,will 才偶尔用于表达责任型情态意义。

责任型情态动词 shall 与第三人称主语连用时,有许多的责任情态用法,最常见的是“制定的/规定的”,经常用于法律公文、条款中。

(二) 句子层面表达责任型情态

除用词汇表达语篇中的情态意义之外,还有很多表达情态意义的方式,例如条件句,祈使句,疑问句和陈述句等。

1. 条件句。Quirk 把 if 条件句分为公开条件

句和虚拟条件句,认为 if 条件句对环境的实际存在表示非确定性^[5]。Palmer 则把条件句分为预言性条件句、含意性条件句和相关性条件句^[6]。许多学者认为许多条件分句所表示的内容不是主句所表示的时态得以发生的条件^[7]。在“If you don't like it, that's your hard luck.”和“If you were really hungry, you wouldn't refuse stale bread.”两个句子中,我们发现,说话者使用 if 条件句则表明他对命题的真实性或者对事件的实在性没有把握,其目的在于缓和它所承担的的义务责任,表示“可能性”的情态意义。

2. 祈使句/疑问句。祈使句是情态系统中的一个独立部分。祈使句与责任型情态存在紧密联系。通常,祈使句被用来表达强制性命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祈使句不仅仅用于命令或指令,也用于表示允许和建议。祈使句和含有责任型情态的情态句都可以表示由某种外部的力量驱动使事情发生,但是作用的方式不一样。例如:他去!他必须去!祈使句直接体现了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说话人说话的时候,被命令的“他”可能是在场的。而情态动词“必须”则是表达说话人的一种态度,说话人认为“他”有必要去。

二、英汉化妆品说明书责任型情态的对比分析

(一) 语料收集

为使研究效度更高、更真实可靠,我们收集了玫琳凯、欧莱雅、羽西、玉兰油、兰蔻、大宝、美加净等国内外知名品牌化妆品中英文说明书各 30 份,对其体现的责任型情态的人际意义进行研究。

(二) 词汇层面的对比分析

1. 情态助动词。从 60 篇语料中,我们找到大量的情态动词,分布如下表 1 所示:

根据表 1 我们发现英汉化妆品说明书中都应用了大量的情态动词,其中,汉语中“能/能够、可/可以”和一直对应的英文中的“can”较其他的词多很多。在不会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化妆品生产商试图运用这样的词汇传递产品信息,并通过介绍产品的功能以使消费者认识到产品的良好效果。例如:

可帮助清除脸部过多的油脂(玫琳凯滋养面膜霜)

...can double as an eye shadow as well (Colour - Zone Double Action Eyebrow Powder)

一个“可”字,一个英文单词 can 的使用,表明该产品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功能,从而使消费者有了希望,同时,化妆品生产商也巧妙避免了承担任何可能的责任。

表1 情态动词比较

量值	汉语		英语		
	情态动词	频率	情态动词	频率	
低	肯定	能/能够	27	can	4
		可/可以	7		
		需要	1		
	否定	不会	1		
中	肯定	有助/有助于	1	will	3
		易于/容易	2		
	否定	避免	1		
		不易/不容易	4		
高	肯定				
	否定	不能	1		
总数			45		7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总结出三点:

(1) 汉语化妆品说明书经常使用“能/能够、可/可以”等词。在所选的汉语语篇中,其出现的次数是45。而在英语语篇中,与之对应的词只出现7次。

(2) 在中英文化化妆品说明书中,低量值情态动词的使用频率较中量值和高量值情态动词的使用频率都要高。对于生产商而言,低量值情态动词的使用使语言更礼貌,更能吸引消费者。

(3) 英语语篇使用一些情态动词代替实义动词,使产品说明更具有真实性。例如:

Illuminate your skin with this revolutionary glycolic peel created to visibly refine the appearance of pores, gently resurface skin texture, and minimize fine lines to uncover improved skin tone and produce exceptional vibrancy.

在实例中,如果 Illuminate 和 refine 一词前使用 can、may 或者 might,对于读者来说,其效果不具有真实性,不会勾起读者购买的欲望,同时,读者也会感觉生产家在逃避责任:如果达不到预期效果,不是我们的责任。

2. 形容词和副词。在所选的语篇中,表达责任型情态意义的形容词和副词极少(见表2)。

表2 形容词和副词比较

副词/形容词		频率
汉语	务必,勿	2
英语	Be likely to	1

根据表2我们发现,英汉化妆品说明书中,表达责任型情态意义的形容词和副词都很少。说明书中的形容词和副词大部分是与描述使用完产品后而带来的好效果的正面词语,如“洁白,细腻,柔软”,“smoothly, flexible, delightful, fresh”。同时,出现的两个词“务必,勿”和“be likely to”则表达了责任情态的义务意义。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载体,化妆品说明书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吸引消费者购买产品,二是最大限度的减少由于消费者不慎使用而造成的相关责任。

3. 历史根源。英汉化妆品说明书有一个共同点:即使用的高量值词汇多于低量值词汇。一些词汇,如“不要”、“切勿”、“务必”暗示着一种“阻止”行为。同时,其前面和后面通常会伴有“以防”、“以免”等字样以及产品带来的不良结果。因此,汉语中这样的高量值责任情态词汇可以使消费者提高警惕,同时,也带来积极效果:如果消费者按正确使用方式使用产品可获得良好效果。类似的高量值责任情态表达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表达方式是不同的,其根源在于,东方受集体主义思想和儒家思想的熏陶,而西方更强调个性化直线型思维。高量值责任型情态表达往往与身份、地位等权势关系因素有关,是出于礼貌或者为了更真实的传递信息。在化妆品说明书中,商家在客观介绍产品的同时,对产品质量和消费者使用安全负责,同时也要极力推销自己的产品。

(三) 句子层面的对比分析。

根据功能语法,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载体,语言具有两大基本功能:提供和需求。在英汉两种语篇中,这种功能体现得很明显。一方面,说明书提供产品的信息。另一方面,吸引消费者购买产品。这两种基本功能与情态系统密切相关,其中包括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条件句等。从传统语法角度,陈述句用以提供信息,疑问句用以对信息的要求,祈使句采取行动,而条件句是限制责任。

1. 条件句。我们发现所选语料中,汉语说明书有4个条件句,而英语说明书只有1个条件句。如:

一经使用,清润水分啫喱就将您的皮肤包容在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当中。(欧莱雅清润水分啫喱)

如配合 NIVEAVISAGE 专业脸部保养系列同时使用,效果更佳。(妮维雅娇柔爽肤水)

常用令肌肤自然润泽、富有弹性,更赋男子汉魅力。(安安芦荟男士洗面奶)

如有不适,请间隔使用。(欧莱雅完美净白洁肤露)

If possible, do the last rinse with cold water to close up the hair scale and leave the hair looking shinier. (Yves Rocher Anti - purifying Shampoo)

从以上两个实例中我们可以发现,说话人使用if条件句表明他对命题的真实性或事件的实在性没有把握,其目的在于缓和他所承担的义务。

2. 祈使句和疑问句。人们普遍认为,只有陈述句可以提供信息,祈使句一般表达强制性“命令”。但在化妆品说明书中不一定如此。事实上,祈使句和疑问句都具有提供信息这一功能。尤其在化妆品说明书中,厂家使用祈使句向消费者发出“警告”、“慎用”等人际意义,意在免除自己的责任。下面这些例子摘自所选语料:

避开眼圈及嘴唇(玫琳凯滋养面膜霜)

请将滋养面膜霜仅做面膜使用(玫琳凯滋养面膜霜)

建议使用佳雪芦荟保湿系列全套产品以获更加效果(佳雪芦荟保湿身体乳)

熊猫眼、眼角细纹、眼袋让你坐立不安,不敢照镜子?(丁家宜全效活力眼霜)

勿饮用!(家美乐玫瑰香醒露)

Use every night after Age Repair Elixir or your favorite ANEW treatment. (AVON Anew Ultimate Age Repair Night Cream)

Apply gently to face and neck, before the Day Fluid, Day Cream or Night Cream - for a significant boost to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duct. (CHANEL Ultra Correction Line Repair Intensive Anti - wrinkle Concentrate)

Apply directly on lips or use with other color lip-balm (Mentholatum LipIce Color Gloss)

Wash sponge often; Allow to dry completely before next use. (CLINIQUE Stay - Matte Sheer Pressed Powder)

Massage over dry face with fingertips. (CLI-

NIQUE Take The Day Off Cleansing Milk)

汉语化妆品说明书所使用的这些字、词,如“避开、请将……、建议使用、勿……”以及英文化妆品说明书所使用的“apply gently …, directly, wash…often, message over…”等用语暗示着提醒和警告,以此限制生产商的责任。同时,也传递着一种信息:正确使用后带来的积极效果。例子中疑问句很少,仅一个,其目的不是为了让谁来回答,而是一种劝说手段,希冀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同时也保留了消费者的面子。

三、结论

本文基于系统功能语法,对英汉化妆品说明书中责任情态的人际意义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发现:词汇层面,情态动词,情态副词和形容词都是实现责任型情态人际意义的手段,表达了禁止和激励的情态意义;句子层面,责任型情态的人际意义可以通过三种形式实现,即条件句、疑问句和祈使句,表达承诺情态意义。因此,我们认为责任型情态不仅有允许和义务含义,同时,在化妆品说明书中,还体现了禁止、激励和承诺三种情态意义。

参考文献:

- [1] 李战子. 话语的人际意义研究[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59.
- [2] Thompson G.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28.
- [3] Halliday M A K.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ition)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179.
- [4] Biber D, S. Johansson, G. Leech, et al.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9:484 - 486.
- [5] Quirk R. et al.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 London: Longman, 1985: 33 - 37.
- [6] Palmer E R. The English Verb [M]. 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78:131 - 143.
- [7] 徐李洁. 论“if”真实条件句的“条件”[J]. 现代外语,2003(4):136.

[责任编辑:吴晓红]

试论作为一种研究思路的结构方程模型

李光泽

(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福州 350007)

摘要: 结构方程模型(SEM)是一种采用验证性研究路径分析某一现象结构理论的统计方法。近年来已逐步运用于外语教育的多个研究领域,但在实际应用中却存在明显误区,即SEM研究的设计方案多数是探索性分析。这既不同于国外学者的验证性研究取向,也违背了SEM重在验证性分析的基本原则。从方法论的高度审视SEM的实质,指出SEM不仅是一种非实验研究范式,更是一种极具价值的研究思路,即先理论后实证具有普适性的研究思路。此外,还从理论的基本特征出发,结合语言研究的具体案例探讨SEM的主要适用情况。

关键词: 结构方程模型; 外语教育研究; 验证性分析; 研究思路; 适用情况

中图分类号: H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 (2014) 02-0069-06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s a research approach

LI Guang - z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is a statistical methodology that takes a confirmatory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a structural theory bearing on some phenomenon. In recent years, SEM has been applied in various areas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but in practice,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scholars took an exploratory approach, rather than the confirmatory one adopted either by the researchers in the West or by SEM itself. Therefore, the present paper examines the nature of S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pointing out that SEM is not only a paradigm for non - experimental research, but also a worthwhile research approach, known as the “theory - then - research” approach. In light of basic theoretical features,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major scenarios using SEM illustrated by case study.

Key word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research; confirmatory analysis; research approach; scenarios using SEM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简称SEM)是一种采用验证性研究路径分析某一现象结构理论的统计方法^[1]。目前,SEM已广泛运用于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研究领域,也逐步运用于外语教育研究^[2]。SEM之所以受到众多研究者的青睐,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跟传统的统计方法相比,结构方程模型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3]。首先,SEM处理

难以直接观测的变量具有独特的优势。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往往会涉及到大量的不可直接观测的变量,如智力倾向、语言能力、学习动机、幸福感等,这些概念大多也没有公认的测量指标和统一工具。这些概念在SEM中即为所谓的“潜在变量”。从这个方面来讲,SEM是可检验潜在变量(latent variable)和观测变量(observed variable)之间关系的唯一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因为传统统计方法只能处

收稿日期:2013-11-10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社科项目“中国学生英语阅读的内在结构研究”(JA10108S)资助

作者简介:李光泽(1975-),男,福建德化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心理语言学、语言学方法论。

理观测变量。其次,SEM采取验证性(假设检验)而非探索性的数据分析路径,相反,传统统计方法,如相关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在性质上属于描述性的。再次,SEM可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而回归分析或路径分析每次却只能计算一个因变量。SEM还容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含有测量误差,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却要假设每个变量没有测量误差。最后,SEM可同时估计分析因子结构(潜变量与观测变量的关系)和因子关系(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估计整个模型的拟合程度以及计算不同模型对同一样本数据的拟合程度。

在国内,SEM在外语教育研究的具体运用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写作研究^[4],随后逐渐扩展到学习动机、语误分析、语言测试、情感因素、外语磨蚀等研究领域。总体而言,10年来外语研究者对SEM的认知和运用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但深入分析现有研究并结合近期的文献综述^[5],不难发现SEM在外语教育研究中的使用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1999年以来的10年间共发表14篇实证研究,可谓凤毛麟角。显然,SEM及其运用还待于进一步推广和普及。二是SEM具体研究方案大多以探索性分析为主,与国外学者用SEM来验证事先假定的理论模型的倾向构成鲜明对照,也违背了SEM重在对事先假定好的理论模型进行验证性分析的基本原则^{[2]84-89}。造成目前外语界SEM运用误区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研究者未能认清和把握SEM的实质,另一方面,可能是外语期刊专门介绍SEM的文章^[6-7]过于重视SEM建模步骤和软件技术操作,未能强调SEM研究所蕴含的理论先行的前提性条件,更疏忽了在SEM模型设定阶段应如何根据理论和前人研究提出理论模型的关键论证,从而未能给研究者以正确的导向。

鉴于此,本文从方法论的高度审视SEM的实质,指出SEM不仅是一种非实验研究范式,更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思路,即先理论后实证的研究思路。此外,还从理论的基本特征出发,结合具体的研究案例探讨SEM的主要适用情况。

一、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质

想要探究SEM的实质,有必要了解SEM研究与分析的基本过程(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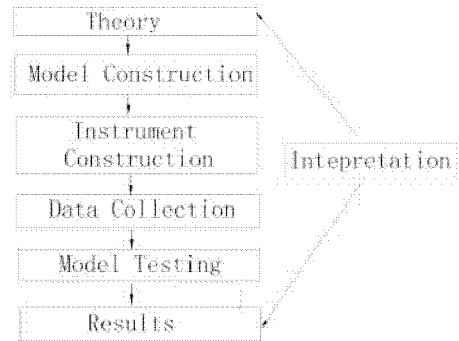


图1 SEM研究步骤与过程^①

从图1可见,SEM研究首先从理论出发,根据理论构建一个或几个模型,然后研制测量构建(constructs)的研究工具并进行数据收据,紧接着使用SEM统计软件(如LISREL, EQS, AMOS)着手模型验证,获得分析结果之后,又重新回到理论背景中加以解释,最终促进了理论发展。显然,从研究过程来看,SEM研究在本质上是理论驱动的,它的过程实际上是检验模型的过程,也就是说,它是对事前假定的模型的检验,而不是作事后的判断。正如SEM研究者所指出的“模型准备阶段是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真正核心价值所在”^{[8]5}。

上述分析与SEM主流研究者所持的SEM属于验证性分析的看法^[1-3]一致。根据研究者对自己所提出模型的信心和把握,SEM通常可分为三类分析:纯粹验证(strictly confirmatory)、选择模型(alternative models)和产生模型(model generating)。纯粹验证是指研究者只提出一个理论模型,然后验证模型与样本数据的拟合度,从而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该模型。这类的分析在实际研究中并不多见。选择模型是指研究者提出多个不同的理论模型,在模型与数据拟合检验中,选取与数据最佳拟合的模型。选择模型分析在研究中比较

^① 大多书籍或文章讨论SEM使用过程时主要侧重模型设定、模型识别、模型估计、模型检验、模型修正等五个步骤的介绍,但本文采用的SEM研究过程示意图却旗帜鲜明把理论作为研究的起点,因而更好地揭示出SEM研究的特性。本文SEM研究过程示意图引自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using AMOS: An Introduction <http://www.utexas.edu/its- archive/rc/tutorials/stat/amos/>。

常见。可能在研究中最常见的 SEM 分析是产生模型,研究者首先提出一个或几个理论模型,检验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然后根据理论和相关研究分析模型中拟合欠佳的部分,不断修改模型,直至产生一个最佳模型。由此可见,尽管产生模型的分析具有探索性成分,但 SEM 的三类分析都应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

SEM 理论驱动或模型检验的特点与常见的实验研究范式又有何异同呢?一般认为,实验研究的基本过程是提出假设和检验假设^[9],具体包括:(1)根据现有的文献(理论模式和实证研究)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以及具体研究假设;(2)实施实验方案,涉及调查方案、调查工具和调查步骤(受试的抽样与分配和无关变量的控制);(3)进行统计分析;(4)得出实验结果,并解释实验结果。显而易见,SEM 研究与实验研究具有高度一致的理论旨趣和研究思路,即由理论驱动,旨在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主要差别在于,实验研究注重严格实验控制,如样本的抽样和无关变量的控制,而 SEM 则是一种非实验方法,用于解决一些难以用实验方法解决的问题,尤其是那些不具备检验理论方法或者出于伦理考虑实验设计缺乏可行性的研究问题^[1,10]。可见,SEM 研究和实验研究范式具有互补性,分别适用于非控制条件和控制条件的研究环境。

从上文讨论的 SEM 研究过程、分析类型以及与实验研究范式的异同来看,SEM 绝不仅仅是一种多元统计方法,更是一种极具价值的研究思路。Ellis《第二语言习得研究》^[11]一书总结区分了二语习得理论建构的两种方法:先实证后理论的研究方法(the “research - then - theory” approach)和先理论后实证的研究方法(the “theory - then - research” approach)。其中,先理论后实证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先提出明确的、具有因果关系的理论,并根据理论形成可验证的预测,然后开展实证研究加以检验。如果预测未被证实,那么就修改理论,提出新的预测(或者一并放弃理论),如果研究发现证实了预测,那么就验证一个新的预测。很显然,上文描述的 SEM 研究过程和分析类型正好反映了先理论后实证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换句话说,SEM 研究是建构理论、修正理论和发展理论的重要途径。不仅如此,SEM 研究思路还与当代语言学理论的探索模式,即“假设→推衍→预测→观察→新假设→新推衍→新预测→新观察”^[12],如出

一辙,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个模式中,“假设→预测”与“观察”分别属于理论预测阶段和实证检验阶段,而且二者构成一个研究环,与 SEM 研究过程高度相似。简言之,SEM 是一种非实验研究范式,体现了先理论后实证具有普适性的研究思路。

二、结构方程模型的主要适用情况

既然 SEM 是先理论后实证的非实验研究范式,那么它主要适用于何种情形?这个问题在以往介绍 SEM 的文章^[6-7]中很少提及,因而很有必要加以讨论。SEM 研究是理论驱动的,这就意味着 SEM 的具体使用情形与理论的基本特征息息相关。什么是理论呢?根据 Kerlinger & Lee 的定义^[13],理论是“一组相互联系的概念、定义和命题,通过明示变量之间的关系系统提出对相关现象的观点,其目的在于解释和预测现象”。这一定义表明,理论是由一组定义明确而且相互关联的概念构成的,理论还明确阐述了这些变量(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一个好的理论必须是可验证的,可验证性是理论具备科学性的基本条件之一,因为只有能够被验证的理论才能修正其中的错误,使其得以更好解释和预测现象^[8,15-9]。

因此,SEM 至少在两个方面大有可为:一是概念结构验证(验证性因子分析),用于验证概念的属性特征,特别是那些难以用单一任务测量的概念,如语言水平、跨文化交际能力等。具体而言,就是检验潜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有效;二是关系结构验证(结构方程模型),用于验证研究中所涉及的概念(变量)之间的关系,如语言水平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呈单向还是双向关系。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一些调节变量(如性别)可能对模型整体产生影响^[14],也就是说,有时研究者还应检验理论上设定的模型是否适用于不同的样本,如不同区域、不同调查时间、不同性别。这就是 SEM 多组分析^[15]。

以下,笔者结合自身的研究案例^[16]就 SEM 的两种基本适用情况分别给以讨论和分析。本研究以 346 名小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语音意识的实质及其在汉语阅读中的作用路径。语音意识(phonological awareness)是心理语言学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研究表明语音意识对儿童早期阅读发展(词汇阅读)起到关键作用,语音意识与阅读的关系还表现出跨语言的一致性 or 普遍性。但语音意识的内在本质特征及作用机制有待于研究。本研

究以词汇阅读过程和词汇表征的理论视角为切入点,详细分析语音意识的内在特征及其对阅读的作用路径。理论分析结果表明,语音意识在本质上反映了语音表征质量,具体包括特定单词语音表征和形音对应语音表征两大特征,两大特征在阅读时独立发挥作用。

这样,本研究就有了2个研究目标:(1)验证语音意识双特征模型是否成立(见图2);(2)验证语音意识两大特征能否独立作用于阅读(见图3)。根据研究目标以及SEM要求每个潜变量至少由两个以上的观测任务来测量的研究前提,本研究的语音意识任务包含声母判断任务和韵母判断任务,而且均采用听觉和视觉两种测量方案。听觉的声母-韵母意识两个任务用于测量语音意识的特定单词语音表征,而视觉的声母-韵母意识两个任务测量形音对应语音表征。阅读能力主要考察词汇加工效率,具体任务是反义词判断和句子命题判断。

在数据收集之后,运用AMOS 5.0统计软件对上述研究目标分别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关注的拟合指标有:卡方值(X^2)、自由度(DF)、卡方值与自由度之比(X^2/DF)、拟合优度指

数(GFI)、规范拟合指数(NFI)、比较拟合指数(CFI)以及平方根残差值(RMSEA)。此外,在SEM模型建构图中(图2、图3),椭圆形表示潜在变量,矩形表示观测变量,圆形则表示测量误差。单箭头表示预测与被预测的关系,而双箭头表示相关关系。

(一)概念结构模型验证

为了检验语音意识两大特征模型是否成立,本研究分别构建了单特征模型和双特征模型(图2)加以对比验证。单特征模型是指四个语音实验任务依附于单一因子,与双特征模型形成对照。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见表1。一般认为, X^2/DF 值介于1到3(越小越好),拟合优度指数(GFI)、比较拟合指数(CFI)、规范拟合指数(NFI)等拟合指数应在0.90以上(越近于1越好),平方根残差值(RMSEA)小于0.08(越小越好),可以较好地拟合数据,验证模型。从表1的拟合情况来看,研究数据明显拒绝单特征模型,而支持了双特征模型,从而证实本研究理论分析提出的语音意识本质特征具有心理现实性。

表1 研究数据与语音意识特征模型的拟合情况

模型	χ^2	P	DF	χ^2/DF	GFI	NFI	CFI	RMSEA
单特征模型	46.873	0.000	2	23.436	0.934	0.909	0.912	0.225
双特征模型	2.509	0.113	1	2.509	0.996	0.995	0.997	0.0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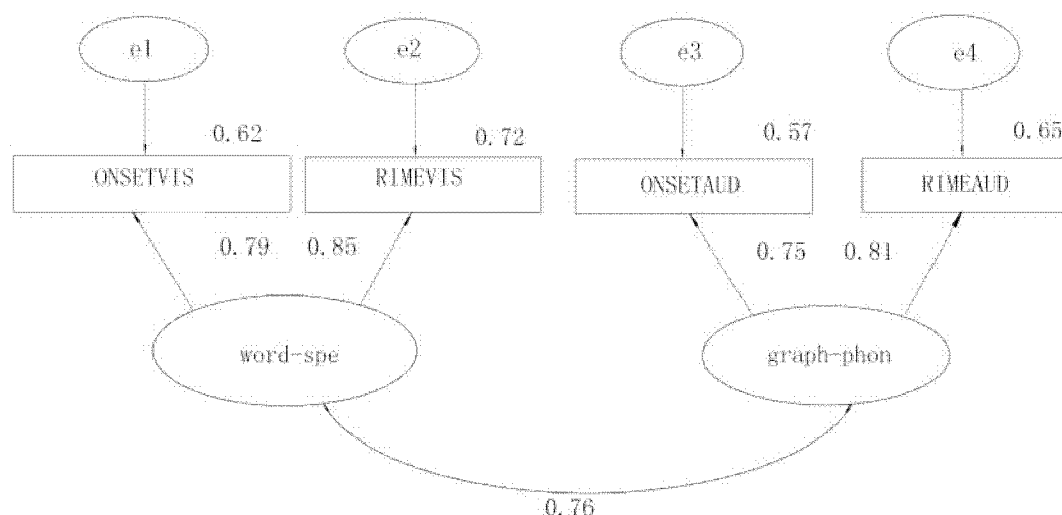


图2 语音意识双特征模型

注:ONSETVIS和RIMEVIS分别指视觉的声母和韵母判断任务,ONSETAUD和RIMEAUD分别指听觉的声母和韵母判断任务,word-spe和graph-phon分别指特定单词语音表征和形音对应语音表征。

(二)关系结构模型验证

语音意识两大特征能否独立作用于阅读是另

一个需要验证的问题。为此,本研究建构了3个结构方程模型:独立作用模型(图3)、特定单词语音

表征间接作用模型、形音对应语音表征间接作用模型。独立作用模型是指语音意识两大本质特征都直接作用于阅读。特定单词语音表征间接作用模型是指形音对应语音表征直接作用于阅读,而特定单词语音表征通过形音对应语音表征间接作用于阅读。形音对应语音表征间接作用模型是指形音对应语音表征通过特定单词语音表征间接作用于

阅读。表 2 的拟合数据分析表明,独立作用模型与研究数据构成最佳拟合,进一步从语音意识的作用机制角度证实了语音意识两大本质特征构成的适恰性。图 3 进一步显示,特定单词语音表征与形音对应语音表征对阅读的直接影响系数分别为 0.37 ($P=0.002 < 0.01$) 和 0.38 ($P=0.002 < 0.01$),两个因素共解释阅读 50% 的变异。

表 2 研究数据与语音意识作用模型的拟合情况

模型	χ^2	P	DF	χ^2/DF	GFI	NFI	CFI	RMSEA
独立作用模型	11.715	0.069	6	1.953	0.989	0.985	0.993	0.053
间接作用模型 1	20.167	0.005	7	2.881	0.981	0.974	0.983	0.074
间接作用模型 2	21.197	0.003	7	3.028	0.981	0.973	0.982	0.0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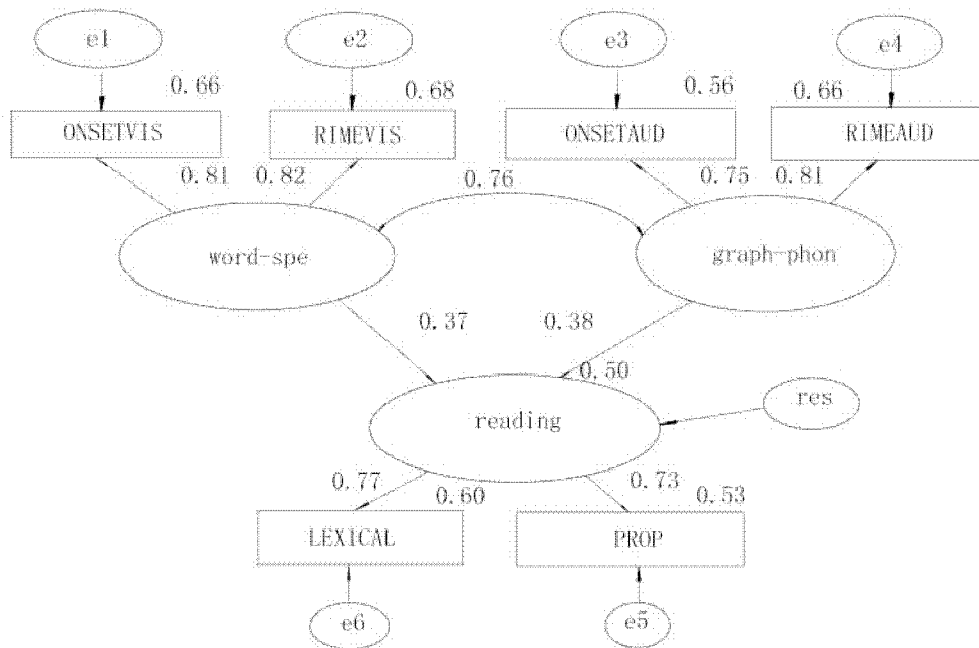


图 3 独立作用模型

注: ONSETVIS 和 RIMEVIS 分别指视觉的声母和韵母判断任务, ONSETAUD 和 RIMEAUD 分别指听觉的声母和韵母判断任务, word - spe 和 graph - phon 分别指特定单词语音表征和形音对应语音表征, LEXICAL 和 PROP 分别指词汇判断和命题判断。

总之,本研究遵循 SEM 先理论后实证的研究思路,首先通过理论分析提出语音意识具有两大本质特征,且两大特征独立作用于阅读过程的构想,然后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加以检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理论模型与研究数据拟合比较理想,从而证实了本研究有关语音意识本质特征的论断,其结果深化了对语音意识的本质认识。

三、结语

从以上有关 SEM 的研究过程、研究思路、适用情况以及具体实例的分析,可以得出: (1) SEM 比起传统的统计方法具有多个方面的独特优势,首先体现在处理难以直接测量的变量; (2) SEM 研究在

本质上是理论驱动的,其过程是检验模型的过程; (3) 作为一种非实验的研究范式,SEM 研究凸显了先理论后实证的研究思路; (4) SEM 的适用情况与理论的基本特征有关,主要用于概念结构验证和关系结构验证。

由 SEM 的上述特点可以预见,SEM 在外语教育研究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原因有二:一方面,外语学习不仅涉及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的中介语系统,还受到智力、年龄、性别、学能、动机、策略、风格等学习者内部因素以及包括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学校环境、课堂环境和教学方法的学习者外部因素的影响^[17]。这就意味着外语教育研究必然要考察这些因素和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及其对

外语学习者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众多的 SEM 统计软件中,AMOS 简单易学,无需计算机编程,通过菜单式操作就可完成模型验证的全过程^[8],这有助于外语研究者的掌握和运用。

参考文献:

- [1] Byrne B 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AMOS: Basic Concepts, Applications, and Programming [M].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10: 3 - 4.
- [2] 许宏晨. 结构方程模型在国内外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09 (1): 84 - 89.
- [3] 侯杰泰, 温忠麟, 成子娟. 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15.
- [4] 马广惠, 文秋芳. 大学生英语写作的影响因素研究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9 (4): 34 - 39.
- [5] 李久亮. 国内应用语言学界结构方程模型应用研究回顾 [J]. 战略决策研究, 2011 (1): 91 - 96.
- [6] 王立非, 鲍贵. 应用语言学研究的路径分析方法 [J]. 现代外语, 2003 (4): 404 - 409.
- [7] 雷蕾. 结构方程模型及 AMOS 软件在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应用 [J]. 中国外语, 2009 (1): 39 - 44.
- [8] 林嵩. 结构方程模型原理及 AMOS 应用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5 - 9.
- [9] 吴旭东, 张文忠. 我国外语教学实验研究质量调查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 (1): 35 - 44.
- [10] 龙立荣. 结构方程模型: 心理学方法变革的逻辑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1 (5): 26 - 30.
- [11] Ellis R.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677.
- [12] 冯胜利. 从人本到逻辑的学术转型 [J]. 社会科学论坛, 2003 (1): 7 - 27.
- [13] Kerlinger F & H, Lee. Foundations of Behavioral Research (4th edition) [M]. Orlando: Harcourt College Publishers, 2000: 11.
- [14] 温忠麟, 侯杰泰, 张雷. 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运用 [J]. 心理学报, 2005 (2): 268 - 274.
- [15] 许宏晨. 结构方程模型多组分析在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运用 [J]. 中国外语教育, 2010 (1): 59 - 67.
- [16] 李光泽, 李荣宝. 语音意识的实质及其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4): 87 - 94.
- [17] 文秋芳, 王立非. 二语习得研究方法 35 年: 回顾与思考 [J]. 外国语, 2004 (4): 18 - 25.
- [18] 吴延兵. R&D 存量、知识函数与生产效率 [J]. 经济学(季刊), 2006, 5 (4): 1129 - 1156.
- [19] 柳卸林, 陈璐. 我国工业的 R&D 与创新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1995 (12): 55 - 62.
- [20] Liu X H, Buck 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Channels for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pillovers: Evidence from Chinese High - tech Industries [J]. Research Policy, 2007, 36 (3): 355 - 366.
- [21] Furman JL, Porter ME, Stern S. The determinants of national innovative capacity [J]. Research Policy, 2002, 31 (6): 899.
- [22] 魏权龄. 评价相对有效性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 - DEA 和网络 DEA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5 - 56.
- [23] 汪克亮, 杨宝臣, 杨力. 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与能源技术的区域差异 [J]. 科研管理, 2012, 32 (5): 56 - 63.
- [24] Hu J. L., Wang S. C. Total -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of regions in China [J]. Energy Policy, 2006, 34 (17): 3 206 - 3 217.

[责任编辑: 吴晓红]

[责任编辑: 范 君]

(上接第 28 页)

- [10] 李婧, 谭清美, 白俊红. 中国区域创新生产的空间计量分析 - 基于静态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J]. 管理世界, 2010 (7): 43 - 55.
- [11] Zhang Anming, Zhang Yimin, Zhao Ronald. A Study of the R&D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of Chinese Firms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3, 31 (3): 444 - 464.
- [12] 吴延兵. 用 DEA 方法评测知识生产中的技术创新效率与技术进步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 (7): 67 - 79.
- [13] 项本武. 中国工业行业技术创新效率研究 [J]. 科研管理, 2011, 32 (1): 10 - 14.
- [14] 官建成, 马宁. DEA 控制投影模型及其应用 [J]. 中国管理科学, 2003 (1): 66 - 70.
- [15] 官建成, 陈凯华. 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测定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9 (10): 19 - 32.
- [16] Caves, et al. Multilateral comparisons of output, input and productivity using superlative index numbers [J]. Economic Journal, 1982 (86): 72 - 73.
- [17] Fare R, et al. Production frontier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委婉语的生态语言学解读

姚吉刚

(安徽建筑大学 外语系, 合肥 230061)

摘要: 世界上存在着类似生物群落一样的语言群落, 每个语言群落中包括许多语言个体及其变异形式, 每种语言个体或其变异形式又包括各种各样的语言形式, 委婉语就是一种具有避讳、掩饰、礼貌等诸多语用功能的间接语言形式。与生物物种的发展进化一样, 委婉语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遵循生态学规律: 委婉语间相互竞争, 竞争的结果不仅使弱势委婉语走向衰落与消亡, 同时也促进了现存委婉语“生态特征”的多样化, 委婉语的产生、多样性特点、再委婉现象、语码转换机制、创新, 都是与其赖以生存的整个语言生态系统协同进化的结果, 其存在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关键词: 委婉语; 生态学; 生态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 H0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 (2014) 02-0075-05

Interpretation of euphem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 - linguistics

YAO Ji - ga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 Hefei 230061, China)

Abstract: Similar to biological communities, there are many language communities in the world. Each language community includes many languages and their variants, which also include various forms of language, among which euphemism is a kind of indirect language form possessing many pragmatic functions such as avoiding taboo, politeness and hiding. Identical to the evolution of biological species, euphemism also follows ecological laws in its development, as it competes with each other, not only resulting in the weak euphemism to weaken and die out but also promot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existing ecology of euphemism. The emergence, diversity, re - euphemisization, code - switch mechanism and innovation of euphemism are the result of the co - evolution of euphemism and the whole language ecosystem on which it depends, indicating that the existence of euphemism follows the basic law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 euphemism; ecology; eco - linguistics

ecology (生态学) 一词源于希腊语 oikologos, 由 oikos 和 logos 两词根演化而来, oikos 是“栖息地”或“住所”之意, logos 代表学问, 因此, 通过词源可以得知,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栖息地或住所”的科学。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 (Haeckel) 1866 年首次提出该词, 他将生态学定义为: 研究动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尤其是动物与其他生物之间的生存利害关系^[1]。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语言是人际交流的一种最重要方式, 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语言生态”系指语言与所在社会、文化、族群、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生

存发展状态, 类似于自然界中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生态^[2]。生物群落的丰富多彩性对照于世界上语言群落的千姿百态, 每个语言群落中包括许多语言个体及其变异形式, 每种语言个体或其变异形式又包括各式各样的语言形式, 委婉语就是其中一种具有避讳、掩饰、礼貌等诸多语用功能的间接语言形式。作为一种间接言语行为的委婉语普遍的存在于各种语言中, 它不仅能够协调人际关系、维持正常交往, 还能顺应自然环境、社会关系及人们的心理感受。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研究, 但大多停留在静态和微观的层面上, 较少有人对其

动态性进行探讨和研究,也很少有人从宏观层面来分析它。本文试图运用生态学和语言生态学的理论,从动态的角度和宏观的层面上来探究委婉语,旨在抛砖引玉,为委婉语的生态发展和研究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一、生态语言学

生态语言学(ecology of language)或语言生态学(ecology of language),是一门由生态学这门自然科学和语言学、语文学、哲学等人文科学互相交融而形成的交叉性学科。简单来讲,生态语言学就是一门由生态学和语言学相互糅合而形成的新兴交叉学科。《英汉语言学词典》将它定义为: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人种语言学等学科领域中对语言和环境,即使用它的社团之间的互相作用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3]。生态语言学重点研究语言是如何改善生态环境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生态语言学家使用生态系统来隐喻映射语言系统,并借助生态学里的概念对语言作出分析,在语言和言语两个层面上对语言的非生态使用和语言系统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现象进行批评分析,并探讨语言和生物物种各种特性之间的联系。

李国正将语言生态分为外生态环境系统和内生态环境系统,前者指自然、社会、文化及人群系统,后者指任何特定语言单位与其它单位的关系及语言单位内部之间的关系^[4]。从生态学的原理来说,语言领域中的各个层面有着大小不一的生态系统。委婉语作为一种间接语言形式也有其自身的生态系统。当然,委婉语言生态有其特殊性,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不完全对照于自然生态,而是一种人为构建的生态,但它也是由许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因素构成的有机的生态整体,也有其完整的生态系统性,属于生态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系统。

二、委婉语的生态语言学解读

(一) 语言生态环境的恶化与委婉语的产生

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在语言上有所反映,因为语言是社会过程的晴雨表。社会语言学视域下的语言和社会是共变的,而生态语言学理念中的语言与语言所处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也是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语言环境包括语言生存和运作的环境及个人和社会生存的语言环境,后者即指影响语言运作和发展的语言外因素和条件的总和。自语言诞生以来,它的生存、发展环境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不景气、生活水平下降、政治体制改革不利导致人们对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体制日益不满,各种言语中大量充斥着粗俗、贬义的修辞低品位现象,攻击性、侮辱性言语肆意泛滥,极大地污染了语言环境;社会禁忌各方面的解绑和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使得各种不健康信息充斥媒体,许多非标准语、粗俗语、骂语也频频出现在影视作品中,

大大削弱了大众传媒语言的纯洁性和健康性,良好和积极的示范作用消失殆尽;经济不景气、教育不均衡、经费不充足、收入不可观等因素导致优秀的教育人才严重流失,直接影响到了孩童和年轻人的语言水平及文化修养,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语言修养也在逐步下降,所以日常交际中就出现了大量的俚俗语和粗脏话。语言生存发展环境的剧变,为语言的粗俗化和去纯洁化提供了土壤和养分,粗俗语和骂语就有了栖息的温床。

语言的粗俗化腐蚀了语言原有的健康“肌体”,淡化了人们的规范语意识,污染了社会的言语环境,破坏了语言生态系统的平衡及个人和群体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我们应坚决抵制语言中的言语粗俗化倾向,自觉提高自己的语言修养意识,保护和优化语言生态系统,维护语言中彼此关联的各种生态链,以实现语言生态的和谐发展和整个人类社会的稳定、发展、和谐。自然界中的各种污染和辐射都有一定的极限,超越这个极限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破坏。语言中的各种破坏意义、粗俗意义、低品位修辞和不规范语法现象也有一定的极限,超过该极限,语言既不是人类思维的工具,也不是最重要的交际手段,更谈不上是文学的首要因素了。和自然环境的保护一样,文化环境的保护也很重要,在当今世界,语言学领域最重要的生态问题就是语言纯洁性问题。时代在前进,语言却日趋粗俗,其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不断扩大,珍惜语言、保护语言迫在眉睫,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来研究语言粗俗化的原因、解决措施及实现语言生态系统平衡的途径具有重大意义,必将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重视。

从历史上来看,粗俗语泛滥的时期往往是社会急剧动荡变化和民心不稳的时期,此时语言生态环境会快速极度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委婉语应运而生,减轻了粗俗语的影响力和破坏力,很好的维持了语言生态环境的平衡。作为一种修辞手段的委婉语广泛的运用于人类的语言交际中,委婉现象也普遍存在于世界各文化之中,适用于社会各个领域和阶层。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它间接、含蓄地把人们通常害怕、厌恶、反感、不愿接触的东西或一些令人丢面子、尴尬难堪的事情用一种可以接受的语言表达出来,以谋求达到理想、文明交际效果之目的。委婉语的雏形同原始部落的迷信和图腾不无关联。那时的科学技术很不发达,人们觉得大自然强大无比,自身极为渺小,为了得到庇护,就对神灵等虚无之物顶礼膜拜,从不直呼其名,生怕亵渎了它们,因而就产生了委婉的称呼,以表崇拜虔诚之意。后来,人们又害怕妖魔鬼怪,为了避讳和驱邪,又创造了一些委婉语。但是,委婉语的盛行时期却是社会相对稳定和经济较快发展的近现代时期,出于巩固统治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上层社会往往会限制粗俗和激进的言语,提倡使用文明的委婉语来扼制

反叛的力量。一个人出身的贵贱和地位的尊卑通常直接反映在他的言辞上,所以上层社会崇尚和实践温婉的措辞论调,认为直露的语言是无教养和粗鲁的表现,于是委婉之风引得人们纷纷效仿。目前,直言不讳在当代语言的表述风格中稍占上风,但随着人们道德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尊重人性的要求会日趋强烈,所以语言的文明还是必不可少的,委婉语也就有了在很多领域里继续存在的理由,可以继续担当人际交往中不可缺少的“润滑剂”。但委婉语要想维持语言生态环境的平衡就必须在语言交际中不断扩大其影响力,这样才能在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将它的潜能发挥到极致。

(二) 生物物种多样性与委婉语的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系指地球上涵盖陆地、海洋、大气生态系统中所有生物以及它们所包含的基因和它们所构成的生态系统的丰富性、多样化、变异性和复杂性的总称^[5]。生态学家们认为,多样性是地球上生物的基本特征之一,人类只有保护我们周围的动植物,才能和周围的生物圈和平共处。生物多样性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一笔巨大的财富和资源,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类似于自然界生物的进化,语言的进化也是通过自然选择而存在发展的。文化生态范畴内语言的主要功能是交流工具,但它也具有许多其它的亚交流功能,它既标志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在,又形成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根基^[6]。生物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都是生命系统多样性的体现,多样性的语言不仅能够表述人类丰富多彩的知识,还会提高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人类生命的基本链条是“环境——知识——语言”,该链条上的三要素互为依存,密不可分。美国康涅狄克大学的科学家对全球数百个生态区的生物生态状况、土著族群和传统民族的语言状况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生物多样性程度与语言多样化程度成正比例关系,生物多样性程度越高,语言多样化程度也就越高,反之亦然。例如,世界第三大岛太平洋的加里曼丹岛(旧称婆罗洲岛)上物种极为丰富,那里居住着40多个土著民族和族群,他们使用的语言就有100多种。非洲热带雨林里的生物物种多样性、居民语言多样性及族群文化多样性也与热带雨林的雨季分布明显相关。可见,多样化的生态造成了多样化的人类种群,从而直接促成了多样性的文化^[7]。语言是人类进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本质上也是生物多样化的结果,两者之间关系极为密切,并且丰富多彩的语言能够体现和描绘出生物物种和生态的多样性,减少语言的多样性势必会缩小人类可利用的知识库,从而造成无法预料的损失。

委婉语作为一种间接语言形式有其自身的语言生态系统,在该系统中委婉语也具有多样性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委婉语构造手段的多样性、分类标

准的多样性及功能的多样性上(限于篇幅和从宏观上考虑,下文就不一一详细举例了)。委婉语构造手段主要包括语音手段、词汇语义手段和语法手段三类^[8]。语音手段包括语音畸变法、重读音节转移法、声调改变法等;词汇语义手段包括模糊词语法、概念隐喻法、概念转喻法、低调陈述法、迂回表达法、语义扬升法、同义借词法、反义词语法、指示语义变异法等;语法包括句法和词法,委婉语构成的句法手段包括疑问、否定、虚拟等几种,委婉语的词法构成手段主要出现在像英语这样的拼音文字中,包括缩短法、掉尾法、首字母缩略法、逆构法等。委婉语常用的分类标准是规约化程度标准、构成手段标准、语用功能标准、婉指对象标准^[9]。按照规约化程度标准,委婉语被分为规约化委婉语和非规约化委婉语;按照构成手段标准,委婉语被分为语音类委婉语、词汇语义类委婉语、语法类委婉语等;按照语用功能标准,委婉语被分为利他型委婉语、泛利型委婉语和利己型委婉语三大类;委婉语还可以按照其婉指对象被分类,即婉指的事物被用来作为其委婉语的类型名称,如“死亡委婉语”、“排泄委婉语”、“身体部位委婉语”等,委婉语词典的内容一般按照这种分类标准编排。委婉语功能的多样性是指委婉语具有含蓄、间接、避讳、礼貌、掩饰、幽默、诙谐等交际功能。由此可见,委婉语的多样性特征和生物物种的多样性特征一样,都是维系各自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因素。

(三) “物尽天择,适者生存”规律与委婉语的再委婉现象

1882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物种进化规律,该规律一经提出便成为了现代生态学的一条基本规律。与生态系统中的豺狼虎豹等食肉动物一样,世界语言生态系统中的汉、英、法及西班牙语等共核语言由于其“物种属性”及使用者众多等因素而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支配力较强,在竞争中是强者;而类似于生态系统中大多数植物的印度英语、南非英语、中国英语及新加坡英语等英语变体则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支配力较弱,是竞争中的弱者。与共核英语相比,中国英语目前还不能被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所广泛接受,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发展规律告诉我们,所有的物种都有其存在的原因,即存在即必然,中国英语也不例外。一般情况下,生态系统中支配力较弱的物种只能作为支配力较强物种的食物,但在相生相克的漫长进化过程中,弱势物种的生命力也会变得非常强大。因此我们坚信,在世界全球化的带动下,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世界影响力日益扩大的背景下,作为世界语言变体中重要一员的中国英语必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格雷欣于1559年提出了格雷欣法则,即良币和劣币一起流通时,良币功能将转化为收藏而退出流通领域,久而久之,良币

将被驱逐,市场上流通的就只有劣币了。后来人们用这一法则来泛指价值不高的东西会把价值较高的东西挤出流通领域。如果用这一法则来解释委婉语现象,那么某个词的“好的”含义实际上会逐渐演变为“良币”,并退出“流通领域”,不再被人们使用。例如,“gay”(高兴的)因为还有“同性恋”的委婉意义就已经不用作“高兴”了;汉语中的“小姐”(新中国解放至上世纪90年代初对女性的尊称)因为还有“妓女”的委婉意义就已经不再是对女性的尊称了,网络和报纸上经常报道一些人因称呼某某女性为“小姐”而被骂或被打的事件。当人们对某个委婉语的心理距离消失后,必定会出现新的委婉语来替代它,这就是委婉语的再委婉现象,汉语中有关妓女的委婉语的历史演变可以很好的印证这一点:青楼女子——风尘女子——窑姐——鸡——失足女青年——出来卖的——性工作者——小姐——女技师——技师——特服人员。这些词语的委婉程度递增,分别在不同时代婉指妓女,但时下只有“小姐”、“女技师”、“特服人员”还可以算是常用的委婉语,其他几个委婉色彩逐渐减弱,已不常用了,这是有关妓女的委婉语在委婉语这一微生态系统中优胜劣汰的结果。由此可见,委婉语的再委婉机制和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物尽天择,适者生存”规律如出一辙。

(四) 各物种的互利共生与语码转换型委婉语

生态学上的互利共生关系指生物群落中特定物种之间存在的一种互惠互利、相互影响的生存依赖关系。这样的关系也同样存在于语言群落中的共核语言与语言变体之间,有时也会不同程度地发生在各语言变体之间。例如,语言变体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共核语言所提供的必要的组成成分,即语言变体中的共同部分;而语言变体又会在有效承载异质文化、扩大使用范围方面给予共核语言以极大的推力。共同发展的共核语言和语言变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使得语言中的边缘成分在语言共同体中所占的比例和所起的作用逐步缩小,而语言中的共核成分涵盖的范围和起到的作用却逐步扩大,这被称作“语言边缘化过程”。Mufwene也曾将语言比作拉马克物种(Lamarckian species)和寄生物种(parasitic species)。他指出:“类似于生物物种的生命力,语言生命力是语言存在的主要标志。但是,不同语言的不同生命力的体现取决于语言使用者、社会和文化等因素。不同语言及其变体在同一群落中的相互依赖性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语言之间的竞争,使整个语言体系得以实现积极和良性的发展。”^[10]

经济繁荣、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等因素促进了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与渗透,导致了人们在表达手段、交际手段和语言使用方面的多样化现象。语码转换现象就是现代社会中语言使用和交际手段多样化的典型例证。语码转换系指在一

次交际过程中说话者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变体的现象^[11]。“据意而择言,就言而得意”是交际过程的一个基本特征,该过程是一种言与意(即形式与意义)相互制约与顺应的互动过程。语码转换型委婉语就是通过语码转换来实现委婉目的的言与意相互制约与顺应的典型例证。例如:一位中国教授在询问学生硕士论文情况时,两人有如下对话:

教授:平时应该多看些书和论文,有必要的話还可以讨论讨论。

学生:对了,上周看了几篇中西方文学作品中homosexual(同性恋者)的文章,很有启发。

教授:你觉得这个题目很有意义吗?

学生:不是,只是觉得有点新鲜刺激。

教授:其实这是个很有意义的题目,只不过人们在谈到homosexual的时候,往往不好意思,但这的确是个现实,值得好好研究一番。

在这段对话里,教授和学生谈到homosexual时均选择英语,因为在公共场合下或上下级之间谈及与性有关的话题在中国文化里是不恰当和不礼貌的。如果非谈不可,人们通常会使用各种交际策略来转换说法,语码转换就是其中一种交际策略。为顺应这样的社会规则,教授和学生有意识地转换语码来实现委婉,以避免尴尬。其实homosexual这个词在操英语的本族人的交谈中是个直白语,毫无委婉之意,不过该词放在汉语语境中由于其异域色彩从而披上了委婉的外衣,润滑了交际。由此可见,各种语言的互利共生有利于实现委婉语这一微生态系统的语言生态平衡,就像各物种的互利共生有利于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一样。

(五) 新物种的出现与网络委婉语的诞生

随着自然界的长期演化,当温度、湿度以及气候等外部环境允许时,某一生物群落中就会产生新的物种。现存物种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竞争是产生新物种或物种变异的主要方式之一,这种方式之下产生的新物种与其他现存物种之间在生态特征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往往还具有某一种或某几种现存物种的部分生物属性。同样,不同文化之间的长期相互接触和影响也会使得语言使用者有意识地去了解对方的文化和学习对方的语言,以满足交际的需要,这时往往就会产生新的语言变体。经济、政治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发展的当今世界为各种语言变体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生态环境,那么语言地区变体和国别变体的出现就是水到渠成和势在必行了。类似于新物种的产生,新的语言变体的出现缓和了语言间的隐性竞争关系,暂时消解了外在与显性的文化冲突。在整个世界的语言系统中,共核语言的流行固然有其必然性,但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的语言变体也是有其特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的。

文字的产生突破了语言的时空限制,使口语和书面语一起成为人类交流的双轨形式,标志着人类

文明时代的到来,语言的特殊生态交流样态——网络信息样态则进一步缩小了语言使用者之间的时空距离,使地球成为了一个小村庄,这就意味着信息社会给语言生态带来了新景象^[12]。多轨型立体式的语言交流形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语言交际观念,也改变了他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例如过去我们认为语言交际是在特定的时空里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活动,因空间不同、时间各异而在交际策略、交际方式方面产生差异性,而以立体多轨形式进行“面对面”交际的语言网络信息交流形式,使人们认识到“天涯海角”再也不适合地球村上的居民,大家都可以通过网络这种多轨形式来实现一定的交际目的。在以口语和书面语为主要特征的双轨形式条件下的远距离交流多以“写信”的书面形式来实现,而在网络时代,人们可以通过通过短信、微信、微薄、博客、视频交流等形式交流意见和解决问题。语言的多轨型立体式形式——网络信息形式是语言在交流形式上的一场革命,它给语言生态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网络委婉语形式丰富、功能特殊,深受广大网民们的青睐,在各式各样的网络语言中独树一帜。不同于传统委婉语,网络委婉语大量利用字母、数字、符号、谐音、火星文等,在形式上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它们大多具有积极礼仪和幽默讽刺的功能,因而具有很大的开放性。这一方面使人类的语言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把残酷的事实彰显于幽默之中,另一方面又可以淡化语言中消极或贬义的语义因素,掩盖那些令人尴尬和羞于启齿的事实,避免交际中出现唐突和令人难堪的现象,使言语交流更加文明和高雅。看似语义温和、婉转,但是温和婉转之中却蕴涵着刚毅和坦直,使得讽刺性成为网络委婉语的一个重要特征。网络这一载体的出现改变了语言传播的途径,途径的变化必然会带来语体或语言风格的演变,网络委婉语在其构造和传播过程中不断被重新复制、模仿和改造,形成了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语言模因,它的嬗变和发展影响并反映着大众的文化意识。网络委婉语作为委婉语生态系统中的一种新变体,它的产生、发展、特征、功能和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新物种具有很多相似之处。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就不赘述网络委婉语的构造方式和传播特征了,详见拙文《网络委婉语构造中的模因现象》^[13]。

三、结论

生态语言学是一门超越语义学、语用学和句法学的学科,自诞生之始已走过四十年春秋,它主要探讨语言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人类语言的生态

特征,分析运用语言的生态原理,揭示语言发展中的生态学规律。因此,就经验主义方面的研究视角而言,这一学科非常需要可理论化并富有创造性的思想。生态语言学在语言方法论思考、理论探讨以及经验主义这些层面的研究,为那些对生态学感兴趣的语言学者们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动力。我们知道,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委婉语必将随着历史发展的变化而变化,历史上委婉语的产生和嬗变都离不开当时的自然、社会环境,委婉语的历史性特点和现代性特征有利于人们忠实地记录和保存各个历史阶段及当代的风貌和特点,可以在我们认识、了解历史和当代社会的过程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我们说,语言既是社会的语言又是生态的语言,它反映了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而委婉语正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 [1] 吴文. 社会文化理论与生态语言教学观[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1(3): 58.
- [2] 高玲. 从生态语言学角度浅析现代汉语[J]. 语言理论研究, 2007(3): 6.
- [3] 劳允栋. 英汉语言学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198.
- [4] 李国正. 生态语言学系统说略[J]. 语文导报, 1987(10): 21—23.
- [5] 裴竞超. 生态环境下的语言生态面面观[J]. 河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3): 85.
- [6] 朱风云. 英语的霸主地位与语言生态[J]. 外语研究, 2003(6): 27.
- [7] 范俊军. 生态语言学研究述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3): 111.
- [8] 邵军航. 委婉语的构成手段[J].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08(4): 62.
- [9] 邵军航. 论委婉语的分类标准及类型[J]. 上海金融学院学报, 2009(4): 68.
- [10] S. S. Mulfwene.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volu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62—163.
- [11] 徐梦灵, 原雪梅. 语码转换的认知心理机制——基于“顺应论对语码转换的解释”[J]. 语言理论研究, 2011(11): 6.
- [12] 冯广艺. 论语言交流形式的生态变迁[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5): 171.
- [13] 姚吉刚. 网络委婉语构造中的模因现象[J].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1): 32—36.

[责任编辑: 吴晓红]

《紫颜色》中的生态意象及女性形象的塑造

范小红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南京 210023)

摘要:分析了《紫颜色》中生态意象的象征意义及其在女性形象塑造上的重要作用。在《紫颜色》中,生态意象得到了巧妙地应用。植物,动物以及自然界中的其它存在分别与书中各个女性形象的描写紧密相连。生态意象的转换贯穿了故事的发展进程和女性人物命运的变迁。对女性形象的生态塑造反映出艾丽斯·沃克前瞻性的艺术视角和高超的写作技巧。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紫颜色》;生态意象;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2-0080-04

The significance of ecological images and the molding of women characters in *The Color Purple*

FAN Xiao-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symbolic meanings of the ecological images in *The Color Purple* and their significant effects in molding women images. Not only are the eco-images skillfully applied in *The Color Purple*, plants, animals, and other existences in the natural world are also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molding of women characters. As it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logical images thread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ory and the changes in women's lives, and the ecological molding of the women characters mirrors Alice Walker's prospective viewpoint on art and her superb writing techniques.

Key words: eco-feminism; *The Color Purple*; ecological images; women images

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在《紫颜色》中对黑人女性的伤痛与快乐,以及她们从脆弱屈服到自强不息的成长过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小说以主人公黑人妇女西丽的生活轨迹为蓝本,以书信体形式讲述了她在备受摧残折磨的困境中如何觉醒而成长的过程。作为黑人女性的一员,艾丽斯·沃克在此书中以文学的方式探讨了对黑人群体,尤其是黑人女性的生活造成深刻影响的多种因素,也探讨了黑人女性改变自身命运的出路和希望。

《紫颜色》不仅是一部反映社会、政治、经济等多维度的思想性的作品,更是一部具备了高超写作技巧的文学作品。作为自然中众多颜色中的一种,《紫颜色》从题目就已经将女性的命运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在作品中,作者巧妙地将自然的意象与故事的发展和人物命运的变迁相贯穿。为此,本文着

重分析《紫颜色》中生态意象的象征意义,并分析生态意象在女性形象塑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生态批评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意象在中外文学作品中并不罕见,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生态主义批评的出现,人们才开始将生态意象与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联系在一起。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指出,生态文学批评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1]。一方面,生态批评突破了传统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模式,将环境意识引入文学批评,通过文学来重新审视人类文化,探索人类的发展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

恶化和生态的危机。乔纳森·莱文(Jonathan Levin)总结到,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2]另一方面,生态批评家又把对自然生态的关注扩大到社会、文化甚至人的精神领域,充分重视自然对于文学的本源意义。“尽管作为人类生命基础、生存环境和实践对象的自然已被社会中介化了,但它并不因此消失其自然本性。自然之所以能生成为人,是因为自然本来就存在并生成着属人的本质。”^[3]总之,生态批评就是要保持文学批评的基本方式,又体现出生态的精神和价值,从而改变人类对文学和自然的认识方式。

生态批评兴起之后,女权主义者弗朗西斯娃·奥德博纳于20世纪70年代发表了两部作品《女权主义或死亡》和《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变化》。她把生态观点和女权观点相结合,揭示了自然和女性之间某种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正如生态女权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斯普瑞特耐克指出的:“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4]生态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造成性别歧视和生态危机的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父权制世界观。著名的生态女权主义者凯伦·沃伦(Karen Warren)在《生态女性主义哲学》一书中还提到“要充分研究和解决诸如森林减少、水污染、农田和食物生产、有毒物和水环境破坏等环境问题,就必须将其与对妇女、有色人种、贫穷人口、儿童等所处的困境联系起来理解……以期更好地了解主流环境行为和政策是如何反映,加强或者造成那些贬低、颠覆、漠视妇女、有色人种、下层社会人口和儿童的需求及贡献的行为和政策。”^[5]在父权制世界观中,自然和女性都被视为被征服与统治的对象,被放到了“人类”的对立面。正是由于对自然和女性无节制的压迫带来了现今的生态危机和人类自身的危机。因此,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要解决生态问题并达到和谐发展,首先需要破除以父权制为中心的世界观,重视女性和自然的声。正如S·格里芬等人强调的,女性身体功能与自然接近,女性与自然的这种联系应当得到张扬,把建构和弘扬女性原则、女性精神、女性文化作为解决生态危机和实现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6]。

《紫颜色》正是在生态批评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思想浪潮中诞生的杰出的文学作品。作者艾丽斯·沃克不仅将“妇女主义”的思想在书中表现的淋漓尽致,而且她对于生态意象的巧妙使用也值得我们做更深入的探讨。

二、《紫颜色》中的生态意象

在《紫颜色》中,自然的意象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也不是一个没有区别的整体。这些意象的出

现不是随意或偶然的,而是经过作者精心挑选的,是与书中女性形象的描写紧密相连的,体现出女性命运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

首先,植物的意象,象征着遭受多重压迫、丧失人格自主权、失声的黑人女性,女主人公西丽是最典型的代表。书在开篇时西丽尚处于青少年时期,却已饱尝人间痛苦。西丽的悲剧起源于其生父被白人以私刑处死,加剧于其继父对其多次施暴,恶化于其母子分离,最后绝望于冷漠无情的婚姻家庭生活。故事中没有全知全能的讲述者,只有一个孤立无援的黑人小女孩向日记默默哭诉,在无尽的黑暗中艰难地探索。难以承受社会和家庭的多重痛苦,西丽选择的是将自己的神经麻木以求得生存。“我把自己变成木头,我对自己说,西丽,你是棵树。我就这样知道了树是怕人的”。对生活绝望且缺乏被爱的西丽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西丽对很小失去母亲的继子哈波很好,但却没有感情。“拍哈波的后背就跟拍条狗一样。更像是一块木头在拍另一块木头。不是一颗活的树,而是一张桌子,一口五斗橱。”^{[7]22}西丽将自己以及一切被生活伤害过的人统统认同为失去自主权与行动力的“树木”,而那些造成伤害的力量则是与“树木”对立的“人”。西方长久以来以“人”为中心的哲学观强调的并不是所有人类,而是特指那些特权阶级,即白人和男人。在这种哲学观的指导下,对自然的掠夺,对女性的束缚,对不同种族的歧视,都是为了满足特权阶级的发展需求。至于被压迫者,则长期受到冷漠与忽视。西丽看似无意的归类,实则包含着作者的匠心独运。西丽的成长历程其实也正是一部自然被异化、被边缘化的血泪史。

另一个被异化为植物意象的女性形象是西丽的好友莎格·艾弗里。莎格是一名歌手,在传统社会中这是一个遭人误解、被人鄙视的职业。就连牧师讲道时也拿她作话题,使用“荡妇、轻佻的女子、娼妇、妓女”^{[7]32}等极尽侮辱之名词。莎格原本是要跟某某先生结婚的,却因为其职业被某某老先生断然拒绝。他说:“我地里长野草的话,我就把它们拔了。要是垃圾刮到我的地里,我就烧了它。”^{[7]39}可见在某某老先生看来,他对土地以及土地上一切物品拥有绝对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而女人,尤其是莎格这样充满自由思想的女人,不过是地里的“野草”和“垃圾”,是威胁到他利益的“有害”力量。因此他可以随时将其拔起,排除异己。在书中出现次数有限的某某老先生仅凭这一句话,活脱脱塑造出一个典型的父权制体制下自高自大的黑人男性特权阶层。

其次,《紫颜色》中的女性形象也多次被异化为动物意象。沃克在《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一文

中指出：“黑人妇女在民间歌谣中被称为‘世间的骡子’，这一称呼十分贴切地反映了黑人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8]埋头苦干的“骡子”意象形象地描画出处于社会最底层任劳任怨的黑人女性。哈波的妻子索菲亚勤劳善良、操持家务、养育孩子、做事有主见。而最后一点却成为哈波对其家庭暴力的缘由：“都是那头骡子把我害的。你知道她脾气暴躁。那天她在地里发起疯来，等我制服她往家走的时候，我挨了好几蹄子。”^{[7]27}然而动物的意象并不总是失声的。书中提到莎格·艾弗里时，称其为“蜜蜂王后”^{[7]31}，她生病的时候像只猫，“可她的嘴巴却刻薄得像尖利的爪子一样”^{[7]36}。这些具有自我防御能力的动物意象，暗示了即使在强大的父权制社会背景下，黑人女性中仍然有为自由而斗争的勇士。

《紫颜色》中“鸟”的意象能很好地反映出父权制社会下两性之间权力的争夺与制衡。西丽的丈夫曾这样评价她：“我过去老觉得你像只鸟，好久以前，你刚来我这儿住的时候。你真是瘦小，天哪，他说，出了一点点小事情，你就吓得跟小鸟一样，像是要飞走似的。”^{[7]175}两性间的矛盾就在于，男性将女性置于其设置的牢笼之中，企图加以控制，然而却又担心其随时会飞走。而女性则被异化为笼中之鸟，自由成为奢侈品。两性之间的互相制衡正如自然界法则早已设定的那样，是世界发展的不竭动力。两性关系也正如生态关系一样，平衡永远是追求的主题，却不那么容易实现。

艾丽斯·沃克认为，自然界中的“花朵、风、水、大石头”^{[7]133}等美好的事物是女性力量的来源。相反，男性对女性的欺压正如“闪电，洪水和地震”^{[7]133}一样给人类带来巨大的伤害，而且“他在那个座位上坐了很久，他不肯动弹了”^{[7]133}，以致毁灭了这个世界的和谐和平静。然而，女性的“搏斗”在《紫颜色》中，并不是体现为战争、抗议、阴谋或者其他暴力的、破坏性的改变。她们以强大的内心世界来制衡这些破坏性的力量。这也反映出艾丽斯·沃克所期望的两性平等，更多的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生态和谐及两性关系的和谐才是人类最终应该达到的美好愿景。正如“贝壳”在某某先生与西丽的最终和解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那样：“事实上，就是这些贝壳让我又走进了他的屋子。”^{[7]175}“贝壳”这一意象象征着大海，象征着宽广的心胸，象征着和谐。贝壳让西丽重新认识到某某先生对自然界的存在开始有了爱心，开始尊重自然界的存在。也正是因为某某先生的这一变化让西丽重新认识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时候起，西丽跟某某先生之间才有了正常的平等对话。她甚至觉得“唯有某某先生好像懂得我的心思。”^{[7]179}某某先生也说：“西丽，我现在心

满意足，我第一次像个正常人那样生活在世界上。我觉得我有了新的生活。”^{[7]180}

可以看出，《紫颜色》中的植物、动物以及自然界中的各种生态意象都显示出作者对女性与自然之间天然联系的深刻认识。通过将女性命运与生态意象相联系，作者为读者展开了一副生动的画卷，将黑人社会的幸福与苦痛以各种色彩、各种声音的方式展现得淋漓尽致。

三、生态意象与女性形象塑造

《紫颜色》中索菲亚、莎格和西丽三个主要女性形象的塑造，都跟自然界中的意象紧密联系。作者巧妙地通过不同意象的转换实现了人物形象在岁月的洗礼中那微妙、却又有着翻天覆地的改变。

索菲亚代表的是黑人女性最初的那种顽强。出生于典型的父权制家庭，她却并没有屈服于命运，而是在逆境中培养出了顽强斗争的精神。“我这辈子一直得跟别人打架。我得跟我爸爸打。我得跟我兄弟打。我得跟我的堂兄弟、我的叔伯打。在以男人为主的家庭里女孩子很不安全。”^{[7]29}面对某某先生以家长制的权威对他们婚姻的刁难，与哈波的沉默不语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索菲亚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们家，她对哈波说：“我和娃娃等着你，等到你自由的时候。”^{[7]24}当遭遇家庭暴力时，索菲亚毫不犹豫：“我爱哈波，上帝知道我是真心爱他。可我会揍死他的，如果他想揍我的话。”^{[7]29-30}然而，索菲亚的顽强仅仅局限于家庭生活。面对更大更难以撼动的社会枷锁时，她却被彻底打败而萎靡不振。白人市长的老婆看到索菲亚将家庭和小孩理得干干净净，觉得她非常能干，想让她去家里做佣人。索菲亚暴力反抗这一公然剥夺人身自由权利的行为。然而，她的反抗换来的却是十多年的牢狱之灾。在牢中，她被打得遍体鳞伤。在时间的冲刷下，索菲亚的斗争精神日渐消磨。“她说话的嗓门有气无力，好像是死人在坟墓里说话。”^{[7]136}最后当莎格和西丽要去大城市孟菲斯时，索菲亚却再没有当年的勇气和斗志了。“不是我，索菲亚说。她的神情好像在说，去你妈的，你们居然敢有这种想法。”^{[7]137}索菲亚这一形象经历了“有声”到“无声”的变化，正如“骡子”这一生态意象所暗示的那样，象征着大多数被社会磨灭掉斗志、沦为父权制牺牲品的黑人女性。

与索菲亚相反，莎格·艾弗里象征的是黑人女性在更广阔社会背景下的坚强不屈顽强抗争的先驱精神。莎格追求的是精神的自由。莎格坚持自己的演唱事业，即使整个社会都将她看成毒草和娼妇。由于某某先生的懦弱，没有为莎格而与某某老先生及社会舆论进行抗争，莎格沦为了别人眼中的

情妇。在病中,她依然对男人的软弱表示出十分的愤恨:“你他妈放开我的手,她对某某先生说。你怎么回事,你疯了吗?我不需要一个软弱无能的、不敢对爸爸说一个‘不’字的小娃娃抓着我不放。”^{[7]34-35}尽管她的形象被社会丑化成了“野草”和招摇的“蜜蜂王后”,然而从另一方面却表现了莎格对男权社会和传统的挑战,以及男性对其自由精神的惧怕。莎格·艾弗里形象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她是黑人女性梦想中的完美形象,还在于莎格作为先驱者对其他女性的帮助。莎格尊重人格和自由。她把西丽带到酒吧听她唱歌。当西丽想当然地认为没有人会注意到自己的存在时,却听到莎格叫她,并给她写了一首歌。西丽第一次感受到被人尊重。莎格还帮助西丽找到被某某先生藏起来的西丽妹妹耐蒂的信件,让西丽重新获得了亲情的温暖。莎格带西丽到孟菲斯,帮助西丽建立了自己的裤子公司,她对西丽说:“你不是我的佣人,我不是把你带到孟菲斯来伺候我的。我把你带来是爱你,帮你站起来做人。”^{[7]144-145}莎格还帮助哈波的女友吱吱叫发现其唱歌的天赋,找到谋生的手段。莎格的形象具有超前的意义,她突破了传统对女性的束缚,是黑人女性独立之路的开拓者。

西丽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索菲亚和莎格形象的一种融合,是作者更主张的一种和谐的状态。西丽从一个沉默的黑人女孩成长到独立女性的过程,一直都与自然的意象联系在一起。从最初将自己“树木”化,麻木自己的痛觉以求得生存,到发现生命力的存在与顽强。“我在树木中发现了生命力;后来我在空气中发现了生命力;后来在鸟身上;再后来是在别人身上。有一天我安安静静地坐着,觉得自己像个没娘的孩子,它突然来了,我觉得我是万物的一部分,不是跟万物毫无关系的、割裂的东西。我知道如果我砍一棵树的话,我的胳膊也会流血”^{[7]132}。西丽的成长历程伴随着其对自身、对自然感受的恢复和认同。从最初被剥夺话语权、沉默无声、只能给上帝写信以支撑自己的世界,到内心与外部世界的接触,直至发现自己的才能、建立信心,创建公司,西丽从父权制家庭的牢笼中走出来,开创自己的天地,获得了经济和精神上的自由。面对社会桎梏,西丽的精神没有被磨灭,在友情和亲情的支撑下,西丽实现了从“无声”到“有声”的转变,从“无助”到“助人”的转变。虽然亲生父亲死于白人之手,西丽并没有选择报复,反而在店里保留了一个白人雇员。虽然长期遭受某某先生的家庭暴力和冷遇,西丽没有选择仇恨,反而因某某先生收集的贝壳认识到他的改变而成了一对相识已久的老朋友。在故事的最后,西丽不仅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也建立了与自然、与社会、与男性的

多重和谐关系,赢得了社会的承认与尊重。

《紫颜色》通过生态意象描绘出三类典型的黑人女性及其生活的命运变迁。索菲亚代表了黑人女性最初的顽强,然而却在社会多重打击下被磨灭掉棱角和意志,象征了黑人女性成长道路上的苦痛与失败。莎格代表了黑人女性有意识的觉醒,是黑人女性中的领路人。西丽的成长历程既是黑人女性苦痛的写照,也是一部励志传奇。西丽的形象正如枯木逢春,只要去争取,一切皆有可能。

四、结语

总之,《紫颜色》中植物、动物和自然界的意象体现出了艾丽斯·沃克在女性形象塑造上的用心良苦。这些意象不仅仅反映出每个黑人女性形象的命运,更体现出了黑人女性与彼此、与自然、社会之间的联系。通过黑人女性形象的生动塑造,艾丽斯·沃克表现了她对小说艺术形式的探索与追求,创造性地运用了生态意象来贯穿故事的变迁和发展。通过对女性形象的生态塑造,艾丽斯·沃克表达了她对于性别问题、种族问题以及生态问题的展望和期待,提出了前瞻性的解决方案。正是这样的“前瞻性”,使得《紫颜色》直至今日依然拥有众多的读者,激励着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人们共同为改变命运而不懈努力着,也使得这本书成为了文学史上璀璨的经典之作。

参考文献:

- [1] Chery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M].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xviii.
- [2] Levin, Jonathan. *On Ecocriticism (A Letter)* [J]. *PM-LA*, 1999 (10): 1098.
- [3] Worst, Donald. *The Wealth of Natu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Ecological Imagina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7.
- [4] 斯普瑞特耐克. 生态女性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 [J]. 秦喜清, 译. *国外社会科学*, 1996 (11): 63.
- [5] Warren J Karen. *Ecofeminist Philosophy: 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 [M].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 Field, 2000: xiv - xv.
- [6] 王文惠. 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简·爱》的重新解读 [J]. *外国文学研究*, 2008 (11): 120 - 124.
- [7] 艾丽斯·沃克. *紫颜色* [M]. 陶洁,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 [8] Walker, Alice. *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3: 393.

[责任编辑:吴晓红]

《伊甸之东》中女性形象之新解

张树娟, 张莹波

(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2)

摘要:《伊甸之东》描绘了女性在男性专制的暴力下为争取自身权益所进行的不同方式的抗争, 高度赞扬了女性的自由精神, 建构了反映女性生存状态的真实空间。从女性主义视角对文中“沉默”、“堕落”、“觉醒”的女性形象进行解读, 详细阐释女性的自由精神的体现以及女性如何觉醒、自救最终获得自由的全过程, 并进一步指出: 沉默的消极方式和堕落的极端方式都无法捍卫女性的自由和权利, 只有通过理性的方式才能最终为女性赢得真正的平等,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两性和谐。

关键词: 女性主义; 《伊甸之东》; 女性形象; 理性的方式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 (2014) 02-0084-05

New interpretation of female images in East of Eden

ZHANG Shu - juan, Zhang Ying - b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213002,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interprets the three types of female images in East of Ed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By portraying the “silence”, “depravity”, “awakening” of the female images, Steinbeck vividly reveals the existence of women under patriarchy, strongly criticizes the autocratic and violent men, and details oppression, resistance of the females. Meanwhile, the paper expounds the free minds of women by which the women eventually gained their self, consciousness and freedom, and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neither the negative way of “silence” nor the extreme way of “depravity” can enable women defend their freedom and rights, and that only through the rational way can women win the true equality for themselves and regain the harmony between sexes.

Key words: feminism; East of Eden; female images; the rational way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 1902 - 1968)是二十世纪美国著名作家,196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伊甸之东》是一部公认的长篇巨著。哈维·韦伯斯特(Harvey Webster)认为“这部小说标志着斯坦贝克思想的一大飞跃”^[1],马克·肖勒(Mark Schorer)称赞《伊甸之东》是一部“奇特的、具有独创性的艺术作品”,认为它是“约翰·斯坦贝克所有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作品”,高度评价该书“题材广泛、想象力丰富、充满自由精神”^[2]。斯坦贝克以敏锐的观察力深刻剖析人性的善恶,探索人

的精神世界。他尤其对处在男权统治下的女性充满同情,一直关注她们的命运,思考她们的未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权运动方兴未艾,女性为了争取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不断抗争。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女性追求自由的精神不断推动着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这种自由的精神恰恰为斯坦贝克推崇备至:“我深信不疑的是:个人的自由、探索的头脑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我要为之奋斗的是:头脑要有随心选择其发展方向,不受支配的自由。”^{[3]147}

收稿日期:2013-10-30

基金项目:常州工学院科研基金项目“精神生态视阈下的约翰·斯坦贝克研究”(2013YN1335)资助

作者简介:张树娟(1978-),女,江苏扬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女性文学。

作者在《伊甸之东》中描绘了女性在男性专制的暴力下为争取自身权益所进行的不同方式的抗争,高度赞扬了女性的自由精神,建构了反映女性生存状态的真实空间。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对《伊甸之东》中的数位女性人物重新解读,分析“沉默”、“堕落”和“觉醒”多个女性形象,详细阐释女性的自由精神的体现以及女性如何觉醒、自救最终获得自由的全过程,进一步说明:女性只有通过理性的方式而非沉默或堕落等消极或极端方式,自我觉醒、自我发展,才能最终获得平等权利、实现自我价值。

一、沉默的天使

在《伊甸之东》中,赛勒斯是父权制的典型代表。他“物化”了第一任妻子即亚当的母亲和第二任妻子爱丽斯,强迫她们按照父权制社会的性别秩序和规范模式生活。事实上,“男性心目中千百年来一直梦想着的理想女性就是一位天使——年青、纯洁、驯服,且甘愿牺牲自我。对于更加世俗的十九世纪,永恒的纯洁女性不是以天堂里的圣母为代表,而是家庭中的天使。”^[4] 亚当的母亲及其继母爱丽斯就是父权制下的家庭天使,处于看不见、沉默的边缘化地位。作为父权社会的牺牲品,她们被动、屈从、压抑,没有追求独立的人格,接受社会给她们规定的妻子、母亲、主妇或性对象等角色,默默地为家人操劳,身心倍受摧残,甚至付出年轻的生命。

斯坦贝克对亚当母亲的描写只有寥寥几笔,她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是被称作特拉斯克夫人,因此没有独立自主的身份。这种无名状态正好说明了她自我和身份的双重缺失,证明了在家庭和婚姻生活中她的从属地位。正如张世君教授指出的,“没有名字的抽象命名……象征着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身份的缺失。”^[5] 她具备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品质要求:虔诚、贞洁、服从、温顺。亚当的母亲是个“内在含蓄的女人”^{[3]17}。她时刻保持沉默,生活凄苦,没有欢笑。鲁斯文(Ruthven)尖锐地指出:“一个女人想说话,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模式中,要找到合适的位置很难,因为这种话语模式规定男性是言说者,而把女性被降格为被言说者。”^[6] 在赛勒斯服役期间,亚当的母亲怀有四个月身孕,一个人在农场上操劳,支撑着整个家庭。但是,生性放荡的塞勒斯在退伍后把淋病传给了亚当的母亲。她不仅要忍受赛勒斯的不忠,还要忍受

来自病体的无限折磨,内心巨痛无比,最终她以自杀的方式摆脱了父权制的奴役,以悲壮但自主的形式结束了她屈辱的一生。

而赛勒斯却在父权制的庇佑下为所欲为。亚当的母亲尸骨未寒,赛勒斯就娶了邻家女儿,17岁的爱丽斯为妻。他只花了两个星期追求她,同她结婚,并使她怀孕。赛勒斯需要一个女人来照顾年幼的亚当、管家做饭、满足自己的性欲,而且“姑娘的父亲赞同这门亲事”^{[3]18}。不管爱丽斯是否愿意,她必须遵从父命,相夫教子成了她婚后的天职。婚姻把爱丽斯驯化成了典型的家庭天使。她缄默、忍让、温顺、对丈夫绝对服从,她的言行完全符合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范和期望。尽管她承担着母亲、妻子和家庭主妇等重要角色,却丝毫没有话语权。爱丽斯在家里始终保持沉默,“她从不提出任何看法和意见,男人讲话时,她继续干她的家务事,但给人一个模糊的印象,仿佛她在倾听。”^{[3]19} 同时婚姻还剥夺了爱丽斯的经济权。赛勒斯要求家庭收支安排也像军队里那样请示汇报,爱丽斯成了赛勒斯的奴隶。没有人关心她的内心世界,沉默寡言成了她最大的优点,倾听成为了习惯。这些在赛勒斯眼中都成为他的资本。爱丽斯对丈夫敬畏、顺从、委曲求全,不得不压抑自己对自由的渴望,在夹缝中求生存,“有时候,她只有一个人,并且知道没有别人在场,她让自己的思想在花园里漫游,就微笑了。奇妙的是她能像谨慎的土拨鼠把小鼠赶回地洞一样,飞快地收起笑容。”^{[3]24-25} 在父权制的禁锢下,爱丽斯被迫以压抑自我的方式来换取有限的生存空间。尽管如此,她还是未能逃脱父权制下的悲惨命运。由于操劳过度,爱丽斯不幸得了痲病,但是她却不敢向赛勒斯提起半句,因为她知道当病魔剥夺她劳动和相夫教子的能力,她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赛勒斯心狠手辣,残酷无情,他“很可能采取治疗措施,不等她死在痲病上,一条命可能先断送在治疗上”^{[3]21}。爱丽斯的身体成了赛勒斯的巨大财富,供他随心所欲地发泄兽欲。即使爱丽斯咳得十分厉害,赛勒斯没有丝毫怜悯之心,继续对其身心进行无情地摧残。传统的父权意识形态为妇女制定的“性道德”使爱丽斯承受着赛勒斯的性压制和奴役,又一条年轻的生命惨死在赛勒斯的蹂躏之下。

斯坦贝克笔下这两位沉默的女性对父权充满了恐惧,她们不敢言说,完全丧失了自我,成为“他

者”或“第二性”的角色。在男权文化的氛围中,她们的生存状态被忽视,精神受到压抑,自由受到束缚,身心遭到摧残,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们以沉默求生存的方式是消极被动的,最终不能逃出男权意识形态的禁锢而沦为其牺牲品。

二、堕落的天使

与亚当的母亲和艾丽斯这两位沉默的家庭天使不同,凯西被着力刻画成一个堕落的天使。她有着天使的面孔,个性鲜明,行为叛逆。她藐视父权,颠覆传统,一生狂热地追求精神的自由。这无疑是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的挑衅,注定要受到来自男性世界的规范和压制,因此凯西被当作“异类”排斥在父权制之外。

凯西的父母艾姆斯夫妇极力维护父权制的统治地位,他们深受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幻想着能够驾驭凯西的人生。凯西十岁就主动和两个十四岁男孩进行性游戏,自私的父母为了维护凯西的淑女形象,没有追究真相,也没有及时制止并纠正凯西的错误,而是对两个男孩进行了严厉的惩罚,把他们送进了教养院。他们让凯西继续读中学是因为凯西说她将来想当一名教师。这个职业能够给他们脸上争光。凯西成为父母的骄傲,因为艾姆斯夫妇把未嫁的女儿当作他们提高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筹码。他们期盼凯西能按照父权社会的规范步入婚姻,成为传统的家庭天使。他们无疑是父权制的卫道士,也是扼杀凯西自由的帮凶。虚伪的艾姆斯夫妇对与凯西有着私情的拉丁文教师詹姆斯·格鲁的自杀无动于衷,但对凯西拒绝上学的举动大发雷霆。他们不关心女儿的内心世界,不关注她的身心健康,要的只是一个乖巧听话、对父母绝对服从、令他们骄傲的女儿。凯西的出走更是威胁到父母的颜面,艾姆斯先生以教训代替教育,狠狠地鞭挞女儿以此强调父亲的身份和权威。“这下你该记得你是什么人。别忘了我是什么人。”^{[3]93}父母的淫威扭曲了凯西的性格,彻底改变她的人生。为了永久地摆脱父母的控制,她纵火活活烧死了父母。与此同时,凯西采取极端的方式——性的放肆来公然反抗父权制。“女性对自己的身体的认知是女性界定自己的身份、掌握自己的命运和自我赋权的一个重要途径和组成部分。”^[7]凯西选择做妓女这一被人鄙视、遭人唾弃的职业来界定身份,试图

扰乱父权社会的性别秩序、颠覆女性的传统角色,构建女性的主体意识,但残酷的现实却把她的梦想击得粉碎。她挑战“男性主体,女性客体”的传统,试图把妓院老板爱德华兹玩弄于股掌之间,却一直深陷在爱德华兹掌控之下。爱德华兹用诡计揭开凯西的真面目之后,凶相毕露,把凯西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亚当收留并同她结婚,因为她美丽的外表构建了亚当心中的天使形象,他全然不顾凯西本人的意愿一厢情愿地在萨利纳斯河谷建造一个所谓的“伊甸园”。凯西不愿成为家庭天使。她同亚当结婚只是因为在她走投无路时亚当给她提供了适时的庇护。她拒绝做丈夫的附属品,决然选择离开。她开枪射伤亚当,抛弃尚在襁褓中的双胞胎儿子,重操妓女旧业。不仅如此,她还毒死妓院老鸨费叶并霸占其生意,“在斯坦贝克的笔下,她是最恶毒和具有毁灭性的女性;在世界文学史上,她大概也是鲜有的魔鬼形象。”^{[8]152}凯西赫然是一个危害社会、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然而,光顾她妓院的主顾们有表面受人尊敬的议员、市政会成员、大学教授,还有传教士,他们都是社会的主体,因此,她仍是父权制下男性施展淫威的对象,遭人唾弃的“他者”,承受着社会道德伦理的谴责,最终无法摆脱被社会抛弃的噩运。

凯西一生挑战父权,追求自我,渴望获得精神的自由。她始终视男人为敌人,试图用性这种女性天然的武器来操纵和控制所有人,她的灵魂是扭曲的,手段是残忍的同时也是无奈的。她所采取的方式同男性对待女性的方式如出一辙,同样是压迫式的手段,但殊不知自己却走向了女性中心主义的极端。女性中心主义只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变体,如果女性的抗争向这一步任意发展,便成了对男性中心主义的一种变相的回归,终究逃不过父权制的控制。最后凯西以自杀的方式无奈地结束了自己放纵的一生,死时仍是特拉斯克太太。

三、觉醒的天使

女性在探索自我、拯救自我和建立自我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凯西以极端的方式挑战父权制使女性走入女性中心主义误区。女性如何真正解放自我从而建立一个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的社会是斯坦贝克深深关注的命题。在《伊甸之东》中,斯坦贝克通过刻画平凡而伟大的女性追求自我的心路历

程来解读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的嬗变过程。她们是智慧和勇气的化身,坚持不懈地追求着平等、自由,不断实现自我价值,以理性的方式而非消极、被动甚至极端的方式在父权制社会赢得尊严。

莉莎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她平凡因为她信任并尊重丈夫塞缪尔,是他的精神支柱,更是家庭的守护神。美国学者桑德拉·比蒂(Sandra Beatty)指出:“斯坦贝克小说中的女性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她们具有坚不可摧的性格力量;这种力量一经展现,就凝聚住身边所有人的力量。她们的丈夫很快认可她们这种力量,特别当他们在犹豫和懦弱的时候。《伊甸之东》中的莉莎·汉密尔顿就是典型的代表。”^[9]她伟大不仅因为她信仰坚定,意志坚强,更因为她品德高尚,育儿有方,九个孩子(四男五女)都很有出息,受到左邻右舍的尊敬。她像大地一样坚实,可靠,在塞缪尔去世后,她顽强地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撑起整个家庭。“真像是奇迹。”^{[3]47}提起母亲,儿子威尔颇为自豪:“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像岩石一般坚强。我想起我们以前艰苦的日子,真是一言难尽。我父亲不很实际。他要么就是整天空想,要么就是埋在书里。我认为全靠我母亲才撑起我们汉密尔顿这个家,没有落到去济贫院的地步。”^{[3]373}

莉莎一生积极地追求真我,敢于向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说“不”。她成功地摆脱父权制传统给女性规定的“他者”或“第二性”形象。在男权统治下保持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用自尊、自爱、自强为自己在父权制下赢得同男人平等的主体地位。她与丈夫塞缪尔之间和谐的两性关系无疑“对父权制社会的男女二元对立具有重要的接构意义”^[10]。

在父权制下,莉莎的女性意识难能可贵。在像她一样保持女性自我意识、争取女性权利、追求自由精神的女性当中,阿布拉是最突出的一位新女性。她拥有崭新的爱情观、自由观和平等观。她如天使般美丽、纯洁、善良。“她很美,深色的头发扎成两条辫子。她的小小的前额圆鼓鼓的,眉毛很平……她的下巴丰满,嘴又宽又红,像花一般可爱。她的淡褐色的眼睛机灵聪明,没有一点羞怯。”^{[3]391}阿布拉不像传统的家庭天使,听从父母之命,结婚生子。她拒绝传统的婚姻及其象征妻子与丈夫、服从与主宰、附属与独立的传统单一的性别角色,她

追求的是一种充实完整的生活、健康的性爱、独立平等的爱情。随着这一婚姻观的确立,阿布拉也确立了她对性的态度。一直以来,性始终是由男性主宰,女性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性成为男性掌控女性的一种工具。阿布拉不仅确立了平等的婚姻观,同时意识到应该掌握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因此,她主动要求阿伦在大街上亲吻自己,大胆表达对阿伦的爱。在亚当投资莴苣生意失败后,阿布拉更坚定了自己嫁给阿伦的信念,宣布自己就是“莴苣太太”,与他共度难关。为了阿伦,她甚至愿意放弃优越的生活当农民种地。然而,阿伦对阿布拉的感情不是她追求的平等、纯洁、真正的爱。阿伦是父权制的维护者,一直以自我为中心,他所要阿布拉只是自己的复制品。阿伦的虚伪自私和脆弱使阿布拉逐渐认识到自己只是阿伦塑造的绝对“纯洁的幽灵”：“他心里没有我。他塑造了一个人,只是把我的外表蒙在那个人身上。我不是那样的——不是那个理想的人。”^{[3]562}她拒绝生活在幻想和不切实际的期望之中,勇敢地接受现实,做回自己,不做阿伦的影子。她大声地宣布:“我已经不爱阿伦了”^{[3]655}。阿布拉大声表达了一个独立、自由、不受男权控制的自我,勇敢地向男性主导下父权制社会迈出了一步,这也是女性向人类文明迈出的一大步。

格拉德斯坦(Gladstein)认为阿布拉是一个理想的女性形象,一个真正的女英雄,充满力量和勇气,是“斯坦贝克道德价值的化身,是Timshel的践行者”^[11]。她以敏锐的观察力解读人性的善恶,并做出正确的判断。当迦尔把阿伦谎报年龄去参军归咎于自己故意向阿伦泄露凯西存在的真相,阿布拉则指出是阿伦自己的软弱使他做出错误的选择。她的声音始终是理智的现实之声:“他知道了他妈妈的情况就无法忍受,因为他不希望故事朝那方向发展——而他又不愿意接受别的故事。于是他撕碎了这个世界。这同他想当牧师时,把我阿布拉撕碎的情形一模一样。”^{[3]656}帮助迦尔卸下心理包袱的同时,阿布拉也彻底从阿伦的阴影中走出来,开始她的新生活。她正视迦尔身上的“恶”,帮助迦尔认识恶存在于每个个体之中,“你明白,你不是唯一的坏人——”^{[3]672}她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发出自己的爱情宣言:“我认为我是喜欢你的,迦尔!”^{[3]656}因为迦尔具有各种好的和坏的品质,他不

像阿伦那样“纯洁”得只容得下他自己。迦尔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并非十全十美的人。在阿布拉和老李的帮助下,迦尔终于得到了亚当的原谅。亚当用尽全力发出“蒂姆舍尔”即“你可以”之声,赋予迦尔选择善的能力。因此,阿布拉本人也代表小说所表达的“你可以”这个主题的真正践行者,完成了对迦尔的精神救赎。她所体现的自由精神打破了禁锢女性灵魂的精神枷锁,挣脱了社会给女性规定的行为准则,最终获得了身体和心灵的解放,赢得了与迦尔的未来。她所体现的平等精神跨越年龄和身份的障碍,她敬仆人老李如父,直接表达对他的爱:“我希望你是我爸爸……因为我喜欢你。”^{[3]662}阿布拉对老李父爱般的深情跨越了种族的偏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也得到了老李爱的回报。

阿布拉的女性意识随着她的青春一起成长,最终萌芽、觉醒并冲破男权桎梏。她用自己的行动成功地构建了女性的自我形象,谱写了女性自己的独立宣言。阿布拉无疑是一位人间天使,她身上所具备的自由精神冲破了男权的枷锁,为自己赢得了平等、自由和独立,同时赢得了自己的未来。

四、结语

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父权制社会,女性处于压抑的被动状态。从沉默的赛勒斯的妻子们到堕落的凯西再到觉醒的莉莎和阿布拉,斯坦贝克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真实地描绘了女性的生存现状,充分展示了女性反抗传统、追求自由和独立人格的心路历程,谱写了一曲生命的赞歌。斯坦贝克在写给作家约翰·奥哈拉的信中再次强调:“我非常相信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人类所拥有的、唯一具有创造性的东西就是个人的精神……对我来说,我们最伟大的任务就是要培育和保护这种个人精神。”^{[12]359-360}这和他不懈追求的自由精神如出一辙。尤其通过莉莎和阿布拉这两位人间天使的塑造,作者颠覆了传统女性形象,升华了“个人的精神”,建构了女性自己的话语权,同时寄托了女性自我拯救的愿望。这无疑为女性寻求自我解放指出了一条出路:沉默的消极方式和堕落的极端方式都无法捍卫女性的自由和权利,只有通过理性的方

式才能唤起女性意识的觉醒,最终为女性赢得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两性和谐。

参考文献:

- [1] Webster, Harvey Curtis. Out of the New - born Sun [A]. In Joseph R, McElath Jr, Jesse S. ed al. John Steinbeck: The Contemporary Reviews [C].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96:386 - 387.
- [2] Schorer, Mark. A Dark and Violent Steinbeck Novel [A]. In Joseph R, McElath Jr, Jesse S. ed al. John Steinbeck: The Contemporary Reviews [C].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96: 391 - 393.
- [3] 约翰·斯坦贝克. 伊甸之东 [M]. 王永年,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4] Gilbert, Sandra M and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 - 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M].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20.
- [5] 张世君. 欧美小说模式 [M].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5:325.
- [6] Ruthven K K. Feminist Literary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60.
- [7] 柏棣.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3.
- [8] 陈俊松. 论约翰·斯坦贝克小说中的女性世界 [J]. 世界文学评论,2010 (1):150 - 154.
- [9] Beatty, Sandra. A Study of Female Characterization in Steinbeck' s Fiction [A]. In Hayashi, Tetsumaro. Steinbeck' s Women: Essays in Criticism [C]. Muncie, Indiana: Ball State University, 1979: 1 - 7.
- [10]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53.
- [11] Gladstein, Mini Reisel. Steinbeck and the Women Question: A Never - Ending Puzzle [A] . In Stephen K, George. John Steinbeck: A Centennial Tribute [C].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2002:153.
- [12] Elaine Steinbeck & Robert Wallsten. Steinbeck: A Life in Letters [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9:359 - 360.

[责任编辑:吴晓红]

创伤批评理论渊源探究

宁宝剑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12)

摘要: 创伤批评理论的来源是记忆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具体来讲,“古典记忆术”、“集体记忆”理论和“文化记忆”理论为创伤批评的产生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研究思路与范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界定了创伤批评的三大特征:虚拟性、滞后性和反复性。研究创伤批评的缘起将进一步推动创伤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关键词: 创伤批评;记忆理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

中图分类号: I10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2-0089-04

On the origin of the critic theory of trauma

NING Bao - jian

(School of Litera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2, China)

Abstract: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rauma is derived from the theory of memory and Freud's psychoanalysis. Specifically, the "classical memory", the "collective memory" theory and the "cultural memory" theory have provided a lot of useful research ideas and paradigms for the birth of trauma criticism. Freud's theory of psychoanalysis defines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trauma criticism: virtuality, hysteresis and repeatability. The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trauma criticism will further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uma criticism in China.

Key words: traumatic criticism; memory theory; Freud's psychoanalysis

创伤批评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是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苏珊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前者的代表作品是《创伤:记忆研究》和《无法言说的经历:创伤、叙事和历史》;后者的代表作品是《证词:文学、心理分析与历史中的见证危机》和《司法无意识:20世纪的审判和创伤》。经过她们的理论倡导和研究实践的阐发,创伤批评研究引起了文学研究领域学者的浓厚兴趣,最终获得西方文学研究界的认可,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创伤是创伤批评最为关键的概念。一般而言,创伤是后创伤压力紊乱(Post -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简称。“创伤通常被描述为对没有预料的或强烈的暴力事件的回应,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并没有被完全理解,但事后它们又以反复再现(flashbacks)、噩梦和其它的重复现象的形式回归。”^[1]根据上述关于创伤的定义,我们

不难看出创伤批评与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和神经生理学密切相关。除此之外,因为创伤是过去的记忆统治了现在,所以它也与西方传统的记忆理论具有某种联系。

一、创伤与记忆理论

创伤批评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是记忆理论。记忆理论的研究源远流长。根据它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西方“古典记忆”理论、“集体记忆”理论和“文化记忆”理论三个发展阶段。创伤批评对这三种记忆理论都有所继承和发展。

“古典记忆”理论认为情感在记忆过程中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创伤批评亦反复强调过去的创伤事件带给受害者的出乎意料却又令其震惊的情感体验,这是创伤批评对“古典记忆”理论的继

收稿日期:2013-12-30

基金项目:2013年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创伤批评视域中的索尔·贝娄小说”(CX2013B19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宁宝剑(1982-),男,黑龙江佳木斯人,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创伤批评。

承和发展。记忆理论的传统最早可追溯至西塞罗对记忆术的研究和阐发。在《论演说家》中,他曾讲到诗人西摩尼得斯(Simonides)希望向特弥斯托克勒斯(Themistocles)传授记忆技能,后者认为如果前者“能教他如何忘记而不是记忆的话,那他会更加感激他。”^{[2]453}对此,西塞罗评论道:“任何东西一旦注进这个人的心灵里,便永远不可能流出来,虽然他更希望宁可忘记他不希望记住的东西,而不是记住他一旦听见或看见的东西。”^{[2]453}在此,西塞罗强调了记忆具有不可磨灭性,某些事情人们宁愿选择忘记,它却偏偏像幽灵一样潜藏在人们的记忆深处,随时可能控制人类的精神世界。除此之外,“古典记忆理论”另一个主要特征是它“以地点和视觉意象为原则运作的:人们在想象中将图片粘在一系列真实和虚拟的空间中,最好是给人们留下强烈印象的图片,它们能提醒人们回想起事物。”^{[3]211}人们之所以能够记忆起另一个时空的事物秩序,主要是因为它们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这些印象是消极的情感信息,并且它们超过了人们正常能够承受的心理极限,人就可能出现创伤症候。与古典记忆理论一样,创伤批评高度重视情感在记忆中的作用。同时,它也发展了古典记忆理论,主张发现能够刺激受害者的情感因素,然后合理地疏导这些负面情感。因为“记忆和讲述恐怖事件的真相是恢复社会秩序和医治个体受害者的伤害的必要条件”^[4]。

“集体记忆”理论对个体创伤记忆和集体创伤记忆的辩证思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莫里斯·哈布瓦赫是“集体记忆”的代表人物。根据“文化记忆”理论代表人物阿莱达·阿斯曼和扬·阿斯曼的总结,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不具有社会性的记忆是不存在的。”^{[5]23}在《论集体记忆》中,哈布瓦赫确实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强化这一观点:“没有记忆能够在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们用来确定和恢复其记忆的框架之外存在。”^[6]根据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可以推断出它具有如下两个重要结论:首先,它产生于集体又缔造了集体。其次,个人记忆属于群体记忆;人们不是单纯地活着的,人们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进行回忆的;个人记忆正是各种不同社会记忆的交叉点^{[5]23}。这对创伤批评研究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在犹太大屠杀中,个体受害者的记忆与历史学家讲述的集体记忆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那么如何理解受害者的创伤记忆和还原历史真实记忆之间的不一致呢?集体记忆理论也许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和启发。多里·劳伯(Dori Laub)曾举例分析过一个将近70岁的犹太妇女在大屠杀中的创伤证词。当年奥斯维辛集中营发生了一次爆炸,她的回

忆是有四个烟筒爆炸,但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其实只有一个烟筒爆炸。历史学家认为受害者的证词与历史的事实相违背,因此她的证词是值得质疑的。但是心理学家劳伯认为:“这个妇女正在见证的不是爆炸烟筒的数量,而是一些其它更为根本、更加关键的事情:无法想象的一起真实事件。”^[7]但无论如何偏差,犹太人个体的种族创伤记忆都是犹太种族集体创伤记忆的一部分。尽管犹太人的个体创伤记忆具有多样性,然而它们都指向一个共同的集体记忆:大屠杀。大屠杀的历史真实性不是历史研究者的主观臆语和胡编乱造,而是历史的真相本身就是如此。那么,为何大屠杀发生之后,犹太人的悲惨遭遇没有得到世人的关注呢?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也许能够对此提供答案。我们并没有给犹太人的大屠杀创伤记忆提供可以传播的土壤。犹太大屠杀是人类无法忘记的苦难,人类应该杜绝这类现象的再次出现。为此,社会需要为犹太人提供言说大屠杀证词的空间,兴建博物馆和影像记录展览馆,广泛收集受害者的证词,为我们重新校正已有的大屠杀集体记忆,提供可供参考的资源。

根据阿莱达·阿斯曼和扬·阿斯曼的归纳,哈布瓦赫“集体记忆”记忆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结论是社会记忆具有重建性^{[5]23}。重建性是指被保存下来的记忆都是根据当前的记忆框架过滤的产物。“集体记忆的本质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8]受害者的证词和历史真相之间存在差异,这是因为受害者每次讲述的证词都会受到现实语境的影响,而现实的语境又总是发展和变化的,这就导致受害者会根据现实语境的需要去选择或过滤。受害者讲述的证词和历史真相之间存在的断层和裂缝就是这样产生的。

“文化记忆”研究在记忆和文学体裁研究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启发了创伤研究关注创伤与文学形式方面的联系,例如创伤与叙事、文体、修辞和体裁等方面的关系。根据德国著名的“文化记忆”学者阿斯特莉特·埃尔和安斯加尔·纽宁的看法,从“文学记忆”的角度讲,如下五个领域能够体现文学记忆研究发展趋势的五个研究方向:“1、文学的记忆;2、文学体裁作为记忆场所;3、经典书籍和文学史作为文学和社会的机构化记忆;4、记忆的模仿;5、文学在历史记忆文化中作为集体记忆的媒介。”^{[3]210-211}根据上述的研究思路,不难得出创伤批评研究的五个比较有潜力的研究领域:1、创伤文学;2、文学体裁作为创伤的场域;3、经典书籍和文学史中的创伤书写的功能研究;4、创伤叙事;5、媒介与创伤研究。某种意义上,“文学记忆”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为创伤批评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

范式。在创伤批评既有的格局中,创伤概念的界定、创伤的形成机制、创伤记忆的讲述方式等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不俗的研究成绩,但创伤的传播与接受方面的研究略显不足。

创伤批评和文学记忆的研究方法虽然不同,但二者在运用领域和批评实践等方面有不少重合之处,也能够彼此吸收对方的长处,弥补自身的缺陷。

二、创伤批评与精神分析学

创伤批评产生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詹姆斯·伯杰(James Berger)曾简明扼要地梳理了创伤理论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体系中的发展和演变。简而言之,创伤概念在《歇斯底里研究》(Studies in Hysteria)一书中提出,在《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一书中发展,在《摩西与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一书得以深化^[9]。中国学者也有不少类似的表述,例如苏杭在《再现创伤的历史:格林厄姆·斯威夫特小说研究》中曾讲道:“当代创伤批评研究起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10]¹⁵根据凯西·卡鲁斯的总结,弗洛伊德的两部重要著作《超越快乐原则》和《摩西和一神教》为创伤批评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学理基础。结合卡鲁斯的分析与弗洛伊德关于创伤的论述,可以看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创伤批评的最大贡献在于界定了创伤的三大特征:虚拟性、滞后性和反复性。

虚拟性是指创伤不是身体和生理上的伤害,而是精神上的伤害。从词源上来讲,创伤最初的含义是指对身体的伤害或损害。“在其以后的词义演变中,精神医学和精神病学文献中,主要是在弗洛伊德的文本中,术语创伤不是作为身体的伤害而是作为精神的伤害。”^[11]在分析塔索浪漫主义史诗《解放的耶路撒冷》时,弗洛伊德独具慧眼地发现了创伤虚拟性特征,原来在西方古代的文学作品早已存在,只是它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不被世人所知。“英雄坦克雷德在一场决斗中无意地杀死了他的爱人克罗琳达,而她被伪装穿上了敌方骑士的盔甲。埋葬她之后,他走进了一片陌生而又充满魔力的深林,它让十字军充满恐惧。他用剑猛砍一颗高树;但血从伤口中流出,坦克雷德听到了灵魂被囚禁在树中的克罗琳达抱怨的声音,他再一次伤害了她的爱人。”^[12]坦克雷德无意中杀死了自己的爱人,因为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他并不知道杀死的是自己的爱人。但在另一个时刻他感受到了爱人呼唤的声音,指责自己又一次伤害了她。其实并不是克罗琳达发出指责的声音,而是他心中的愧疚和惭愧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借死去恋人之口的象征性表述。他杀害了自己的恋人,

受到了良心的谴责。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谴责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加严重,最后导致他的精神出现错乱。因此,这种谴责不是物理伤害,而是心理和精神层面的伤害。虽然我们看不到,却能够感受到它对人的折磨。创伤批评敏锐的把握到了弗洛伊德所界定的创伤虚拟性特征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并在实践中不断解读作家的战争文学、大屠杀文学和暴力文学,帮助人们了解这些暴力事件对人类心理和精神的伤害。

滞后性指创伤具有潜伏期,一般都在一段时间之后才伤害人们的心灵和精神。如果说虚拟性界定了伤害的属性,那么滞后性则概括了创伤批评的时空表现形式。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一书中曾经专门强调过这一点。“某人遭受了一场令人震惊的交通事故,例如火车相撞。他明显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离开了案发现场。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患上了一系列严重的精神和运动神经症。这些症状只能被归因于他的震惊或者在意外事故中发生的任何其他的事情。他已经形成了‘创伤神经症’。”^[13]¹⁰⁹这起交通事件受害者的创伤经历了一段潜伏期才开始显现。弗洛伊德曾经明确界定潜伏期:“意外事故和最初的症状表征跨越的时间段被称为‘潜伏期’,它是对传染疾病病理学的明显暗示。”^[13]¹⁰⁹创伤“事件并不是在它发生之时被体验到,而是只有联系着另一个地点和在另一个时间才能充分显现”^[14]¹³。强调创伤的滞后性为创伤批评的研究路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关注战争场面、暴力的残忍、强暴的过程同时,作家和学者同样应该、或者更应该关注他们受到伤害后的心理和灵魂的状态。

反复性强调了创伤的症状会重复出现。弗洛伊德认为:“就创伤性神经症而言,对于创伤发生之时的执着就是病源所在,这是很清楚的。这些病人常在梦里召回其创伤所产生的情境。”^[15]²¹⁶创伤受害者不断地在梦中复现创伤事件发生的情境,这是因为当时他未能充分应对该事件的刺激。受害者反复地受到梦魇的侵袭,精神出现分裂便不可避免。在弗洛伊德的分析基础上,创伤领域研究的先驱者不断地分析“战场官能症”和“炮弹综合症”的病理特征,经过反复的临床实践,认为创伤具有自己独特的症状特征:它的发病方式一般体现为噩梦、回忆、行为失常。创伤‘记忆’并不隶属于通常的叙述或言语的回忆机制,相反它表现为身体的感知、行为上的重复、噩梦和重现(flashbacks)。受害者的本我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控制,他完全被过去的惊悚和恐怖所控制,不停的重复某些莫名其妙的行动与行为。受害者被过去的惊吓的事件控制后,“过去的恐怖事件以意象和思维的方式重复地占

有经历这些事件的人。”^[16]创伤批评研究的先驱柯尔克和哈特也认为“创伤一个显著特征是以噩梦、重现和躯体的重复行为的方式对创伤痛苦元素的强迫再经历”^[17]。由上所述,不难看出,创伤批评强调文本世界中人物不停地重复某种思维、行动和语言所控制。据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文本人物反复呈现某种反常地思维、行动和语言,这才使得创伤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运用。

三、结语

创伤批评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西方文论发展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色:消化、吸收结构主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等经典文学理论资源,结合时代具体情境,强调这些理论中被忽视的某些概念和原理,并加以推演和阐发,形成新的理论。创伤批评既立足于弗洛伊德的创伤概念,又融入了记忆理论的一些研究理念和方法,同时针对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问题,提出了新的研究理念和范式。尤为可贵的是,创伤批评坚持不懈地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发展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研究模式,例如“证词研究”和“代际创伤研究”。

虽然创伤批评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如何突破目前的研究局限,更大程度地领会创伤批评的精髓,这依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目前创伤批评已经引起了不少中国学者的关注,也产生了不少成果,例如李桂荣的《创伤叙事:安东尼·伯吉斯创伤文学作品研究》、苏忱的《在现创伤的历史: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小说研究》、王欣的《创伤、记忆和历史:美国南方创伤小说研究》等。同时,中国现当代学者也运用这一理论解读中国的伤痕文学,例如李敏的博士论文《“伤痕”与“反思”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除此之外,翻译创伤批评的理论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李敏翻译了英国学者安妮·怀特海德的《创伤小说》。但纵观这些研究实践,仍然明显存在两点不足:1. 创伤小说的叙述机制目前分析还不够深入,有待深化和加强;2. 目前创伤批评的理论译介明显落后于研究实践。我们至今仍然没有翻译创伤批评代表人物凯西·卡鲁斯和苏珊娜·费尔曼的经典著作。因此,研究创伤批评的缘起、翻译创伤批评的代表性著作,将进一步推动创伤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Cathy Caruth. Traumatic Awakenings [A].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C].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91.

- [2] 西塞罗. 论演说家 [M]. 王焕生,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 [3] 阿斯特莉特·埃尔, 安斯加尔·纽宁. 文学研究的记忆纲领: 概述 [M]//冯亚琳, 阿斯特莉特·埃尔.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4] Judith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1.
- [5] 阿莱达·阿斯曼, 扬·阿斯曼. 昨日重现——媒介与社会记忆 [M]//陈玲玲, 译. 冯亚琳, 阿斯特莉特·埃尔.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6]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 [M]. 毕然, 郭金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76.
- [7] Dori Laub M D. Bearing Witness or the Vicissitudes of Listening [M]//Shoshana Felman and Dori Laub M D.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2:59 - 60.
- [8] 刘易斯·科瑟. 《论集体记忆》导论 [M]//毕然, 郭金华, 译.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59.
- [9] James Berger. Trauma and Literary Theory [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97, 38 (3):570.
- [10] 苏忱. 再现创伤的历史: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小说研究 [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9:15.
- [11] Cathy Caruth. Introduction: The Wound and the Voice [A].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C].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3.
- [12] Sigmund Freud.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M]. translated by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London: W · W · Norton&Company, 1961.
- [13] Sigmund Freud. Moses and Monotheism [M]. translated by Katherine Jones. New York& London: W · W · Norton&Company, 1961.
- [14] 安妮·怀特海德. 创伤小说 [M]. 李敏, 译.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1.
- [15]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 [M]. 高觉敷,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216.
- [16] Cathy Caruth. Introduction [A]. Cathy Caruth.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C]. MD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151.
- [17] Bessel A, Van Der Kolk and Onno Van Der Hart. The Intrusive Past: The Flexibility of Memory and the Engraving of Trauma [A]. Cathy Caruth.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C]. MD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173.

[责任编辑:吴晓红]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高胜兵^{1,2}

(1.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2. 安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01)

摘要:“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关键词:翻译文学;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文化批评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2-0093-05

Cultural poetics of New Historism and cultural criticism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GAO Sheng - bing^{1,2}

(1.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great similarity between the relationship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and “original text” and that of “historical text” and “historical events”, the basic strategy for the cultural criticism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should absorb some unique theoretic quality from the Cultural poetics of New Historism – focusing on the diversities of translated text and original text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s. As a result, on the basis of diversities, the cultural criticism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aims to “revert”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original text by comparison, and tries to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the “diversities” in view of culture for one thing. Besides, based on the translators’ choice of original texts and translating strategies the criticism tries to analyze the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s. Such cultural criticism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three key elements (translated text, translator and translating event) with a strong awareness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as a subject.

Key words: translated literature; cultural poetics of New Historism; cultural criticism

目前,翻译文学已普遍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本质上属于文学范畴,所以我们可以参照一般文学研究的范式研究翻译文学。通常我们可以从语言、文化和审美三个层面进行文学研究,因此,对翻译文学的研究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进行。传

统的文学翻译研究——以文本为对象的文学翻译研究实质上是翻译文学的文本研究——就是侧重于对文本的语言和审美的研究,重点考察语言的“等值”、审美的“等效”;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作为翻译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3-10-28

基金项目:2010年度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文化诗学视角中的翻译文学研究”(2010SK205)资助

作者简介:高胜兵(1974-),男,安徽枞阳人,在读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译介学。

体系重要部分的翻译文学批评也越来越重视文化的层面。实际上,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是挖掘翻译文学自身独特价值的最重要的途径,因为翻译文学本身是不同文学、文化的中介,具有文化杂合性,它最重要的价值便是它能够成为人们研究对不同文化的理解、阐释及接受的理想切入点。本文认为,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应该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无疑能为翻译文学史的书写充实史料,使翻译文学史发挥不同于一般文学翻译史和外国文学史的价值,能成为真正的文学文化交流史和文学文化互动史。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概念源于新历史主义后期,1986年9月4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英文系教授斯蒂芬·葛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在西澳大利亚大学作了一篇《通向一种文化诗学》(Towards to a Poetics of Culture)的演讲,提出了“文化诗学”(the Poetics of Culture)概念。由此,“文化诗学”开始出现于文论界,后来在中国有人就把葛林布拉特倡导的文化诗学称为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以此来区分国内以童庆炳为主要代表所倡导的中国派文化诗学^[1]。新历史主义主要从文学的接受和阐释角度来解读文学,试图通过所有文本来“重构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网络”,但同时也承认“任何历史构建都混杂着阐释者的个人色彩”^{[2]674}。实际上,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就是借助了文化人类学的“厚描法”,借助于文学文本或广义的社会文本而进行的一种文化研究。在文学研究中他们主张引入对“文本的历史性”(historicity of texts)和“历史的文本性”(textuality of history)的双向关注^{[2]680}。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理论品质就是特别强调“历史文本”与“过去的历史”具有不可忽视的差异,而且强调文本的阐释者总是难以完全逃脱自己的主观意识。这种认识对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具有很大的启迪性。

一、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观照下的翻译文学

正常情况下,有责任心的译者总是尽最大的努力忠实地传达源文中的所有信息,这也是翻译本身应该具有的特点和基本功能,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译者往往会受到“不可译”的困扰,总是要受到自身“视域”的干扰,于是,在译本中,即翻译文学作品中,(文化)信息的缺省和增补不可避免,译者主体性导致的具有“创造性叛逆”特征的“误读、误释”不可忽视。这种认识犹如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历史观”一样,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建立在大小文本之上的,具有“文本性”,它们不能客观真实地得到完整的再现。例如,认识历史的主要来源——历史文献总是要烙上编撰者的主观意识,对历史事件的选取完全取决于以符合某种意识形态而导致编撰者对历史“情节编排”的需要。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能使我们从新的角度认识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文学。翻译文学的源文可以说就是“过去的历史”,文学翻译也就是在书写——理解、阐释——这“过去的历史”,这样翻译文学作品就成了“历史文本”。

葛林布拉特的《<文艺复兴自我造型>导论》向我们坦陈了他研究文艺复兴时英国文学的方法:“对文学文本世界中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存在之于文学的影响实行双向调查”而完成“阐释任务”。他补充说道:通过阐释“不可能完全重新建立并且重新进入(英国)十六世纪的文化”,而且“一个人在这种阐释工作中是不可能遗忘自己所处的环境的”^[3]。同时他也坦言自己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时就是有目的地选取了一些材料。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在文学研究上具有的独特理论品质——一开始就强调了阐释者所处的环境,这种独特的理论品质对有“历史文本”特征的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来说应该同样重要。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强调阐释者所处的环境,主要是指社会权力运行机制和社会的意识形态,这种环境会直接导致阐释者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从而用于阐释某种特定历史文化的文本与“真实”有了误差,最终要么巩固当时的社会权力运行机制或社会意识形态、要么削弱或颠覆当时的社会权力运行机制或社会意识形态。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不要因为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强调了“历史的文本性”而认为它完全否定了

历史的可再现性,这是因为它同时也没有无视“文本的历史性”——“所有的书写文本——不仅包括批评家研究的文本,而且包括人们处身其中的社会大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具体性,镶嵌着社会的物质的内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认为历史是可以再现的、可以认识的,只是相对更准确的认识需要在对各种大小文本的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因此,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基本的理论主张可以完整地表述为:历史的文本性,文本的历史性。这里如果我们把“历史”换成“文化”,那么我们能得到这样的论断:文化的文本性,文本的文化性。这种视文化和文本具有同一性的观点,实际上是和卡西尔的文化符号学对文化的界定是一致的,因为文本本身就是有机的符号系统。这种观点也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文学观的理论基础,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视文学为整个文化符号系统中的一部分,认为“文学所指涉的是外部世界,所吸纳的是社会价值体系,所承载的是多重文化符号,因此文学的本质是其文化性。”^{[2]674}在翻译文学的语境下,在这种视文学的本质特征为文化性的文化诗学观照下,我们不难理解,源文和译文都内含了特定的历史文化元素。

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观照下的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主要从文学的接受和阐释角度来研究文学,特别强调“历史文本”与“过去的历史”具有不可忽视的差异——这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在文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理论品质所在,而正是这种认识最符合翻译文学作品与源文学作品之间的实际情况。由此,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应从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新历史”史观中得到启迪,使其基本批评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的差异,然后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穿梭于文学文本内外进行综合的文化研究方法:一方面“沉降入细节”,考察译文对源文中的文化信息的理解与阐释——通过对比“还原”源文中的文化意蕴;另一方面从宏观上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分析译文的形成和接受的文化原因以及译文与源文存在“变异”的原因。

(一) 文化比较(关注对他者文化的理解和阐释)

因为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批评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的差异,所以这种批评特别关注翻

译文学文本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与误释。通过文化比较,不同程度地“重构”源文文本中的历史文化元素,这样既有助于“不可译”的文化元素得到阐释,也有助于不同文化元素的“译名统一”,还有助于对文学文本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

例如英美文学中的“milky way”和中国文学中的“银河”的文化意象,以及“dragon”和“龙”的文化意象便是在翻译家们和翻译文学研究家们共同的努力下得到的全面地阐释。“milky way”和“银河”在天文学上它们是对等的词汇,但是在文学里它们的文化意象不同,前者出自于古希腊的神话,是聚居在奥林帕斯山的众神通往大地的“路”,而后者出自于中国民间神话故事,是分隔牛郎与织女的“河”;“dragon”和“龙”原本不是对应的词,只是后来的翻译——应该说是误释(误译)——使它们成为了对应词,但是它们的文化意象恰恰相互冲突,前者是一种可怕的动物,具有邪恶的意象,而后者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具有超人的力量和神圣的意象。因此,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可着力于研究经典文学译本,特别是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的经典文学译本中的文化理解和阐释,甚至可以编写诸如“英汉圣经文化词典”、“汉英红楼梦文化词典”、“汉英水浒传文化词典”等等,这样,很多不可译的文化元素便可得到阐释和传播,不仅使文化元素的译名得到了统一,而且也使它们具有了可译性,从而有助于中外文化的互识与互融。

从理论上讲,对于任何文学作品特别是某一民族的经典文学作品,读者无法在它的某一译本中了解它所包含的所有文化内涵,即使本民族的读者对本民族的经典文学的理解也是要通过一些文学批评才得以深入理解的,在这一点上,利弗威尔(Andre Lefevere)的“折射理论”给了我们极大的启迪。利弗威尔认为,“对大多数人而言,讨论中的古典作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它本身的折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的折射。从小学校使用的选集里的漫画或大学里使用的文集,到电影、电视连续剧,……到文学史的情节总结,到评论文章,……我们对古典作品的感受就是由一系列我们已经熟悉的折射累加在一起组成的。”^{[4]101}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犹如一般文学批评、一般文学史一样可对源作进行解读与阐释使读者获得更多的信息,只不过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往往要从翻译文学的文本中找到突破口,找到命题。例如,作为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个重要的职责便是对文本中出现的

文化误读、误释现象进行研究和阐述。如人们对中译本《鲁拜集》及其他版本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很多学者对海亚姆及其诗歌进行过误读和误释,在中国研究者的视野中海亚姆是一个具有强烈反叛意识的无神论诗人、恋酒诗人,而波斯诗歌则大都是“美酒+美女”的艳丽爱情诗。实际上海亚姆是一位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诗人,即苏菲派诗人,而诗中的美酒和美女则是苏菲诗人习惯采用的隐喻方式。这里误读和误释主要是由于对伊斯兰教文化背景缺乏足够的了解和大多数中译本译自英译者费茨杰拉德的英译本,而这个英译本由于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已出现了不少误读和误释^[5]。很明显,通过这样的文化批评,我们对《鲁拜集》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便有了更加准确、更加深入的了解。

(二) 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互动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要求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特别重视考察译文中出现“误差”的原因,往往追溯到文学翻译活动中译者——也可理解为阐释者——所处的社会权力运行机制和社会的意识形态。这样的考察研究与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一致,既探讨翻译文学生成的环境,又探究翻译文学对文化构建的积极或消极的作用。

首先,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关注翻译文学的生成环境。例如考察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的生成环境,我们可以发现社会权力运行机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对翻译文学的生成制约很明显。近代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和《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对于社会变革的重要性,鲜明地体认了文学的社会功利性思想,由此促进了近代对西方小说的大量译介。其次,建国后的50—70年代社会权力机制和意识形态对翻译文学的生成的制约表现得也突出,那时中国刚建立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为了自身的建设和巩固以及由于当时思想的“左倾”,新中国从苏联引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概念,而后执行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学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学批评标准,这些意识形态决定了那一时期的文学翻译主要是译介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以及其他国家一些揭露资产阶级黑暗的现实主义文学。

其次,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也包括考察研究翻译文学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塑造,即考察翻译文学怎样参与了构建新文化。此类文化批评实际上是考察对翻译文学接受的效果。众所周知,“五四”

新文化、新文学的构建与中国二十世纪初大量译介西方小说密切相关。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五四”新文化干将鲁迅,因为他的思想和他的创作“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6],而他特别热衷于林纾的翻译文学,“只要他(指林纾——引者注)印出一部,来到东京,(鲁迅)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4]^[7]。即使到当代,翻译文学影响还是很大。当代先锋派小说家余华曾感言“像我们这一代的作家开始写作时,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翻译小说,古典文学影响不大,现代文学更小。我一直认为,对中国新汉语的建设和发展的贡献首先应该归功于那群翻译家……”^[6]。上文提到的我国上世纪50—70年代对无产阶级文学大量的译介实际上也构建了中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和文化思潮,对改革开放前全国人民政治激情的催生作用不可低估。

(三) 译者主体性研究

如果说翻译文学文化批评中的文化比较主要基于文本的批评,文化互动研究主要基于翻译活动的批评,那么译者的主体性研究则主要基于译者个人的批评。这三种批评方式立足点各不一样,只有囊括了这三种批评方式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才是完整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作为翻译文学文化批评的一种方式,译者的主体性研究认为任何译者都是文化的产物,他们对源作的选择和翻译过程中对翻译策略的选择都具有文化意义。

译者对源作的选择往往和时代的文化精神分不开。例如近代梁启超倡导并身体力行翻译政治小说,一方面是他个人政治改良信念的体现,另一方面更是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需要政治变革的时代特征;林纾对源作选择的盲目性一方面反映了他个人及当时国人对外国文学的有限认识,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对异域文学文化渴求的时代精神;后来抗战时期的反法西斯时代主旋律和建国初期“政治第一”的时代精神都体现在人们对源作的选择之中。到了当代,翻译家们在选择源作时更多的是反映中外文学文化交流不断深入的时代特征,如季羨林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丰子恺翻译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等。

译者的翻译策略可分成“归化”和“异化”两种,归化是译者迁就译入语文化的表现,而异化表现出译者对源语文化的尊重。《红楼梦》是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杨宪益、戴乃迭的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和霍克思 (David Hawkes) 的 *The Story of the Stone* 两个《红楼梦》英译本, 引起了不少讨论。张南峰比较了两个译本的翻译策略^[7], 向我们展示了两译本中的文化改写。他认为“这两个译本是在不同的文化里为不同的目的而制作的, 受不同的规范支配……”, 霍克思的翻译策略倾向于可接受性——“归化”, 而杨宪益的翻译策略倾向于充分性——“异化”, 两个译本实质上都是译者在一定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对原文进行的“改写”, 特别是霍克斯译本“改写”更为明显。他不仅改写了源文中的性描写而且改写了贾雨村和焦大的人物形象。这实际上改写了源文中体现的中国文化, 因为源文中对性的保守地描写是真实地再现了传统中国主流文化对性的保守甚至忌讳; 源文中贾雨村受谴责是真实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 要求知识分子具有“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及天下”的人格; 源文中焦大受到了同情是真实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忠”、“仁”、“义”等文化内涵。

三、总结

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研究, 有利于不同文化间的互识、互动及互融。参照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应以“差异”、“社会环境”和“译者主体性”等为切入点, 关注文化交流中的两个基本方面: 一方面关注译本中的“误读”和“误释”现象, 以比较和阐释的方式“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 因此有利于人们对其他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同时也有利于世界文化多元性的发展; 另一方面它关注译本的形成和影响, 以事实为基础阐释不同文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互融规律, 它使人们能深刻地感知到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出现的碰撞和融合现象, 最终使人们对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有理性的认识并作出明智的选择。例如, 《迦因小传》在译入我国时最初的译本不是全译本, 而且内容改动很大, 后来林纾的全译本相对来说更忠于源文, 但是当时人们却偏爱于最初的节译本而批判林纾的译本, 究其原因节译本“迎合”了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 而全译本“违背”了中国道德文化的传统。今天看来, 这两种译本都有它

们自身的价值。节译本起着先导作用, 引导当时的人们把目光投向于异域文学文化, 而全译本因为“更忠实”, 所以能让人们看到更加真实的异域文学文化, 特别是西方的道德文化。通过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 我们一方面可以对译作中的“忠实性”有更理性的认识, 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得到启迪: 根据译入语的社会环境和翻译的目的, 我们在进行文学翻译时应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

本文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具有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展开的: (1) 关注翻译文学文本中文化“误读”、“误释”; (2) 关注翻译事件中的文化互动; (3) 关注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无疑能为翻译文学史的书写充实更多的史料, 使进入翻译文学史中的翻译文学作品、翻译家和翻译事件都具有一定的经典意义和历史价值, 同时使翻译文学史发挥不同于一般文学翻译史和外国文学史的价值, 能成为真正的文学文化交流史和文学文化互动史。

参考文献:

- [1] 余艳. 中国派文化诗学的特征及其学科意义[J].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38(5): 818 - 820.
- [2] 陈蓉. 新历史主义[M]//赵一凡, 张中载, 李德恩. 西方文论关键词.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 [3] 赵一凡. 文艺学与新历史主义[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80 - 81.
- [4] 谢天振. 译介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5] 姑丽娜尔·吾甫力. 译者的误读与误导——以欧玛尔·海亚姆诗歌的翻译为例[J]. 中国比较文学, 2006(3): 128 - 140.
- [6] 王宁. 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6.
- [7] 张南峰. 中西译学批评.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215 - 217.

[责任编辑: 吴晓红]

对文学翻译中的交互主体性再认识

孙 艳, 王 凯

(淮南师范学院 外语系, 安徽 淮南 232038)

摘 要: 学界对于当前文学翻译中的交互主体性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对文学翻译中的交互主体性内涵进行了分析, 认为应该赋予其“社会环境”主体性特质。在此基础上探讨广义的文学翻译过程中原作者、译者、赞助人、译文读者等有生命要素和接受环境、文本等无生命要素之间的多元翻译主体关系, 从而为界定翻译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提供支持, 建立翻译主体间正常的交互关系。

关键词: 非生命要素; 社会环境; 主体性; 交互主体性; 文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 H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 (2014) 02-0098-03

On intersubjectivity i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UN Yan, WANG Kai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uainan, Anhui 232038, China)

Abstract: As there is certain limitation with the academic circle's current knowledge about the intersubjectivity i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subjectivity of social environment, discusses the communicative behaviors among various subjects such as people (the author, the translator, patronage, target readers) and the non-life elements (reception environment,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target text), which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different elements and guides for literature translation.

Key words: non-life elements; social environment; subjectivity; intersubjectivity; literature translation

随着西方哲学由主体性研究向主体间性研究的转向, 国内译界对“翻译主体性”研究也逐渐深入, 并于20世纪初将“主体交互性”概念引入国内翻译领域。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整个翻译活动不能只停留在译者主体性上, 而应该转向对译者、读者等多重主体交互的研究, 即“翻译的主体间性”研究。但是无论是对翻译的主体研究, 还是对翻译的交互主体性, 亦或是翻译中的主体间性研究, 大多是围绕“人”来展开, 几乎未提及在文学翻译中社会环境等非生命要素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及其与译者、读者、原作者等有生命要素多重主体间的交互。而对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的交互性, 也基本都是以译者作为核心主体, 对于其他主体之间的交互研究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此外, 对各主体间的互动研究较多停留在理论层面, 论及译文的较少, 因此很有必要继续深入研究。

一、文学翻译中的交互主体性内涵

对于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的认识, 国内译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

一是把翻译的交互主体性理解为参与翻译活动、作为主体的人的交互性, 如杨恒达^[1]、许钧^[2]、梁淑梅^[3]等着重强调了译者、原作者和读者三个主体间的平等对话; 王湘玲^[4]、罗丹^[5]等在肯定这三个主体的交互前提下又补充了译者与赞助人和翻译的评论者的双向交互关系; 而宋晓春^[6]则研究了译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译者与文中人物、译者与翻译发起者之间的双主体间关系。可见, 不少翻译研究者认为只有“人”才能构成翻译的主体, 对交互主体性的研究也都是停留在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层面上。但是“只有人才能构成翻译的主体”这个观点早自黑格尔开始就受到了批判。主体应该是“一种具有能动性的因素或者是力量”^[7]。而

收稿日期: 2013-11-20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2011SQRW115); 安徽省高校省级科学研究项目(2011sk373)资助

作者简介: 孙艳(1981-), 女, 安徽凤台人,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能动性指“对外界或内部的刺激或影响作出积极的、有选择的反应或回答”。因素或者是力量不是仅仅指人,而对外界或内部刺激作出反应或回答的也不一定是人,包括一切参与整个翻译活动的要素——文本和社会环境。

二是把翻译的交互主体性理解为有生命的主体和与无生命的文本之间的交互性。如郑耀军^[8]探讨了原作者与原作和译者、译者与译文读者、译者和赞助者的主体间性;李明^[9]阐释了原文作者、译者、读者、复译者、原文、译文、复译文本6个因素都是文学作品的主体;方兴^[10]认为,交互主体性是人与人、人与其共享世界的交互性,并用戴维森语言交流的“三角测量”模式具体分析了译者与原文作者通过文本实现互动,从而肯定了翻译不仅涉及“人”,还涉及原语文本、译本等非生命要素的作用。

事实上,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是指两个或多个主体的交互关系,是涉及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活动,是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认同、平等互动。方兴^[10]指出,“语言交流是一种涉及交流者及其话语论及的世界的活动,成功的语言交流需要这些因素的共同参与。”根据该提法,那么,我们可以说文学翻译也不再仅仅指有生命的人——读者、原作者、赞助人等的活动,也不是仅仅指有生命的人和无生命的文本之间的活动,而是翻译中各主体包括人和话语论及的世界(文本和社会环境)等以参与者的态度、以平等的身份相互作用的活动。早在1999年,谢天振教授在《译介学》一书中就指出,“通常以为,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主体仅仅是译者,其实不然,除译者外,读者和接受环境等同样是创造性叛逆的主体。”^[11]常晖、黄振定^[12]在西方“主体间性”理论的指导下梳理了3个有生命要素,如原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以及5个无生命要素,如原文、译文、原文化、译者文化和译文读者文化这8个翻译要素,并把它们都视为相互作用的主体。在这里,“译者文化和译文读者文化”指的就是社会环境。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对译者与客观要素的具体互动课题没能完成,且缺乏具体译例进行阐释。此外,无论是探讨人的主体间性,还是探讨人与无生命要素的主体交互性,以上所有文章都把重点放在了两个主体的双向交互上,未系统论述多重主体的交互。所以这将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文学翻译中各主体之间的交互性体现

文学翻译具备三个特点:创造性、叛逆性和制约性。这三个特点强调了“译者”在自己意愿选择或受出版商和赞助人的委托之下,通过对“原文”的理解与“原作者”进行沟通,受“原文本”和“原作者”制约的基础之上作出的对“原文”的创造和对“原作者”的背叛,从而使“译文”符合译入语“读

者”的期待视野,顺应译入语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开始出现文化转向,翻译活动不再是两个语言之间的转化,而是涉及到两个文化之间的交流。根据这一发展趋势,结合“交互主体性”理论,我们可以判断:文学翻译是多个有生命的翻译主体受社会环境的制约,通过无生命文本的交流而进行的翻译活动,是多个主体交互的文学活动。针对这些要素之间的交互关系,我们可从以下三组多重主体交互进行详尽论述:

(一)以译者为纽带,实现译者与原作者、原文本和译者所处社会环境的交互

译者对文学作品的翻译不是任意、想当然的,而是先要对文学作品进行选择,选取与其禀性、脾气相投的作者的作品。只有这样,译者才能感同身受,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分析透彻,深刻体会原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所要传达的真实情感。以杨宪益版的《老残游记》为例。杨宪益(1915-2009)选择《老残游记》的原因在于:首先,他了解了原作者刘鄂(1857-1909)的出身背景、教育经历、性格和意识形态倾向与他非常相似;其次,杨当时所处的时代正是处于长期的腐败统治之下,而刘鄂创作此作品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也正是封建王朝统治即将灭亡的前夕,所以他可以通过对原本文人物和情节的解读,深刻地体会到刘鄂借此文章“抒发他对晚清的衰败、人民的苦难和自己不得志的痛苦情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清官’的万分憎恶和无情揭露”的思想价值,从而采用了较尖锐的翻译风格,实现了对原文的真正理解。此外,原文本中的主人翁“老残”正是早年学医、悬壶济世的刘鄂自己的真实写照。杨宪益通过该人物加深了对刘鄂的了解,实现了与原作者在心灵上的沟通和共鸣。而杨的教育背景和知识背景也赋予了他欣赏该小说所呈现的艺术价值的的能力,实现了他与原作和原作者的互动。

不仅如此,杨宪益所处的社会环境又能帮助他更好的发挥其主体性。如在翻译“目下鄙人要往济南府去看看大明湖的风景”一句中,受中国意识形态的影响,深刻体会到“府”在过去的中国就是指某个省的省会,所以在翻译时直接对“府”进行删减,只保留了“Jinan”的地名,从而实现了他与所处社会环境的沟通和互动。

(二)以译者为纽带,实现译者与原作者、原作、出版商和译者所处社会环境的交互

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曾指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操纵文学翻译的三种主要力量。表面上由译者做出的对原文的创造性叛逆其实是译者在社会环境中的各种要素,如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以及社会文化等规范的支配下被迫做出的,

是社会环境中的各种要素迫使译者做出的创造性叛逆行为。其中赞助人主要指“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止、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13]赞助人大致分为三类:在某个特定时期具有影响力的个人、与出版公司有关联的出版商和媒体、影响文学和文学思想传播的机构。中国的文学翻译家,大多数都是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文学原作进行翻译,这类翻译所体现的译者的主体性和自由度较高,译者都能从自己的审美情趣和社会环境的需求出发,根据自己的翻译标准对原文进行保留或删减。而当赞助人为出版商和机构时,译者进行的翻译所体现的译者的主体性和自由度相对较低。译者为了让自己的译作被出版社出版,与译文读者进行交流,对原文的翻译必须受制于出版社的翻译指令,得到出版社的认可。举英国小说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译本为例。作为英国比较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之一,《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被多次翻译成中文,其中在中国比较有反响的就是赵苏苏受人民出版社之邀重译,并于2004年出版的版本。此版本与其他版本相比,之所以受欢迎、成为畅销书的原因就是译者在尽量尊重原作者和保持原文本风格、主题及完整、尽量做到对原文的客观还原的基础上,进行了有关性描写的删节,受到了代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机构和出版社的认可,顺应了译者所处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发展。

(三)以译者为纽带,实现译者、译本与读者和接受环境的交互

译者虽要受原文和原作者的影响和制约,尽可能做到对原文和原作者的“忠诚”,但是译者对原文的解读又不是带着空白进行的理解,而是有其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期待视野,同时还要考虑到译文读者和接受环境的接受问题,所以在翻译时会最大限度地做到对原作者和原作忠诚的同时又出现了有意识的删减和背离。如杨宪益在翻译《老残游记》时考虑到译文读者,即生活在发达国家的西方人对超自然力量无法理解和认同,而对原作中的第16、18、19章以及和20章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删减,因为他认为这几章节里提及到了一个与超自然因素有关的谋杀案,而这是译文读者和接受环境所不能接受的。再如林纾和魏易于1901年合作把斯托夫人的Uncle Tom's Cabin翻译成《黑奴吁天录》,大量删减了该作品中浓重的宗教宣传和人道主义成分,凸显了黑人的悲惨境遇。译者在此作出的对原作的背离正是考虑到当时中国读者群的期待视野和当时“中国的衰弱国力,中国劳工备受美国欺凌”的社会文化背景,旨在激发国人的爱国热

忱和亡国意识,振作国人士气,从而实现了译者、译本与读者和接受环境的互动。

三、结语

主体间性给每一个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合理的依据,从理论上解决了原作、原作者、译者、译本、赞助人、读者、接受环境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主体性的表现,超越了翻译研究中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揭示了人与人、人与物、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对象之间相互生成、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交互主体关系,为界定翻译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对于建立翻译主体间正常的交互关系,从而平衡和协调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起着非常有利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杨恒达. 作为交往行为的翻译[A]. 谢天振. 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97-106.
- [2] 许钧. 翻译的主体间性与视界融合[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3(4):290-295.
- [3] 梁淑梅,李媛媛. 从翻译的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J].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2):77-79.
- [4] 王湘玲,蒋坚松. 论从翻译的主体性到主体间性[J]. 外语学刊, 2008(6):107.
- [5] 罗丹. 从杨译《老残游记》看翻译中的交互主体性[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0(8):1-6.
- [6] 宋晓春. 论翻译中的主体间性[J]. 外语学刊, 2006(1):89-92.
- [7] 刘小刚. 创造性叛逆:概念、理论与历史描述[D]. 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69.
- [8] 郑耀军. 翻译的主体研究范式的新转向:从单一主体性到翻译的主体间性[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4):71-74.
- [9] 李明. 从主体间性理论看文学作品的复译[J]. 外国语, 2006:66-72.
- [10] 方兴. 从戴维森语言交流的“三角测量”模式看翻译的主体间性[J]. 外语学刊, 2011(3):117-120.
- [11] 谢天振. 译介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14.
- [12] 常晖,黄振定. 翻译“主体间性”的辩证理解[J]. 外语学刊, 2011(3):113-116.
- [13] Lefevere, Andre & Susan Bassnett.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17.

[责任编辑:吴晓红]

家政知识传播与女性的现代性身份建构

——以清末民初《妇女时报》为例

陈孝柱¹, 张芳²

(1 安徽理工大学 土木建筑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01; 2 安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01)

摘要:《妇女时报》是辛亥革命前后出版最久的女性报刊,也是第一份商办女性报刊。其办刊的持久性和商业性决定了它的影响力大而深远。回归历史语境,解读《妇女时报》中传播的家政知识内容,不仅可以看到当时妇女生活相对于传统妇女生活的转变和进步,而且可以从中得出当时女性已初具现代性身份的结论。这对研究辛亥革命这一社会转型期女性杂志中书写的女性成长与生活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和建设性意义。

关键词: 妇女时报; 家政知识; 女性; 现代性身份

中图分类号: G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2-0101-04

Study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housekeeping knowledge and females'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a case study of Women's Tim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CHEN Xiao-zhu¹, ZHANG Fang²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 Architecture,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Women's Times is the longest newspaper published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the first commercial female newspaper. The persistent and commer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newspaper determine its profound and lasting influence. Returning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housekeeping knowledge disseminated in Women's Times, not only ca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progress of the women's life be seen in comparison with traditional women, but also the conclusion can be reached that the females since then have possessed initial modern identity. This paper is of great modern and constructive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females' growth and livelihood written in the newspapers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the Revolution of 1911.

Key words: Women's Time; housekeeping knowledge; females; modern identity

一、引言

自戊戌维新中国第一份《女学报》问世,妇女报刊的创办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掀起了高潮(第二次高潮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改良与进步,女性自我意识不断觉醒,并在各领域彰显出来。妇女报刊的日益增多,这一典型书写女性话语的园地为女性传播了各种思想观念,主体经验和科学知识。随着革命的进行,妇女运动也日益高涨,女性的声音越来越大,传得越来越远,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听见、思考、接受或批判。千百年来,生活在男人

背后的“她”悄然地走到了历史舞台的前面,书写着自己的青春、人生和历史。在多领域里展现自己的身影。然而,不管她怎么“运动”,都离不开最能体现她“价值”的家庭。封建社会里的女性,生活社会最下层,承担着繁杂的家务劳动,而其价值却无从体现,也不被承认。当西方意识形态侵入,知识妇女增多,妇女已经开始觉醒,且觉醒的声音不断放大,通过报刊杂志传播到全国各地。

救亡图存的近代语境下,女性身份重建成为重要的社会议题,这不仅涉及知识精英对现代文明国家的政治想象,亦关涉强国、强种的国家利益的实

际考量。如何建构女性身份,建构女性怎样的身份,女性报刊其实对此多有探讨。出版于辛亥革命前夕的《妇女时报》刊载了大量有关家政知识的论述,在此类论述中女性的家庭身份得到肯定,并强调女性家庭身份的现代性价值,因为家庭的良善与否直接关系国家的强盛衰败。由此观之,通过对《妇女时报》家政知识论述的梳理可较为清晰的显示清末民初知识精英对待女性身份的期待,以及女性自我身份的表述。

《妇女时报》在传播家政知识同时,亦表达和塑造了那个时代妇女生活状况,力图为广大读者提供借鉴和模仿对象。本文通过对《妇女时报》传播的家政知识的微观解读,试图从中分析:一是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表达出《妇女时报》中家政知识的传播倾向;二是《妇女时报》是怎样通过家政活动中“家内人”表现出女性现代性,实现这种身份建构的,即怎样从“贤妻良母”变为“新贤妻良母”的。前者仍然表现女性“家内人”身份的重要性,所以女性要以家庭为依托,要熟知各种齐家治家的方式方法;后者表达女性已不再是以家务劳动为主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接受学习和实践家政活动的主人。因此,即使仍是“家内人”,却逐步具备了“现代性女性”的特质。

二、《妇女时报》创办及其内容特色

《妇女时报》1911年6月11日,创刊于上海。现见到21期,第二十一期是1917年5月出版的。《妇女时报》由狄葆贤主办。停刊时间和原因不详。原定为月刊,但从未按期出版,实际上成了不定期刊。主要撰稿者有:汪杰梁、江纫兰、吴征兰、无用、朱慧贞、星一、钱蕙兰、冰心、汤修慧、汤剑我、恽代英等。十六开本,封面为彩色妇女图画,卷首及插图均为铜版精印,每期有数十种之多,每册一百多页,约五六万言^[1]。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报刊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革命派办的妇女报刊,它们大多把妇女解放与民族民主革命结合起来,鼓励妇女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实行民主共和的同时,争取妇女自身解放。……另一类是属于社会改良主义倾向的,其内容多为单纯提倡女学,开通女智,讲究女德,尊重女权和反对缠足等为主旨,着重于对妇女传播知识,进行启蒙教育。……《妇女时报》就是这一类妇女报刊的代表。”^[2]¹⁷⁶⁻¹⁷⁷《妇女时报》在第二期《本报征文例》里明确提出“以提倡女子学问,增进女界智识为宗旨”,以此看出本报的社会改良主义倾向。

《妇女时报》产生于社会转型期,所以也随着历史经历了诸多曲折。办报时间没有预期的固定,除了前两期能“月出一册”,后来常出现拖刊现象,其第16期至第17期出版间隔长达九个月之久^[3]⁴¹。等到第21期,毫无停刊迹象时,却无故停刊。由此来看,办报之艰难可想而知。尽管如此,

它却是一份充满理想和先进性的报刊杂志。本文将从其传播的大量的家政知识为切入点,全面梳理,并结合理论进行分析和探讨,从而总结出《妇女时报》的家政知识是如何构建女性现代性身份的。

三、《妇女时报》传播的家政知识

(一)形式多样

1. 图片

(1)封面

《妇女时报》是第一份商办女性报刊,也是首次采用封面仕女画的女性杂志。其封面继承了清末仕女画画风,封面仕女一概白嫩细腻,面庞丰腴。同时受20世纪初月份牌画法的影响,成功借用肖像画及照片着色的淡彩擦笔画,通过形体、包装、色彩、背景、道具等综合设计,创造出近似彩照的视觉效果来表现女性形象^[4]。

与传统仕女画相比,《妇女时报》的封面仕女画作为新媒介的“眼睛”进入日常消费领域,以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为原型,以吸引读者为目标,受画家和编辑的共同影响,是一种文化商品。又因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导致封面仕女画中的女性形象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中西结合的基本形态,充满了过渡时期特有的矛盾特质。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开始了现代性进程,即丧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工程^[5]。这是《妇女时报》采用封面仕女画的最为广阔和深刻的背景。封面女性绘画形象通过一些富于现代意味的服饰、姿容、道具及空间,展现了清末民初上海中上层社会女性的现代生活方式、人理想及性别观念,塑造出现代女性的群像。并通过虚拟和超前的想象为读者提供了模仿的空间,进而促进女性现代性进程。

(2)内页

作为第一份大规模连续刊登女性照片的《妇女时报》,内页的女性照片有着较强的现代感。表明现代女性媒介视觉形象从绘画向摄影的转型。在258张中国女性照片中,有现代特征的传统才女,有走进社会的职业女性,有戴着荣耀光环的女学生,还有走出家庭的女性集体。与《妇女时报》的封面仕女画相比,这些女性照片在技术和内容方面都富有现代感,是女性摄影形象在现代媒体中的初次露面,结束了此前女性形象唯一的存在形式——绘画,这些女性形象意味着现代女性媒介视觉形象的转型^[6]。

2. 文章

(1)自撰稿

汪傑樑为本报家政知识撰稿较多的作者之一。后文将具体论述她所作的文章中传播的家政知识及其意义。

(2) 外文译稿

国门大开,“欧风墨雨”的思潮也随之而来。西方的文化、思想,包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家庭观念等等,都对国人形成冲击。台湾邱俊明《“家有贤母,室有良妻”:〈妇女时报〉(1911-1917)家庭教育讨论初探》文中引述:“有的作者引国外事例为家政改良必要性背书。以美国总统林肯夫人为例,即便尊居高位,依旧‘精明家政学者也’。”^{[3][45]}

无可否认,西方积极的家庭意识和态度,然而富于追求,敢于担当,责任感和使命感,却是当时社会所吁求的。这对家庭生活久已单调沉闷的国人而言,可谓眼界大开,耳目一新,因此纷纷效仿,中西结合、洋为中用,因之也不乏较好的家庭生活模式。

(二) 内容丰富

《妇女时报》传播的家政知识可以概括为育儿知识、产妇经验、财政管理、饮食卫生、家庭组织与管理、裁缝学、家庭医学、生活方法等等。其中本文将重点阐述以下具有代表性内容:

1. 家庭组织与财政管理

如《2 家政精明之我妻——19 妩云(译日本稿-)》,这篇译稿是日本药学博士长井长义氏与其夫人德兰瑞结婚25年得银婚式的自述,举例讲述其妻的家政经历。因为其妻是西洋人,嫁于日本有许多风俗习惯不适应。由于雇佣是婢女没有责任感,所以“非一一由主妇指挥,必有失漏或错误等弊。”且夫人言语不通,所以沟通更加困难,并常闹出笑话。博士长又述因为自己出国留学,欠债“四千元”,而夫人到了他家后,没过几年就把负债还清了,“可见夫人经济法之巧也。”^[7]

2. 饮食与卫生

如《2 熟食新谱——76 淑静》,南征菜之制法,即泡菜的做法,从其来源、特色、配料、制法等方面一一解说,详细实用,做法简单易学,且做成之菜,清脆可口。“其妇女之能制者,无贵无贱。十人而九,并可用以饮客。”同时可以解腻下饭^[8]。关于卫生,《2 妇女之卫生——15》谈到吃剩饭有害身体健康,是疾病之源,不易食。粉脂香料有害皮肤,不易涂。夏天的水果腐败后不易食,常吃西瓜有益。夏天屋内要洒消毒液,以防蚊虫^[9]。

3. 育儿知识与产妇经验

如《2 小儿保育法——35(家政学之一)汪傑樑》,分别透过饮食、衣服、居住讨论养育小儿注意事项。饮食上母乳为优,若需引用牛乳,则应注意两点,一是牛奶以晨榨为先,注意防腐;二是应随小兒年岁稀释牛奶,避免乳糖过多伤害小兒肠胃^[10]。透过科学化、专业化的描述与专有名词、精准量词的使用,显示育儿渐渐成为一专门学问。也唯有注意这些知识并加以实用者,才是称职母亲。同时透过女性育儿经历,强化妇女在民国飘摇之际,养育新国民乃责无旁贷之事,并透过此类方式强化其

“国民母”的身份认同。

通过富有知识性、科学性、现代性家政知识的传播,可见两性在知识面与执行面上改良家庭生活的企图,使治家理财、育儿、饮食、卫生方面等皆能符合科学与卫生原则。可以说很多知识对今天的生活都有借鉴意义,包括很多方法至今仍然适用。

四、家政知识与女性现代性身份建构

(一) 家内人身份

妇女在封建社会里被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压在社会的最低层。封建礼教则是这四种权力的集中表现。其中束缚妇女的礼教是:“夫为妻纲”和“三从四德”^{[2][14]}。

唐代以前,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相对地说,尚不十分严重。宋、明以后,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越来越严重,到了清代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封建礼教主要是通过封建妇学即妇女教育来宣传和推行的。所谓妇学主要是对妇女进行“三从四德”的家庭教育^{[2][15]}。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下,女性主要是家庭服务的提供者,家庭经济的管理者和家庭消费的实现者。女性的角色主要定位在“家庭妇女”上,她们虽然贡献了劳动成果,但是仍然被看做是“消费者”,而非劳动者,她们是家庭的附属品。在以生产为中心、物质匮乏的时代,女性的“消费者”身份并不是一个荣耀的角色,她们的地位依附于男性和家庭。

“家内人”这个角色并非女性所需要,“新贤妻良母”也只是传统性别文化在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的变体而已。所以,在家庭中的女性现代性仍然是受到制约的。于是女性通过家庭和报刊来表达自身需要,但这又要求女性要有较强的自觉性并形成一定的社会声音和有效话语,以及掌握传播该话语的主动权。《妇女时报》则为其实现了这一要求。

我们可以看到,妇女作为家庭主妇的角色是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走进学堂,走向社会,走上政治舞台,融入男性社会圈子中,虽然当时这些角色还不多,但相对于以前局限于家庭的女性,她们已经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我们又怎能不去质疑,在男性仍是社会活动主体时,女性参与不过是在男性操控下的棋子而已。只是男人们没有预想到不可控力,使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一发不可收拾。直到今天,我们虽不能说妇女已完全的解放和获得了同男性一样的权力,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无数仁人志士,女中豪杰,为了女性同胞的解放而做出的牺牲和努力。

(二) 现代性身份

用现代文明知识来武装女性,表现着一种当时社会对女性身份的印象和建构

1. 女性身份转变的原因

(1) 社会环境,需要“贤妻良母”,强国强种,保家卫国。(男性放权)

如《2 女子之学问与时代之要求——28》,“故女子必欲与男子相同,反互相无益,不如互补所短也,妇人总以接触家庭空气为第一。”^[11]说明不提倡女子学问,女子要以家庭为重。

(2) 国际因素,西方价值观倾入,妇女运动波及和先进知识影响。

如《林肯之家庭生活》,以美国总统林肯夫人为例,即便尊居高位,依旧“精明家政学者也”。清晨即起,“自此室至彼室巡视一切”,琐细家务“亦一一躬自审查”。闲暇则“好浏览报纸,阅报精细异常也。”^[12]

(3) 自身因素,女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妇女解放和提高。

如《13 进化学上之妇人观——1 冰心》,“由此以迤入校时代,中间数载之光阴,依依于母之膝下,耳濡目染之家庭教育。是则子女所为之事业,亦即母之事业也。”^[13]

2. 地位上升后的女性

在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女性地位在家庭和社会中都获得相应提升。当然,客观因素虽然推动了女性地位的变迁,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客观因素致力于宣扬女性学习新知识,参加政治活动等,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妇女地位、实现女性解放和两性平等。而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不希望妇女,家庭成为男性的拖累,对妇女界的教育,提倡均是为了教育下一代和帮助丈夫更好的实现“保国强种”的愿望,却间接的促进了妇女的成长。传播者会不断重复强调“贤妻良母”角色的重要性,从而使大多数人认可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在当时是被充分肯定、认可和宣扬的。笔者想要传播和表达的是“现代性”文化,这些被传播的知识,一定是要符合当时社会声音的。

总体上看,女性的地位是上升的,女性的主体性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同时我们应看到,在家庭生活中,女性同时拥有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女性被看做是家庭活动的主体,是组织和管理者,另一方面,女性又被看作是家庭任务的承担者和执行者,而丈夫则是领导者。一方面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寻找着自我,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被永无止境的家务劳动所束缚,而迷失了自我,一方面在社会环境中得到认可和尊重,另一方面却难以在这种肯定中得到自己真正的需要,一不小心

成了男人利用的工具。所以,在提升女性地位,发掘女性主体性的同时,需要警惕客体性带来的制约和危害。

五、结语

女性在社会转型时期,其角色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转换。当她的声音开始出现并被放大时,女性的社会角色是什么,她的社会地位是否得到了提升,女性对自身的认知变化是怎样的,这种变化体现在何处?《妇女时报》的男编辑们不自觉地给出了答案,同时也给出了媒介对于近代女性作为一个问题的态度,即:不论革命话语如何谈论并实践妇女解放,为女性提供一个展现自我的空间是每个时期的媒介都必需和可能实现的途径。

《妇女时报》以一个早期启蒙者的角色,在一个不完整、不牢固、不开放的公共空间中,为女性的自我欣赏和彼此交流建立起一种习惯。但在一定程度上,这只是男性主权话语的一种表达,为处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中国提供了新鲜的女性办报经验。

参考文献:

- [1] 丁守和.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五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2] 刘巨才. 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M].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
- [3] 邱俊明. “家有贤母,室有良妻”:《妇女时报》(1911-1917)家庭教育讨论初探[D]. 台湾大学,2010.
- [4] 熊月之. 上海通史(第九卷·民国社会)[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5] 张法,张颐武,王一川. 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J]. 文艺争鸣,1994(2):11.
- [6] 姜思铄. 现代女性媒介视觉形象的转型——《妇女时报》的女性照片研究[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4-17.
- [7] 妩云. 家政精明之我妻(译日本稿-)[N]. 妇女时报,1911-07-26(19).
- [8] 淑静. 熟食新谱[N]. 妇女时报,1911-07-26(76).
- [9] 佚名. 妇女之卫生[N]. 妇女时报,1911-07-26(15).
- [10] 汪杰梁. 小儿保育法[N]. 妇女时报,1911-07-26(35-40).
- [11] 佚名. 女子之学问与时代之要求[N]. 妇女时报,1911-07-26(29-31).
- [12] 克罗克. 林肯之家庭生活[N]. 瘦鹃,译. 妇女时报,1913-02-25(39-44).
- [13] 冰心. 进化学上之妇人观[N]. 妇女时报,1914-04-01(8).

[责任编辑:范 君]

2009 ~ 2013 年《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载文计量学分析

范君, 姚多喜, 吴晓红

(安徽理工大学 学术出版中心, 安徽 淮南 232001)

摘要:依据《中国知网(CNKI)》文献数据库检索系统,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9~2013年《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所载论文、作者人群、发表单位、基金资助、引文分布与被引频次等进行统计分析,并计算期刊的 h 指数。结论:该刊稳定的核心作者群为本校教师群体,论文的被引频次和 h 指数在国内同类期刊中处于中等水平。

关键词:发文分析;被引分析; h 指数;《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图分类号:G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2-0105-04

The Metrological Analysis of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the 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 for the Duration of 2009 ~ 2013

FAN Jun, YAO Duo - xi, WU Xiao - hong

(Academic Publishing Center,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In line with the retrieval system of bibliographic data base in Chinese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and with the adoption of bibliometrics, a statistic analysis is conducted on the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the 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 for the duration of 2009 ~ 2013, their authors, units, fund subsidization, quotation distribution & frequency, etc., with the inclusion of the “ h ” index of the journal. The conclusion has established that the authors who have their papers published regularly in this journal are from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with quotation frequency and the “ h ” index involved in the papers fall into intermediate level among journals of the same classification domestically.

Key words: paper analysis; quoted analysis; the “ h ” index; the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the 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

以《安徽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09~2013年载文情况为统计对象,通过一系列指标分析,提供全面翔实的期刊被引情况统计。本文涉及的统计指标包括^[1]:发文量:统计期刊的年度发文量;下载量:统计期刊所发表文献每年被下载的次数;引文统计:统计期刊的各年引文量、篇均引文量、引文类型;被引统计:统计期刊的各年被引量、篇均被引率;作者统计:统计期刊作者发文量排名、期刊作者被引排名;基金论文统计:统计基金发文

排名、基金被引排名; h 指数:期刊的 h 指数是指该期刊至多有 h 篇论文分别被引用了至少 h 次。

一、研究方法

在CNKI的“来源期刊”检索中输入“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按年度分别检索2009~2013年各年度的发文信息,并在“被引期刊”检索中输入“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ISSN输入“1672-1101”,发表时间与被引时间均设定为

“2009~2013年”,下载检索出的数据并利用 Excel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数据统计时间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二、发文分析

2009~2013 年《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表 1 2009~2013 年《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文量

项目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合计
发文量/篇	102	114	114	105	104	539
总页码/页	432	432	432	432	432	2 160
各年下载量/次	17 814	16 268	11 554	6 438	2 653	54 717
各年被引量/次	7	58	91	144	211	511
各年引文量/次	418	382	498	790	399	2 487

1. 按照高发文量单位分布统计,安徽理工大学各学院及下属各部门为该刊的主要发文机构,2009~2013 年各年以“安徽理工大学”为单位发表论文分别为:17 篇、30 篇、40 篇、23 篇和 22 篇,共发表论文 132 篇,占 24.5%;其他单位发表 407 篇,占 75.5%。被引频次 ≥ 10 的论文有 7 篇,被引频次 ≥ 5 的论文共有 30 篇。

2. 高发文量作者

2006~2013 年该刊发表的 539 篇论文共涉及 685 名作者(含非第一作者),475 名第一作者,其中 6 名作者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论文数 ≥ 5 篇,2 人发表论文 4 篇,12 人发表论文 3 篇,40 人发表论文 2 篇。415 人发表论文 1 篇。发表的论文数 ≥ 3 篇的作者共有 20 名,其中副高及以上职称的作者有 18 名,占 90%(见表 2)。

表 2 2009~2013 年《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文量 ≥ 3 篇的作者(含非第一作者)

序号	作者	单位	发文量	序号	作者	单位	发文量
1	毛翰	华侨大学	13	9	郭守运	华南师范大学	3
2	王大贤	安徽理工大学	6	9	孙光辉	安徽理工大学	3
2	王洪	安徽理工大学	6	9	程增俊	阜阳师范学院	3
4	董淑平	安徽理工大学	5	9	刘景霞	三峡大学	3
4	洪江如	安徽理工大学	5	9	丁立福	淮南师范学院	3
4	谢振安	安徽理工大学	5	9	韩萍	安徽理工大学	3
7	田中良	安徽理工大学	4	9	徐其清	安徽理工大学	3
7	陶全胜	安徽理工大学	4	9	何莉	安徽工业大学	3
9	桑青松	安徽师范大学	3	9	王新林	安徽理工大学	3
9	朱炜	安徽理工大学	3	9	孙功	安徽理工大学	3

版)》各年度正刊发表论文总数为 539 篇(表 1),期均发文量为 26.95 篇;总页码 2 160 页,篇均页码数为 4.0 页。各年度总下载频次为 54 717 次。

3. 基金分布

2009~2013 年《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的论文中,共有 217 篇论文受到省部级以上基金资助,占发表论文总数的 40.3%;其中受国家级基金项目资助的课题论文 54 篇,省部级基金项目资助的课题论文 163 篇。其他基金项目资助的课题论文 77 篇。省部级以上基金项目共 23 种,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发表的论文数为 22 篇^[2],位居第一;但篇均引用率最高的为安徽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科研资助计划项目课题和安徽省教育厅科研基金课题发表的论文,篇均引用率达到 2.5 次/篇(表 3)。

表 3 2009~2013 年《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高被引基金资助论文前 8 名统计

序号	基金名称	发文量 /篇	被引 频次	篇均引用率 /(次/篇)
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2	17	0.77
2	安徽省教育厅科研基金	3	7	2.5
3	安徽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 科研资助计划项目	2	5	2.5
4	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基金	2	2	1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2	2
6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2	1	0.5
6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1	1	1
6	湖南省教委科研基金	1	1	1

三、被引分析

根据各年被引频次加总后得出总被引频次为 511,篇均被引频次为 0.96。所发表论文引用文献类型以期刊和图书为主,引用频次分别为 1 716 和

722,另外具代表性的引文类型为学位论文44、报纸39、Springer类型论文18^[2]。根据2009~2013年各年引文量得出五年内总引文量为2487,篇均引文量为4.61。其中被引频次≥10的论文共有7篇,总被引频次为91。发表形式为人力资源管理类1篇、社会实证研究1篇、人才培养2篇、语言类1篇、教育管理2篇(表4);其中5篇论文有省级以上基金资助。

表4 2009~2013年《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被引频次≥10次的论文

序号	标题	作者	年/期	被引频次
1	基于胜任力模型的人才评价方法研究	韩静, 杨力	2009/02	15
1	教师实践能力的特征及其培养	徐国财, 张晓梅, 吉小利等	2010/01	15
3	不礼貌言语行为的顺应性研究	王传奔	2009/01	13
3	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与专业承诺、学习满意度的关系研究	姚琼, 黄卫明, 马庆玲	2010/01	13
5	构建高校复合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	尹敏, 陈满乾	2009/03	12
5	我国地方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实证研究——以上海静安区为例	井志侠, 高斌, 戴俭慧	2011/02	12
7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环节与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关系	李奕	2009/04	11

1. 高被引作者

在《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013年发表论文的所有论文中,高发文量和高被引论文的单位均为安徽理工大学。有24人的论文被引频次≥8,最高被引频次为15,这24名作者中有14人的论文被引频次≥10,且24人为拥有硕士以上学位者或者在读硕士(表5)。

表5 2009~2013年《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高被引论文作者统计

序号	作者	单位	被引频次	序号	作者	单位	被引频次
1	杨力	安徽理工大学	15	13	董琴	安徽大学	10
1	邢宏龙	安徽理工大学	15	13	李奕	安徽大学	10
1	张晓梅	安徽理工大学	15	15	戴广龙	安徽理工大学	9
1	徐国财	安徽理工大学	15	15	张国枢	安徽理工大学	9
1	吉小利	安徽理工大学	15	15	刘泽功	安徽理工大学	9
6	韩静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13	15	石必明	安徽理工大学	9
6	王传奔	安徽财经大学	13	15	吕品	安徽理工大学	9
8	井志侠	安徽科技学院	12	15	袁树杰	安徽理工大学	9
8	高斌	安徽科技学院	12	21	姚琼	铜陵学院	8
8	戴俭慧	苏州大学	12	21	黄卫明	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8
8	尹敏	安徽理工大学	12	21	马庆玲	安徽理工大学	8
8	陈满乾	安徽理工大学	12	21	蔡朝辉	江苏大学	8

2. 高被引论文学科分布

2009~2013年《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论文被引频次最高的学科依次为教育学、经济管理学以及语言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表6),以教育育人为特色的论文虽然学术理论性不强反而被引频次较高,源于理工科院校社会科学学科发展薄弱或者参差不齐,难形成合力,导致载文学科特色不明显,这是下一步刊物栏目设置和学科分类需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表6 2009~2013年《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高被引论文前20名学科分布

序号	学科	被引论文数
1	教育学(含教学研究4篇)	9
2	经济管理学	4
3	语言学(含中外)	3
4	马克思主义理论	2
5	文学	1
5	传播学	1

四、期刊h指数

在期刊评价诸多指标中,为回避影响因子对期刊影响力的评价功能的缺陷^{[3][10]},在此引入将质量指标(被引用率)与数量指标(发表论文数)相结合

的 h 指数^{[3]103}。 h 指数反映的是期刊发表后多年的长期效应,它作为一个单一的复合指标克服了以往只关注期刊质量或引文次数的缺点,让期刊评价变得更加科学合理。图1显示:2009~2013年《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 h 指数为9^[2],代表在此期间发表的论文中,每篇被引用了至少9次的论文共有9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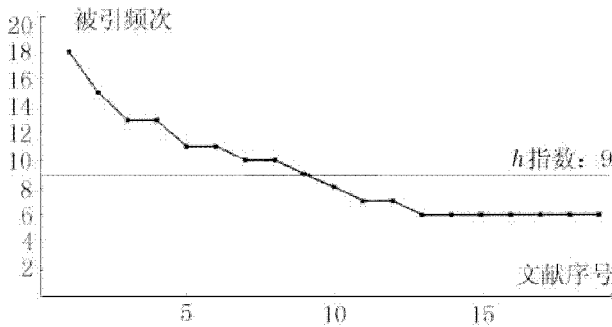


图1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指数统计

以上数据显示,《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学术水平排名处于综合类社科期刊中等水平。

五、结论

依照表4-5可看出,被高引的7篇论文发表时间均在2009~2011年间,无2012和2013年发表的论文,是因为根据2009~2013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统计数据,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的被引半衰期^①平均为5.11年^②,因此,《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2011年间发表的论文在2014年后方能达到引用高峰,而2012~2013年间发表论文的引用率还未达到高峰。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013年共刊载论文539篇,学科内容涉及哲学、法

学、政治学、经济管理学、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历史文化、传播学等各领域。《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学报以服务本校教学科研,帮助研究人员表达好自己的科研成果为己任,作者队伍稳定,形成了以本校教师为主体的核心作者群。基金论文比是衡量论文质量的另一重要参数,2009~2013年《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的539篇论文中40.3%的科研论文受到省部级以上科研基金的资助,虽然比例较小,但在被引频次方面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对期刊具有重要的贡献。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近年来尤其是2010年以来已按学科有计划地组织了专题报道和专栏,5年间共发表专题论文30篇,与所属学院、学科和作者形成了较好的互动,达到了良好的效果。另外,在提高刊文质量和组稿策略等方面需重点关注,以实现本刊活跃学术风气,为具有创新性、学术水平较高的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提供平台,服务教学与科研的宗旨。

参考文献:

- [1] 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R].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2013.
- [2] 中国知网(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 中国引文数据库[DB/OL]. <http://ref.cnki.net/knsref/RefStat.aspx?kind=3>.
- [3] 仇晓春,周珠凤.2006-2010年《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载文计量学分析[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2012,32(1):101-105.

① 期刊被引半衰期是衡量科技期刊老化速度的指标,一般被引半衰期越长,期刊的老化速度越慢、生命周期越长、被利用时间也越长。

② 2009~2013年《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的被引半衰期依次为:4.31年、4.84年、5.08年、5.57年和5.76年。